改革的教训

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

阻碍我们前进的，往往不是眼睛看到的拦在面前的大石头，而是没有看到的进入鞋里的小沙子。

李仕权◎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改革的教训：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

作者:李仕权

ISBN:978-7-5086-5171-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自 序
改革的教训

多年以后，道光皇帝批准《南京条约》这个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时，准会想起祖父乾隆皇帝带他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是1793年9月的一天下午，马戛尔尼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借向乾隆祝寿（八十大寿）之机递交了国书，提出通商要求，但遭到了拒绝。在回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复函中，乾隆说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究竟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使天朝上国一步步陷入被动挨打局面的？当道光皇帝思考这一问题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却从来没有从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仿佛批准《南京条约》和那个遥远的下午就像“鱼与飞鸟，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殊不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那个遥远的下午早已为《南京条约》埋下伏笔。

不会吸取经验和教训的人，他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遥远的。同理，不会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改革，通向成功的道路也是遥远的。

本书要说的，正与此相关。

永远都无法让螃蟹蛙跳

谈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问题是：应该主要吸取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先看一个跟螃蟹有关的故事。

螃蟹在树林里迷了路，遇到青蛙，问道：“青蛙你好，我要到河边去，怎么走？”青蛙指着前面说：“你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达河边了。”螃蟹走了老半天，可是连河的影子都没见到。后来，螃蟹又遇见青蛙，就埋怨青蛙：“你害得我好苦，我走了老半天，连河的影子都没看到。”青蛙摇头笑着说：“我没有骗你，叫你一直往前走，你却横着爬，当然到不了河边了。”

这个故事也可以反过来讲，变成青蛙向螃蟹问路，但核心却不变——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改革的道路，何尝不是要“走自己的路”。故事正着讲，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是青蛙，那么顺着它指的道路，中国这只螃蟹，是到达不了代表成功的河岸的。故事反过来讲也一样，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是螃蟹，那么顺着它指的道路，中国这只青蛙，也同样抵达不了代表成功的河边。必须明白，永远都无法让螃蟹擅长蛙跳，也永远都无法让青蛙习惯横爬。

归结为一句话：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十几亿庞大的人口，中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国家，不可能亦步亦趋走别人的路，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用独特的制度文明、独有的价值追求、独到的文化范式，才能给予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美好的未来。

教训往往比经验更管用

在此基础上，第二个问题是：应该主要吸取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经验，还是教训？恐怕是教训，原因有三：

其一，经验总结得多，教训汲取得少。

当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时，往往说的都是那些成功的或者基本成功的改革，绝大多数写中国历代改革的著作和文章，侧重的都是那些广为人知的成功改革，主要是谈经验。这就造成对中国历代改革的经验总结得多，教训吸取得少。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短板效应”警示我们，在汲取中国历代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时，我们最应该做的功课，是补齐对教训汲取不够的“短板”。

其二，经验侧重顶层设计，教训关注具体落实。

翻翻写中国历史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就会发现，对经验的总结侧重点在顶层设计，突出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匹配性和衔接性，彰显举措的针对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但对改革措施的细节和落实的重视不够。可是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白条；千招百招，不落实就是虚招。对教训的反思，恰恰较为重视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综观古今中外的改革，大多数的落实情况都很糟糕，以至于根本轮不到拼顶层设计。

其三，经验往往不管用，教训却常常很顶用。

经验要怎样才会起作用？要符合很多前提条件，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等等，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世易时移，彼时得出的经验，由于众多条件发生了变化，此时不一定管用。但教训就不一样了，它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讲究，不需要各种条件的协调配合，只要有一点符合了，就有可能被触发，“很顶用”地起作用，时刻准备着再次给你一个“下马威”。

也就是说，在同等的情况下，教训往往比经验更管用。正所谓：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但昨天的风雨，仍能泥泞今天的道路。

本书要谈的正是“改革的教训”，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教训。

这些教训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给了我们哪些教训？

总结归纳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对历史的概括。因为“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注]尽管如此，仍值得一试。

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缺少群众基础，没有人民支持，再好的改革也只是空中楼阁。

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暗喻了这个道理。安泰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与大地保持接触，就不可战胜，因为他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取力量。后来，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到了空中，使其无法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取力量，便将他扼死了。其实，大地女神暗喻的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切改革的力量源泉。

西周的周厉王改革揭示了这个教训。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周厉王虽然身为高高在上的天子，推行改革却十分无力，还被守旧的贵族发动政变赶下了台，流放至死。要进行改革的周厉王，就像一只奢华

却不自主的风筝，其实就是东方的安泰俄斯 ，一不接人民群众这个地气，就脆弱得不堪一击。

再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当内忧还没积重难返时，当外患还没黑云压城时，当政治还算清明时，当经济还在发展时，当社会还能稳定时，不抓住时机改革，等到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水深火热，起义暴动呈星星火燎原之势时，才想起改革来，还能补救什么呢？

王莽改革就是如此。西汉末年，由于皇帝荒淫无道，错失改革时机，整个社会沦为一个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不可救治的烂摊子，没有了回旋余地，无论是拿着“新船票”的王莽，还是拿着“旧船票”的刘姓皇族，都无法阻挡西汉这条破船要沉的命运。于是，王莽的改革就成为这样一种“历史的行为艺术”：王莽拿着一个叫改革的气球，要穿过一个种满仙人掌的花廊，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能够撑多久，那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还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改革要做到“蹄疾而步稳”，不能坏了节奏、失了章法，乱成一锅粥。

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都不可小觑，必须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做到“蹄疾而步稳”，否则就会步子不稳、后劲乏力，甚至葬送改革前途。

隋炀帝改革就吃了这个亏。隋炀帝推行的改革，在当时可谓力度大、程度深、站位高、谋划远，但他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认识不够，没统筹好主次顺序坏了节奏，没协调好轻重缓

急失了章法，有的改革急于求成，有的改革仓促推进，没能做到“蹄疾而步稳”，结果改革马失前蹄——栽了！

还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改革要见成效往往是“病去如抽丝”，但颠覆改革成果却“病来如山倒”。

改革是针对问题产生的，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不能够药到病除，只能在久久为功中一个一个克服困难、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正所谓“病去如抽丝”。但要颠覆改革成果却容易得多，正所谓“病来如山倒”。

唐武宗改革就遭遇了这个问题。唐武宗励精图治，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式的改革，创造了唐朝后期最为平稳安乐的一段时期，成为“灰暗晚唐”的一抹亮色。可唐宣宗继位后，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数废止，将改革大业葬送殆尽。于是唐武宗改革沦为这样一个历史情景：唐武宗像一个街头的绘画家，他把安史之乱后的历史涂鸦，变成了凡·高笔下宁静的绚烂星空。只可惜，他离开之后，不断有人来涂鸦。

……

这些教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改革的教训在时光深处等你，等你在后面的章节中自己发掘，这将比我为你概括总结的精彩千百倍。

---

1.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5年版第6页。

导 论
打捞沉没的改革

缺少改革的历史是尴尬的

站在耀眼的阳光面前，谁会知道自己背后拖的影子有多长？

处于盛世的光环之中，谁能看到华丽幕布下的虱子有几多？

乾隆皇帝，以“十全老人”自居，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自我感觉最良好的皇帝。如果对历史人物抱以“理解的同情”，乾隆皇帝完全有理由让自己自豪。

经济总量最大，国家财力最雄厚。据当代学者估算，乾隆时期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三分之一（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粮食产量最高达1 044亿公斤，财政收入最高达白银8 000万两，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军事实力强大，实际控制力最强。乾隆统一了新疆，改善了对西藏的统治，疆域达到1 45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第二大的疆域。和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清朝对整个疆域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

人口规模最大，繁衍增长最迅速。乾隆继位时，中国人口约1.4亿；而到乾隆晚期，人口已接近3亿，翻了一番。在古代，人口多寡是

衡量统治成败的最重要标准。乾隆时期养活了当时世界上30%的人口，非常了不起。

……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

或许正因如此，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提出通商要求时，沉湎于天朝上国迷梦中不能自拔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

殊不知，马戛尔尼在并不漫长的逗留中，就已然看穿了“乾隆盛世”的神话，直指所谓的盛世“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

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盛世貌似鼎盛繁华，实则风烛残年、百孔千疮，确实“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段历史缺少了改革，在因循守旧中拒绝搭乘欧洲工业革命的快车，让旧制度的中国从此步步堕入落后挨打的惨境。

一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一边却“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这样的唏嘘警示后人：缺少改革的历史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地自容！

绝不再出品“雄伟的废墟”

时光流转，到了距离乾隆盛世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正步入一个新的盛世。

2014年底，一个报告触动了全世界的神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IMF的数据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得出的，根据这一算法，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为16.5%，而美国所占的比例为16.3%。IMF还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喜大普奔(注)？

先别着急。请再看另一组同样是IMF的数据，如果按实际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为17.4万亿美元，远超中国的10.4万亿美元，人均GDP更是具有压倒性优势。即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也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人艰不拆(注)？

大可不必。清醒是改革者的“通行证”。

中国在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进一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了。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高速增长后，往往出现拐点，由盛而衰。连续保持十年、二十年增长的国家有不少，但“三十而立”者寥寥，“四十不惑”者当代几乎没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相继堕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迈过这个“坎”？

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进行排列组合的“发展起来后”的各种期盼，说众口难调，绝不是矫情。有个形象概括：第一代农民工背的是“蛇皮袋”，要的只是“包吃包住，给足工钱”；新一代农民工拖的是拉杆箱，盼的是“体面就业，同城待遇”。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拼图中，期盼提高、梦想升级的何止是2.6亿农民工？每个人都有很多愿望：对蓝天的渴望、对食品安全的期许、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中国能否交好这个“卷”？

一些地方，交通方便了，干部离群众却远了；网速快了，办理事情却难了。有顺口溜这样说：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种种不良风气滋生了政治冷漠，蚕食了政府的公信力，流失了宝贵的执政资源，有不少官员的办事效率之低，被讥讽为“行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

中国能否扳回这个“局”？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实行改革，不是执政者吃饱了撑的，也不是老百姓闲得慌，而是社会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大势要改，人心思改，不能不改，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着“杀出一条血路”。

当前的中国，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抑或主流民意，都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决心不再出品另一座“雄伟的废墟”，并形成了“最大公约数”共识——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总钥匙”。

当你谈论改革时谈些什么

关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得不追问历史的改革轨迹，追寻改革的历史足迹，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处在改革历史的延长线上，以史为鉴，前提是知晓历史上的改革，“知古才能鉴今”。

那么，当你谈改革时你谈些什么？更具体一点，当论及吸取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时，都提哪些改革？通常，多数人谈的是下面这些改革：

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改革。出身商人的管仲，实行“四民分业、寓兵于农、相地而衰”的改革，同时奉行“以商富国、以商止战”的政策，提出“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让齐国迅速富强起来，齐国国君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商鞅推行的重农抑商、广设郡县、军爵优先、户籍制、连坐法等改革，使积贫积弱的秦国不仅富强起来，还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强国，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汉的汉武帝改革。汉武帝在政治上削藩打击诸侯国，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经济上实行盐铁专营，政府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控制；军事上主动出击匈奴、经营西域。这次改革集大一统制度之大成，缔造了汉武盛世。

东汉的光武帝改革。光武帝在政治上架空三公，集中皇权；经济上进行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以“柔道”治天下，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实现了“光武中兴”。

唐朝的唐太宗改革。唐太宗政治上选贤任能，兼听纳谏，完善科举，削弱豪强世族对朝政的干涉；经济上以农为本，休养生息，实行均田制；文化上开明开放，文教复兴，百花齐放；对外平定外患，尊重边俗，稳固边疆。这次改革，史称“贞观之治”。另外，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有类似的改革，从而缔造了“开元盛世”。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这次改革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推行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保甲法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

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政治方面实行“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落实朝廷政策的情况，裁减了十分之三的官员；经济方面在勘核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了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一条，按亩折算缴纳银两。这次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清朝的雍正改革。设军机处，皇帝集权力于一身，整饬吏治，查处腐败；摊丁入亩，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耗羡归公，既增加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这次改革促成了历史上最长的盛世——康乾盛世。

另外，还有清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民国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这些都被普遍知晓。

问题来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十几次的改朝换代，大的改革中（也就是全面改革，不包括某一领域的或局部的改革）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能够提供经验和教训的，难道只有上述区区几个吗？

多少改革沉没在历史长河

其实，除了上面提及的改革外，还有不少大的改革，由于大多数人不太知道，沉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那些耳熟能详的改革虽然值得借鉴，但那些“沉没的改革”更值得去打捞。

因为，阻碍我们前进的，往往不是眼睛看到的拦在面前的大石头，而是没有看到的进入鞋里的小沙子。那些“沉没的改革”，就像“鞋里的沙子”，更值得加以关注和研究。

那么，有多少改革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笔者经过考察梳理认为，沉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大的改革有下面这些。

周厉王改革。通常认为，管仲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改革，而实际上，比管仲早一百多年的周厉王，早就已经推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改革。周厉王改革，在经济上实行“专利”政策，重视农业，扩大中央收入；在政治上，打破周公、召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而起用新臣，设立“牧”官，分解大诸侯国；在军事上，严厉打击尾大不掉的诸侯国；在政法方面，淡化礼制、强化法治，建立监察机构。这次改革，堪称是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详见本书第一章《周厉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秦献公改革。通常认为，商鞅变法是秦国转弱为强的起点，而实际上，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推行了系统改革。秦献公废除人殉制度，弥补三百年人口欠账；重用墨家，加强军事和城防；在河西地区设立改革特区，搞土地改革，推行“一国两制”；建立户籍制，创设连坐法，以防谍杜奸；推广县制，奖励军功，打破贵族的垄断，培育中央集权。改革让秦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也就是说，秦国超级逆袭的起点应该是秦献公改革。（详见本书第二章《秦献公改革：秦国超级逆袭真起点》）

汉宣帝改革。通常认为，汉武帝的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都建树非凡，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而实际上，汉武帝早期到中期，确实步步走向鼎盛，但到了中晚期，形势却急转直下，迅速走向衰败。汉宣帝正本清源，大力改革，既学汉

文帝休养生息，又学汉武帝霹雳手段，“以霸王道杂之”，兼具汉文帝和汉武帝两帝之长，力避两帝之短，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降服匈奴、统辖西域、安定西羌，文治武功，皆有大成，成就了西汉最鼎盛、最繁荣的时代。可谓“汉武帝梦想，汉宣帝实现”。（详见本书第三章《汉宣帝改革：正本清源成就最鼎盛》）

王莽改革。通常都认为，王莽要么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奸贼”、“佞臣”，要么是空想“社会主义皇帝”，他的所作所为有违常理、荒诞不经、异想天开，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揭竿而起，推翻了他的统治。而实际上，王莽改制，既不是一场篡位的阴谋，也不是一场空想的试验，而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并且是效仿汉武帝的改革。可悲的是，王莽面临的严峻形势是汉武帝面临严峻形势的“升级版”，而王莽本人却只是汉武帝的“降级版”，这场“模仿秀”式的改革注定会走进死胡同，王莽只不过是西汉晚期腐朽政权和严重社会危机的“替罪羊”。（详见本书第四章《王莽改革：在模仿中走进死胡同》）

汉明帝改革。通常认为，东汉一朝仅有光武帝值得一提，后代皆为平庸之辈。而实际上，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在位的18年，是东汉初期中兴治世的核心时代。如果一定要找个类比的时期的话，就相当于康雍乾盛景中的雍正时期。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汉明帝的大力改革，光武帝的开国奠基之业、休养生息之功，恐怕延续不了多久就灰飞烟灭了；如果没有汉明帝的大力改革，留下比较坚实的底子，先天不足的东汉王朝，恐怕撑不了多久。汉明帝的改革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详见本书第五章《汉明帝改革：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

隋炀帝改革。通常认为，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荒淫无道，搞垮了繁荣昌盛的大隋王朝。而实际上，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推行了诸多改革，最后湮灭在隋末战争

的血与火之中的，不是破烂衰败的烂摊子，而是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讽刺的是，秦始皇做过的事情，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情，绝大多数唐太宗也做了，除了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有学者追问：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历史评价会否掉一个个儿？（详见本书第六章《隋炀帝改革：急于求成却功败垂成》）

唐武宗改革。通常认为，唐朝除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改革、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改革、唐代宗任用刘晏改革盐法、唐德宗任用杨炎推行两税法外，唐朝再无可称道的改革了。而实际上，唐武宗会昌年间，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式的改革，削弱了宦官势力，打击了歪风邪气，实现了政令畅通，扩大了财税来源，改善了民生福祉，缓和了社会矛盾，弱化了藩镇割据，创造了唐朝后期最为平稳安乐的一段时期，为“灰暗晚唐”抹上了一道亮色，呈现出中兴气象。以至于王夫之感叹：“如果唐武宗不早逝，李德裕不被早贬，唐朝完全可以复兴！”（详见本书第七章《唐武宗改革：拨乱反正赢中兴局面》）

宋仁宗改革。通常认为，有宋一朝，除了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再无其他值得一提的改革。而实际上，宋仁宗时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推进改革，实行庆历新政，新风扑面：官僚机构开始精简，财政开支明显节约；恩荫开始受到重重限制，打破了“龙生龙，凤生凤”的怪圈；政绩考核和品德考评成为干部升迁的标准，往常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很难混下去了；科举取士方面，突出实用文章，改文风成效明显……沉闷僵化积贫积弱的北宋，开始焕发生机和活力。只可惜，改革仅仅两年多便半途夭折，但是起到了为王安石变法投石问路的效果。（详见本书第八章《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庆历新政》）

明孝宗改革。通常认为，整个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开创基业颇有建树和明神宗时张居正改革外，再无其他有价值的改革。而实际上，明孝宗针对明朝中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良，包括终止“只知有厂卫，不知有朝廷”、终结“纸糊阁老”和“泥塑尚书”、清理官场绿色通道“传奉官”、改革财税堵住损耗“无底洞”等等，增加了政府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明孝宗时期，是明朝天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流民相对较少、叛乱起义最少的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明孝宗抢在革命之前推行改良，避免了一场社会大动荡。（详见本书第九章《明孝宗改革：抢在革命之前搞改良》）

有人要问：这些改革，为何会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背后有什么力量在操控吗？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着急回答，等我们完成对上述“沉没的改革”的打捞后，再来挖掘。

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开始历史时空之旅，一起去打捞“沉没的改革”。

---

1. 喜大普奔：网络用语，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形式。
2. 人艰不拆：网络用语，意思是人生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必拆穿了吧。

第一章

周厉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周厉王高高在上，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像一只无比奢华的风筝。高高在上的周厉王，是东方的安泰俄斯，一不接地气，就脆弱得不堪一击。

说起改革，通常都以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作为起点。实际上，比管仲早100多年的周厉王，就已经推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改革。

只不过一直以来，因受“国人暴动”事件的错误解读，周厉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继夏朝亡国之君桀、殷商亡国之君纣之后的第三个暴君，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大家恨屋及乌，连他推行的改革也一并抹杀了。

国人暴动其实是贵族政变

通常是这么描述国人暴动的。

公元前9 世纪中期，周厉王当政。他荒淫无道贪财好利，残酷剥削百姓，残暴镇压人民。公元前841年，国都的平民百姓暴动，赶走了周厉王。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

真的是平民百姓暴动赶走了周厉王吗？当然不是！

首先，“国人”不是平民百姓。

西周时，全国实行“国”、“野”分治的统治方式。“国”，即西周的城市，是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也称为都。居住在“国”中的叫“国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工商业者，其余的都是跟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么是各级贵族本身，要么是各级贵族的代理人，要么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各级

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他们虽然具有自由的身份，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依附于贵族，成为“国人”的基本组成。同时，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许多低层贵族在失势和破落后，也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住在“国”中的奴隶奴仆等都不能算作“国人”。“野”，也称为鄙、遂，是广大农村，居住在“野”中的人叫“野人”或者“鄙人”。“国人”与“野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国人”有参政、议政、进仕、当兵、受教育等权力，而“野人”没有[注]。所以，“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平民百姓，而是社会的中上层，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是一个广义上的贵族利益集团。其实，只需简单换个角度思考就明白了：两千多年前，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低得可怜，当时就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是普通民众平民百姓呢？

其次，受益者往往才是幕后黑手。

国人暴动后，谁是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以周公和召公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周朝建立后，周公、召公“世为卿士”成为惯例，成为周朝最显赫的家族。周厉王即位后却故意冷落两家，没有遵循惯例任命周公、召公为卿士，而是起用了在经济方面有专长的荣夷公和在军事上有专长的虢公长父为卿士，分别负责经济和军事事务。

国人暴动后，进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时期。关于共和行政，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国人暴动后，大家推举周公、召公共同执政，两人不仅重新成为最高官员，而且更上层楼，直接代行王权，共同执政了14年，等周厉王死后才归政给继位者周宣王。第二种：国人暴动后，大家推举共国（西周诸侯国，封地在今天的河南辉县一带，春秋时期被卫国吞并）的国君共伯和名义上摄行王政，但由周公、召公实际执掌政权。[注]共国是一个小诸侯国，在当时拥有强大实力的几个大诸侯国（如鲁、齐、晋、卫、郑等国）面前不值一提，而最后却由共国的国君共伯和出面收拾局面，正是出于对权力平衡的

考虑：一个跛足而弱势的执政，更符合西周王朝的政治现状，更符合各诸侯国的利益需要。[注]无论是哪种情况，周公、召公作为最大的受益者，代表的是整个贵族集团的利益。

再次，兵强马壮的周厉王不可能被平民百姓赶走。

周厉王在位时，并不是一位懦弱无权的统治者，而是手握重兵常年东征西讨、南征北伐，击退了犬戎，平叛了淮夷，治服了宿夷，震慑了有异心的诸侯国。由此可见，周厉王的军队也算是兵强马壮的，战斗力不在话下，没有武装的平民百姓是不太可能推翻周厉王的。那么，周厉王是怎么被推翻的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贵族发动了政变，流放了周厉王；一种是贵族幕后参与，控制了军队，让周厉王无可用之兵。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平民暴动往往不会放国君一条生路，而是杀之而后快；贵族政变，才往往会放国君一条生路。周厉王能逃离镐京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在彘这个地方继续生活14年（周厉王于公元前828年病死于彘），怎么看都像是被贵族放逐了。

最后，贵族政变其实是有历史记载的。

在谈及发生在公元前841年的旨在推翻周厉王统治的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简单地将这个事件定性为“国人暴动”。实际上，事件的复杂程度远非“国人暴动”四个字可以概括，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这次事件时，用了“公卿惧诛而祸作”[注]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公卿这些贵族们也都参与了，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的“国人暴动”事实上是贵族利益集团为了抵制改革新政而发动的一场政变。

国人暴动虽然是贵族政变，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胜者为王败者寇”，贵族利益集团为了掩人耳目，于是把政变描述成国都镐京的平民百姓不满周厉王暴政而起义暴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周厉王真的不是“周扒皮”

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国人暴动，通常是这么解释的。

周厉王十分贪婪，强占了山林川泽，不准平民上山打猎砍柴，也不准百姓下河捕鱼捉虾，还不准他们煮海水晒盐或挖井煮盐……从山林川泽中获取的任何财利都要向周厉王缴纳利税。周厉王这个西周的“周扒皮”，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平民百姓无奈之下，只好暴动。

周厉王真的是贪得无厌的“周扒皮”吗？其实不是！

原因其实很简单，对山林川泽的获利抽取利税不是周厉王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一直在实行。中国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先生指出，在西周社会发展中，山林川泽作为重要的自然和经济资源，是西周王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王室经济，分宫内、宫外两块，宫内经济是指各宫室所拥有的百工奴仆等从事的手工作业，宫外经济则是王畿四面八方广大农村的籍田、山林、川泽、牧场、园圃等出产，统称山林川泽。

根据《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作为周代六卿之一的司徒，下面的属官有山虞、泽虞、林衡、牧人、场人等，这些属官就是分别负责管理来自山林川泽的出产收益的。山虞，掌管山中所产各种物品；泽虞，掌管川泽中的物产，这些物品物产都与周王室的消费和祭祀密切相关。山虞、泽虞，合称虞官，根据《国语》记载，周初就存在虞官，而且周文王还很重视，即位后曾“询于八虞”。另外，负责守护林麓和掌管林麓物产的林衡，负责掌管养殖六牲并供应祭祀所需牲口的牧人，掌管王室场圃及其物产的场人，都跟周王室的消费和祭祀息息相关，在周初都已存在。

可见，王室对从山林川泽中获取的收益抽取一定比例的利税是早已有之的惯例，周厉王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增添额外的负担，周厉王不是“周扒皮”。

可是，周厉王在当时为什么会被当成“周扒皮”呢？这自然是拜贵族利益集团所赐！

周朝实行分封制，各级贵族封君在自己的封地上替周天子进行管理，按时向周天子朝贡。封地涵盖两类土地：一类是耕地，也就是井田；另一类就是不能耕种的山林川泽。在此基础上，朝贡也分两类：一类是耕地出产的粮食五谷；一类是山林川泽中出产的物品。其中，耕地是有统计数据的，并记录在册，粮食方面的朝贡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因此一直比较稳定。但是，由于山林川泽不好统计，也就没有统计，山林川泽的物产朝贡就比较随意，在实际操作中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朝贡，绝大部分都被各级贵族封君占有了。

周厉王当政后，加强了山虞、泽虞、林衡、牧人、场人等官职功能，要求所有从山林川泽中出产的物品都要按比例缴纳利税，其实只是把以前荒废的政策严格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民众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普通民众无论是上山砍柴打猎，还是下河捕鱼捞虾，抑或煮海水晒盐挖井煮盐等，都一直在缴纳利税。只不过，以前是缴纳给贵族封君，现在要直接缴纳给周王室。但贵族的利益就受损失了，比如说，以前平民把山林川泽收益的五成缴纳给贵族，贵族把其中两成甚至只有一成朝贡给周王室，留下三成甚至四成自己享用，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逆转，贵族只能留下一两成，大头被周王室拿走了。

原本被自己实际占有的山林川泽收益突然就大大缩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贵族能甘心吗？于是就把周厉王的做法称为“专利”，意思就是“独占山林川泽收益”。周厉王是“周扒皮”，就在贵族的不满、埋怨、指责和议论纷纷中孕育、生发、流传开来。

周厉王是“周扒皮”吗？

对平民百姓来说，并不算是；但对贵族集团来说，名副其实！

周厉王改革动了贵族的奶酪

就因为周厉王把山林川泽的收益拿走了大头，贵族就发动政变把周厉王流放了吗？

还不至于。

要知道，发动政变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矛盾不激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贵族们是不可能下决心发动政变的。显然，山林川泽收益的损失，还不足以让贵族非要政变不可。一方面，在整个财富构成中，山林川泽的收益还是小头，耕地出产才是大头。另一方面，虽然山林川泽的总体收益巨大，但具体到每个贵族家庭头上并不太多，在可承受范围内。贵族们大风大浪见得多了，是不会为这点蝇头小利甘冒掉脑袋的风险的。

那么，是什么让贵族们甘冒掉脑袋的风险发动政变的呢？其实是因为周厉王的全面改革动了贵族的奶酪。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周厉王动了贵族的哪些奶酪。

在经济上，实行“专利”，重视农业，损害了贵族的经济利益。

“专利”政策对贵族经济利益的损害上文已经讲过了，在这里不再赘述。这一政策其实就类似于当代的国土资源税，目的是夯实国家财政，扩大中央收入。

另外，西周起初是农业和牧业并重的，周厉王更重视农业，这成为他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诗·大雅·桑柔》里记载，有人埋怨周厉王只知道抓农业，以稼穑为国之本。[注]这是周厉王重视农业的佐证。重视农业，使一些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的贵族的利益受到了较大冲击。

在政治上，起用新臣，加强王权，损害了贵族的政治利益。

周朝建立后，周公、召公“世为卿士”成为惯例，但周厉王没有遵循惯例任命周公、召公为卿士，而是起用了荣夷公和虢公长父为卿士，分别负责经济和军事事务，打破了世袭垄断。除了周公、召公外，还牵扯了众多贵族的官位和权力。

在加强王权方面，周厉王制定了肢解大诸侯国和直接命令地方官的政策。《周礼·夏官》里记载：一个边长千里的大诸侯国，将它的土地用来分封边长五百里的公爵国，可以分成4个；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四百里的侯爵国，可以分成6个；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三百里的伯爵国，可以分成11个；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两百里的子爵国，可以分成25个；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只有一百里的男爵国，可以分成100个。[注]肢解大国还不够，周厉王还要在各地设立官员，这些官员名称为“牧”，直接由周厉王统率领导，然后由这些“牧”来管理四方诸侯，制定诸侯国君臣应行的职责，确定各诸侯国应缴纳的贡赋。[注]

在军事上，霹雳手段，严厉打击，让尾大不掉的贵族焦虑。

周厉王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主动作为，用霹雳手段，严厉打击有异心、尾大不掉的诸侯国。在这方面，周厉王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从南方的楚国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在位时，国力衰微，一些诸侯国就乘机不来朝贡了，其中最出格的就是楚国国君熊渠，居然擅自称王，想要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而到了周厉王在位时，一向无法无天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的熊渠，居然也

害怕周厉王会前来讨伐，主动取消了王的称号。(注)如果不是周厉王在军事上战功赫赫，熊渠怎么可能主动取消王号，要知道南蛮楚王熊渠必定是不怕纸老虎的。贵族们天生希望自己永享福禄，对周厉王是又恨又怕。

在政法上，淡化礼制，强化法治，让宗法贵族们十分忧心。

周朝号称礼乐时代，当时的宗法观念极强，周厉王为了保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采取了加强法治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暴政”了。为了保证改革的进行，周厉王不惜使用了简单、幼稚、粗暴、高压手段。周厉王下令，成立了一个以卫巫为首的执行法律的特别机构，在国都中监视在公众场合抨击改革的“国人”，试图以强势高压的方式消除对改革的各种异见，统一舆论。(注)其实，抨击改革的，同样是跟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是广义上的贵族利益集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可能是夸大其词，但确实是严重违背“礼”的，这说明周厉王有勇无谋，刚好给了贵族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

这确实是堪称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改革处处戳中了贵族的痛点。“专利”政策把原本被贵族实际占有的“国土资源税”收归中央，这无异于从贵族那里虎口夺食；重视农业，使很多半游牧半农耕的贵族利益受到了较大冲击；起用新章新臣则打破了高级官员任用的垄断，特别是打破了最大的两个既得利益集团——周公、召公对最高官职的世袭垄断；而肢解大诸侯国和任命地方官，则会直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

周厉王的改革，无异于向全体诸侯国宣战，试问：哪个诸侯国甘愿乖乖就范？哪个诸侯国国君情愿自己的封地被瓜分？况且，西周中后期诸侯国实力日益增强，已经尾大不掉了。

周厉王的改革动了贵族集团的奶酪，贵族集团恨得牙痒痒，改革注定要受到诸侯国的强烈反对和全力阻挠。这才是“国人暴动”发生的真正原因。

西周财政悬崖愈演愈烈

周厉王为何要改革？为何要动贵族们的奶酪？

不是周厉王闲来无事，突发奇想决定要改革，也不是周厉王吃饱了撑得慌，给自己找不自在要改革，而是因为支出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少，财政悬崖愈演愈烈，西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先看开支。为了维持王室的气度和排场，周王室的日常开支已经花销不菲，但这相比于另一个更为庞大的支出，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这个更为庞大的支出就是战争支出。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拱卫周室，天下太平，但太平的日子没多久，战争就开始了。

开始是平叛三监。周武王攻下商都朝歌后，纣王自尽，商朝灭亡，但商朝的贵族们仍保存了不俗的实力。为了安抚和加强对殷商遗民的控制，周武王把商纣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鄘、邶三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管辖治理，以达到监视制衡武庚的目的，总称三监。灭商不久，周武王就病逝了，周武王的四弟姬旦（也就是周公）立周武王年幼的儿子姬诵为王，姬诵就是周成王。周成王年幼，周公于是自己摄政。这样一来，周武王的三弟管叔就不干了。因为在周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年长，按照当时长幼有序的礼制，他才最有资格摄政。周武王其他的弟弟们也多有不满和猜忌，觉得该兄弟们一起辅政，凭啥你周公一人摄政。这其中，意见最大的就是蔡叔、霍叔等。其时，纣王的儿子武庚虽然已经投诚周朝，并被分封，可国恨家仇哪有那么容易忘记，于是就极力

进行挑唆，教唆管叔、蔡叔、霍叔叛乱。没想到挑唆还真管用，管叔、蔡叔、霍叔三个真的就一起叛乱了。周公亲率大军东征，经过三年苦战，这场动乱才告平定，诛了武庚，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霍叔。

接着是征伐犬戎。犬戎是周朝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经常侵扰周朝，双方的战争从未间断过。西周早期和中期，周朝国势尚隆，周朝处于攻势。

然后是征伐鬼方。鬼方也是周朝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据小盂鼎铭文记载，周成王的儿子周康王晚年，在与鬼方的战争中就斩首4 800多人，俘虏13 000余人。

另外，西周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亦常有冲突，战争不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都是用财力支撑的，战争花钱是个无底洞。这些接连不断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消耗了巨额的财富，给周朝的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且日益沉重。

反观周王室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在逐渐减少。

周朝的收入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周王室直接拥有的领地收入，一块是各诸侯国的朝贡。

先看周王室直接拥有的领地收入。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周王室直接拥有的领地收入基本是一个变动不大的定量。而且，到了后来，“偷税漏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2006年，陕西扶风出土了一只琱生簋（青铜器，是一种大口锅），簋上的铭文记载了一则大贵族召公家族欺君瞒粮的故事。铭文大意如下：有一天，召公夫人给我（前去收田租的官员）织物五寻、壶两个，转达召公的话说，“我老了，不管事了，我底下那帮人搞农业生产也不容易，能不

能允许我们的收获不散失？比如，（该上缴的粮食）我押下三成，给你两成回扣，剩下的五成上缴公家。”召公的弟弟惠赐我一玉璋。作为答礼，我回赠了夫人一匹束帛、一枚玉佩。注这绝不会是个例，实际上“偷税漏税”现象越来越普遍，已经严重影响了周王室的收入。

再看诸侯国的朝贡。随着周朝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力衰减，国势渐渐今非昔比，不少边远的诸侯国就趁机悄悄地脱离了周朝的控制，不来朝见，不来上贡。到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比如到了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时，居然一改以前天子站在朝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周天子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到了周夷王晚年，不仅边远的诸侯国不来朝见上贡，甚至中原的一些异姓诸侯国，也乘周王室衰微之际，不来朝见和进贡，反而趁火打劫进攻王室、起兵叛逆，十分嚣张。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楚国。

开支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亏空越来越多。财政悬崖就像离开弓弦的箭，是没法回头的，注定将愈演愈烈。

杀父之仇居然也共戴天

财政悬崖愈演愈烈，夸张到什么程度？

周穆王“杀父之仇也共戴天”的无奈，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影响的致命性。

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强也很难强过三代，周天子的权威第一次被地方诸侯国挑战，正好是周朝的第四任天子周昭王姬瑕，而挑战者则是当时的南蛮之国——楚国。

楚国因为当年自己祖先鬻熊“子事文王”并参加了灭商战争，算是辅佐周文王有功，而被分封在自己的地盘上。后来，在周公摄政时

期，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再次对鬻熊的后代——熊绎进行了封赏。但在周朝建立的政治体系中，楚国只相当于一个子男之国（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地位很低。楚国没有资格参加诸侯的正式会议，只能与其他蛮夷一起看守祭祀用的火堆，干些抱抱茅草、添添柴火之类的粗活。抱怨归抱怨，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周朝初期的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楚国对周王室还是表示臣服顺从的，该朝见的时候绝不会落在后面，该进贡的时候也决不拖后腿，诸侯聚会的时候，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干分内的活，表现得还不错，周王室也还感到满意，因此与周王室的关系也还比较融洽。比如，周成王在岐山南面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时，楚君熊绎也前来参加了。

楚国在南方发展得很迅速，经过周武、成、康三朝50多年的努力发展，到周昭王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周王室由于先后平定叛乱、征战鬼方、抗击犬戎等，战事不断，耗费巨大，反倒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慢慢地，楚国对周天子的号令就开始不认真遵守了，有时还没事找事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周天子对着干。周昭王为了维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和周朝既定的政治秩序，先后两次发动对楚国的征伐。

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1年），经过精心准备后，周昭王亲自率领王师前去讨伐楚国。周王师渡过汉水之后（楚国在汉水之南），对楚国展开了猛烈进攻，取得大捷，缴获了大批战利品，不过并没有彻底征服楚国。

三年后，也就是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978年），周昭王第二次亲自率领王师前去讨伐楚国。第二次伐楚没有第一次顺利，周王师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北还途中，中了楚国人的计谋，连周昭王都被淹死在汉水中了 。[注]

周昭王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也就是周穆王。新天子登基后，公卿大臣们都在琢磨着同样一件事情：周穆王什么时候征兵攻打楚国，为他的父王周昭王报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仇应该是非报不可的。

可是！居然！周穆王并没有征兵伐楚，被世人嘲笑为“杀父之仇也共戴天”。其实周穆王并非不想为父王报仇，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周王朝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在第二次讨伐楚国的那场战争中，周王朝的主力部队多半都葬身江底，而且因为周昭王的多次对外征战，国家财力大减，国库空虚。

要钱没钱，要兵没兵，拿什么去跟楚国打！

“杀父之仇也共戴天”，是财政悬崖下的无奈忍让，是周王朝由盛而衰“最辛酸的事”。同时也说明，周王朝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越级爱国遭遇人人喊打

“国人暴动”后，周厉王只是被赶走了，他就没机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吗？

事实很残酷！周厉王不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因为他没有同盟军，没有贵人相助，孤掌难鸣，他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让周厉王成为孤家寡人的，不是敌人的阴谋，也不是他自己的无能，而是他的祖宗设计的周朝制度——层层分封代理制下，“越级爱国人人喊打”的残酷现实。

什么？爱国也有错?!

是的！在周朝，爱国也会被称为“贼”，即“爱国贼”。南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南蒯是鲁国执政官季平子的家臣，为费邑宰，为季平子管理费邑这个地方。季氏家族凭着当执政官的便利条件，结党营私，在鲁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季氏富于公室”的局面，而且专权，不把鲁国国君放在眼里，国君俨然成了傀儡。南蒯看不过眼，就找到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慭，说：“我负责扳倒季氏，把他家的钱财归还鲁国公室，我只要求您把费邑分封给我，让我当大夫。”能把专权的季氏搞垮，还能得到一大笔意外之财，公子慭当然愿意了。随后，南蒯就联合了鲁国大夫叔仲穆子等人，形成了一股反对季平子的力量。

没想到政治斗争进行到关键时候，公子慭居然临阵脱逃开溜了，陪父亲鲁昭公去晋国进行外事访问了。失去了公子慭这个政治靠山，南蒯在与季平子的政治斗争中，就明显处于下风。

南蒯不想坐以待毙，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跑到自己管理的费邑，准备发动起义讨伐季平子。到了费邑，南蒯和家乡人喝酒，家乡人却不同情他也不支持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指桑骂槐嘲笑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怎么能生出你这种杂草呵！和我们步调一致的，我们尊称他为先生；离弃我们的，我们集体鄙视他！背叛了友好邻居，更是可耻的事情！算了吧，算了吧，你不是我们的人了！”[注]

南蒯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但他还不死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想和费邑人结盟，然后举事起义。费邑两个德高望重的头领司徒老祁、虑癸就假装生病，派人请求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约，然而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不死，就请等病稍好一点再结盟。南蒯天真地答应了。后来，司徒老祁、虑癸两人联合费邑人士将南蒯劫持，并义正词严地说：“下臣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主人，只是因

为畏惧你，这三年才听命于你。如今大家觉得应当对得住季氏，不再怕你。既然你在这里不能满足愿望，就请你走吧！”南蒯仍不死心，以五天为期限，希望这期间情况发生变化，然而丝毫逆转也没有出现。五天后，众叛亲离的南蒯无计可施，只好逃到齐国谋生。

逃到齐国之后，南蒯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有一次，南蒯伺候齐景公喝酒。齐景公突然厉声骂他：“叛徒！”南蒯吓得胆战心惊，赶紧解释说：“下臣是爱国，是为了富强鲁国公室才不得已这么做的。”结果，齐国大夫韩皙严厉批驳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意思是，你身为季氏的家臣，却妄言加强鲁国公室的权力，你这是越级爱国，罪过没有比你这个更大的了。注

越级爱国，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事情何以至此？周朝层层分封代理制使然。

周朝封邦建国，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国君在封地内代表周王室进行统治，除了要听从天子的调遣外，还要按时朝见、进贡、跟随天子出征等。周朝分封诸侯，本意是一箭三雕。

其一，可以很快稳定局势。周原本只是西边的一个小国，现在分封的土地原本就不是自己的，而通过分封殷商遗留下来的土地却可以换来众多诸侯国的忠心和支持，有利于快速稳定战后的局势。

其二，可以很好地拱卫王室。分封的诸侯，比起周天子直接拥有的以都城为中心的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和人口，可谓小巫见大巫，不会挑战中央，却可相互制衡，拱卫王室。而且，分封的诸侯中，绝大多数都是同姓宗室子弟。注

其三，可以助益扩大疆土。每一个诸侯国都是一个根据地，可以以此为据点，对外进行扩张，达到扩充自己地盘的目的，进而增强自

己的实力。这也就间接地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封地内，周王并不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通过所分封的诸侯来落实、执行。也就是说，周天子作为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仅仅是名义上的，而诸侯国国君才是真正的政治实体，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最高权力。因此，周朝只是在表面上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注的局面，然而在层层代理制下，何尝不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注

虽然，周天子有权力废黜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诸侯，但随着形势的千变万化和实力的此消彼长，权力代理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各诸侯国“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终致尾大不掉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这也就注定了，被赶走的周厉王是再也回不到他的都城镐京和王宫了。

宣王中兴是沾厉王的光

周厉王被赶走后，发生了什么？他的改革被悉数废止了吗？

其实并没有。周厉王的改革并没有被完全废除，“专利”和重视农业的政策或多或少地被继承下来了，只不过没有周厉王推行得那么彻底而已。

反对周厉王改革并把周厉王放逐的人，为什么还会部分继承周厉王的改革政策？

原因很简单，谁当政都无法在财政悬崖愈演愈烈中继续把游戏玩下去。所以，以周公和召公为首的执政者们把“专利”和重视农业的政策部分地继承了下来，在有限范围里实施。但对严重威胁自身利益的其他改革则完全废止，特别是肢解大诸侯国和直接任命地方官的改革，只要想一想就恨得牙痒痒，那是绝对要不得的，是必须废止的。

尽管只是残缺不全地继承了“专利”和重视农业的经济改革政策，但仍然换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兴——周宣王中兴。

周宣王是谁？正是周厉王的儿子，名字叫姬靖。共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病死在了彘，于是姬靖继位，被称为周宣王。(注)

周宣王统治时期为何能得到“中兴”的评价？最主要就是四处讨伐，打了不少胜仗，让那些不顺服的周边族群和各地诸侯都顺服了。我们来看看周宣王都打了哪些仗。

征伐猃狁。猃狁是位于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部族，时常劫掠镐京周围的财物及人口。周宣王多次派兵征伐都获胜，特别是公元前816年，周宣王派虢季子白率军攻打猃狁，在洛水北岸大败猃狁，斩首500人，俘获50人。

征讨西戎。西戎是对中国古代西部部族的统称，长期威胁西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周宣王在位时，多次命诸侯征讨西戎，大获全胜。

东征淮夷。淮夷是淮河、汉江一带的东夷部族，多次入侵伊水、洛水流域。公元前823年，周宣王命尹吉甫向淮夷征收布帛、财宝、粮食及力役，后因淮夷停止纳贡以及再次反叛，周宣王派兵征讨，获得大胜，淮夷彻底臣服于周朝。

讨伐楚国。楚国的挑衅是见惯不怪的，公元前823年（周宣王五年）8月，周宣王派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兵车三千进攻楚国，大获全胜。

经过上述一系列战争，西周的疆域以及王室声望得到大幅扩大和提高。于是，周宣王作为中兴之主分封诸侯。楚国降服后，周宣王将舅舅申伯分封在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作为镇抚南方的军事重镇。吕国也在同时被周宣王改封于申国以西。周宣王还封韩侯于韩城（今山西河津至万荣县万泉乡一带），建立韩国，作为镇抚北方的军事重镇。周宣王封弟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建立郑国。此外，周宣王还封仲山甫于樊（今陕西长安区东南），建立樊国；封其子长父于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建立杨国。

此外，周宣王还效仿先祖兴畋狩之礼，在东都雒邑（今河南洛阳）会见诸侯。

衰落的周王室的权威重新得到恢复，诸侯又重新朝见天子，按时纳贡，四夷咸服，“宣王中兴”名副其实。

问题来了：周宣王哪来的钱打这些仗的？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专利”和农业的稳定发展，是沾了周厉王的光。

但到了周宣王晚年，中兴气象没能持续，为何？原因很简单，“专利”和农业稳定发展所增加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接连对外用兵，财政又重新陷于困顿，财政悬崖再次上演。

小 结

历史耻辱柱，放下周厉王

如果不是《国语》一书中记载了周太子晋回忆周史时所说的“厉始革典”[注]这一句话，周厉王恐怕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无翻身之日了。但历史终会还他一个公道，还后人一个真相。

其实，周厉王的谥号并不是“厉王”。

何为“厉”？“杀戮无辜曰厉”，就是暴虐狠戾的意思。实际上，在金文（青铜器上的铸文）中称周厉王为刺王，没有称厉王的。如周宣王时期的吴虎鼎铭重申“刺王”之命，宣王时逨盘铭中的“刺王”即厉王。金文“刺”字训为“烈”。也就是说，金文中周厉王的谥号不是厉王，而是刺王或烈王。“烈”，与“皇”字意近，有褒义。《谥法》曰：“安民有功曰烈，秉德遵业曰烈。”这是周宣王时对周厉王的评价。[注]

周厉王不仅不是个贪得无厌的周扒皮，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革家！

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西周江河日下的残局，顺应时代潮流，毅然推行社会变革措施，大刀阔斧实行全面改革。然而，周厉王虽然果敢刚毅，胸怀远大抱负，但毕竟缺乏政治智慧，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周厉王是一位志大才疏的角色”。“专利”、重视农业、加强王权、起用新臣、肢解大诸侯国、直接任命地方官等改革措施，严重损害了贵族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引起了贵族的激烈反对，以致发动政变。周厉王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而实际上，在分封制度下，由于层层代理导致“越级爱国人人喊打”，周厉王并没有同盟军，只是孤家寡人一个。周厉王既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打败反对他的贵族，也没有足够的财资去补偿利益受损的贵族，因此，周厉王的失败是迟早的、注定的。失败之后，周厉王被放逐，注定无法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最终死在了流放之地。

周厉王改革，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彰显了改革者的勇气，就算失败也是难能可贵的。

况且，改革虽会失败，但改革者们却不会放弃，将接续奋斗！

1. 谢文春：《西周“国人暴动”中的“国人”指什么》，载《历史学习》2007年第2期第24页。
2. 陶兴华：《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载《古代文明》203年4月第2期第57页。
3. 陈抗行：《“共和行政”后的阴谋角力》，载《小康》2009年4月刊第90页。
4.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5. 沈长云：《金文所见西周王室经济》，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984年。
6. 《诗・大雅・桑柔》载：“（周厉王）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唯宝，代食维好。”
7. 《周礼・夏官》载：“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8. 《周礼・夏官》载：“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9.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及周厉王之时，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10.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11. 程一凡：《琱生簋与厉王事件》，载《湖南大学学报》203年7月第27卷第4期第6页。
12.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13. 司马迁：《史记・齐世家》载：“桓公三十年春，齐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备，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贡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
14.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15.　　《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

16.　　《荀子·儒效》载：“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17.　　《诗·小雅·北山》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8.　　《左传：昭公七年》载：“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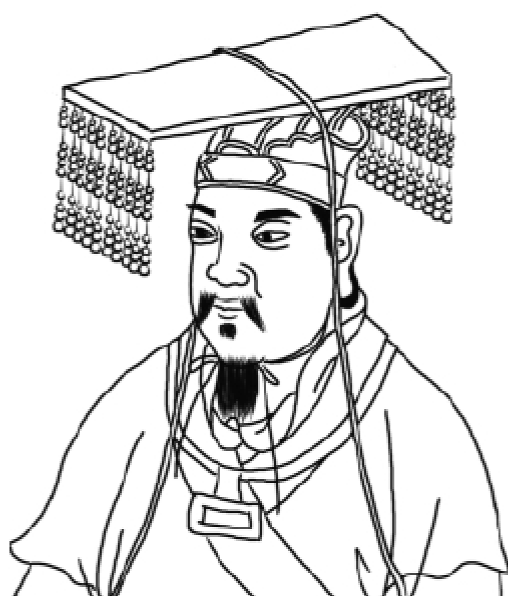
19.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20.　　《国语·太子晋谏》载：“厉（周厉王时）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

21.　　张应桥：《重评周厉王》，载《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3月第39卷第2期第5页。

第二章

秦献公改革：秦国超级逆袭真起点



逆袭的喜悦，是中国人欣赏的甜。秦献公的逆袭，不是一般人欣赏的甜，而是酒的辣，于是被藏在了历史的巷子深处。酒香也怕巷子深！

通常，我们是这样以为的。

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积贫积弱，于是决心图强改革。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以“废井田、开阡陌，鼓励耕织，奖励军功，实行郡县，建立户籍，创建连坐”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秦国由此转弱为强，完美逆袭，迅速发展强大，不仅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

其实，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推行了系统改革，让秦国转弱为强了，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秦国转弱为强的起点应该是秦献公改革，而且要归功于墨家的帮助。㊟

秦献公带领秦国完美逆袭

秦国从秦献公时期就已经由弱转强，何以见得？空口无凭，请看史实。

虽然秦国“祖上也曾阔过”，比如秦穆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但自从秦穆公昙花一现后，秦国就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秦献公执政前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秦国一直是“打打酱油”的角色。

怎么个“打打酱油”？

起初是东进受阻，只好留在西陲自娱自乐。秦穆公死后，继任者秦康公想往东扩张版图，于是向楚国靠拢，与楚国形成对晋国的夹击之势。当时晋国政局不稳，霸权基础不牢，于是楚庄王率军北上与晋国争霸，秦国就趁火打劫，数次攻打晋国的后方，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秦国不仅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还吃了许多败仗，丢掉了少梁等城池。秦康公之后，继任者秦共公、秦桓公，也多次跟晋国交手，同样是屡吃败仗。晋国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屡屡受挫之后，秦国只好囿于西陲自娱自乐，中原的事统统插不上话。

秦桓公的儿子秦景公即位后，起初也是奉行“联楚攻晋”的方针，可惜后来楚国主动退出了争霸行列，晋国重新成为当仁不让的霸主。至此，秦国再也无力与晋国周旋了，于是就安安分分地偏安一隅，向东不能出崤函，往南不能及巴蜀，在与霸主为邻的日子里，战战兢兢、踉踉跄跄地走完了春秋之路。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号称“三晋”，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然后是三晋伐秦，秦国节节败退处处挨打。当时，魏国实力最强，统率三晋联军。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侵吞了秦国的河西之地。秦简公、秦惠公数次发动战争，想要把河西之地夺回来，但次次都被打败。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发生在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做了充足的准备，起兵数十万，信心满满地要夺回河西之地。结果，在阴晋一战中，秦国大败，几乎输得倾家荡产，从此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完全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就是秦穆公死后到秦献公执政前的两百多年间秦国一直“打打酱油”的真实经历，说秦国是“积贫积弱、节节败退、处处挨打”，一点儿都不夸张。

但是！秦献公执政后，短短20多年，就实现了完美逆袭。

怎么个“完美逆袭”？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威胁周显王，秦献公借机起兵勤王。这事搁以前，简直不敢想象，像这样的麻烦纠纷，秦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却主动“找麻烦”。结果，秦军打败了韩、魏两国联军，周显王大大赞赏，秦国的地位飙升，又重新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下令秦军攻魏。这一战意义非凡，秦国不仅夺回了故土河西之地，而且“一竿子插到底”打过了黄河，深入魏国境内的石门，斩首六万，如此大捷前所未有。周显王投桃报李，特意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赐予秦献公与秦穆公一样“伯”（通“霸”，春秋时一方诸侯的首领）的称号。

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国又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不仅大败魏军，还把魏国的丞相公孙痤给活捉了；不仅收复了失地，还侵占了魏国的庞城（今韩城东南）。注

……

从屡战屡败到屡战屡胜，从节节败退到势如破竹，秦国从此威震东方！

怎么样？说秦国“完美逆袭”，名副其实吧。

怎么样？由弱转强从献公开始，所言不虚吧。

其实，司马迁早就告诉过世人，秦国由弱转强是从秦献公开始的。他在《六国年表》里写道：“（秦国）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注

可惜后世解读出了偏差，拘泥于字眼，认为既然是说“献公之后”，那就不包括秦献公本人了。实际上，是应该包括秦献公在内

的。就好比我们今天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就逐渐富起来了”，当然指的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中国就逐渐富裕起来了”。

废人殉补三百年人口欠账

让一个国家由弱变强，说起来虽然容易，但做起来怎一个“难”字了得。让秦国转弱为强，秦献公是如何做到的？

失败，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但要成功，千万种努力都不一定够。秦献公要做的有很多很多，但第一个必须要做的，就是废止当时民怨沸腾的人殉制度。

当时的秦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不管国都乡野，都在传唱一首歌，表达对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这首名叫“黄鸟”的歌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谁跟秦穆公去了？子舆家的奄息。

说起这位奄息，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个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飞来桑树上。谁跟秦穆公去了？子舆家的仲行。

说起这位仲行，一个抵得五十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个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息在牡荆树。谁跟秦穆公去了？子舆家的针虎。

说起这位针虎，一人当百不含糊。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个换他一个。

这首歌所传唱的事情，是秦穆公死后，当时秦国的三位贤良大臣奄息、仲行、针虎（三人都是子舆氏家族的），虽然个个矫健勇猛、善于作战，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都被殉葬了。根据历史记载，秦穆公死后，殉葬的活人高达177人，其中不少都是年富力强、可堪大用的将帅之才。

正值盛年，还是贤良大臣，都被拉去殉葬了，可见当时秦国人殉的风气有多么盛，人殉的规模有多么大，对民众的伤害有多深！

人殉制度对秦国国力的损耗不可小觑，以至于《左传》把秦穆公之后秦国一直“打打酱油”的原因归结于人殉制度。《左传》是这么说的：秦穆公还是不要名列春秋五霸了，他死后弃秦国人民于不顾，不仅没有留下富民强国之策，还要把贤良大臣拉去殉葬，很多家族因此断子绝孙，国家也因此难以富强，秦国后来积贫积弱没有能力去东征，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注]这话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古代统治者要富国强兵，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增加人口。因为有人种地，有人打仗，国家才能强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想尽办法招徕移民，努力增加人口。但秦国的人殉制度，各级贵族死后都要用活人殉葬，动不动就把数十人上百人活活殉葬，如此这般，人口怎么可能较快增长？人口增长不起来，粮食谁来种？仗靠谁来打？国家何以富强？

严重抑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只是人殉制度巨大危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非常大的危害是，人殉制度极大地败坏了秦国的国家形象，给秦国贴上了野蛮、愚昧、粗野、黑暗的标签，扼杀了其他各国的人才前来投靠的念头。

根据历史记载，孔子周游列国，但就是不去秦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秦国的人殉制度极为不满。[注]孔子不去秦国，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一直到秦献公，约3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士人到秦国去发展。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都说“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其实在当时同样如此。

问题的严重性深深震动了秦献公，于是在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也就是登基不久，就当机立断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300多年的以人殉葬制度。

废除人殉制度，秦国民众一片叫好。一方面，这为秦国保存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对秦国的农业生产、工商业发展都非常有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兵源，提升军事战斗力也就有了“水之源，木之本”。

废除人殉制度，属于“节流”，让非正常死亡减少；除此以外，还得“开源”，让妇女多生孩子，让别国的人愿意移民过来。

为此，秦献公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鼓励秦国妇女当英雄母亲——多生孩子，尤其奖励多生儿子；由于秦国地多人少，于是就大力利用这个资源优势，全力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来种地、放牧，移民与本国国民一视同仁，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

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秦国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人口红利初步显现，很多荒地逐步得到了开垦，粮食产量稳步增加，兵源质量稳步提高，结果自然是综合国力稳步增强。

与墨家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因为人殉，直到秦献公，几乎没有什么士人愿意到秦国去谋生。

废止人殉后，秦献公求贤若渴，有无人才“孔雀西北飞”到秦国发展？

不仅有，而且数量不小。其中，数量最多和最受待见的是墨家。

其实，秦献公早就中意墨家了。为何中意？这得从“孟胜殉城”说起。

墨家有一任巨子（巨子，是墨家首领的称谓）叫孟胜，是楚国贵族阳城君的老师兼家臣。阳城君命令孟胜带领墨家子弟帮助他镇守封城，也就是阳城，还把一块玉劈成两半，作为信符。阳城君交给孟胜一半，自己拿了另外一半，并盟誓约定好：“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信符，如果信符能完整地拼合在一起，就进行交接，否则拒绝交接。”

后来楚悼王死了，群臣围攻追杀吴起，在射杀吴起的同时误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阳城君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之一。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后追究责任，阳城君只好逃亡了。楚肃王派大军包围了阳城，并派人接管封地。孟胜对楚肃王派来接管封地的人说：“我受阳城君之托镇守此城，今天你们来收回封地，但是没有带信符来。虽然我们寡不敌众，抵挡不了城外的大军，但为了遵守信义，必须帮助阳城君守城，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胜的弟子徐弱劝阻孟胜说：“死，如果对阳城君有所帮助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不但对阳城君毫无帮助，还会断绝墨家传承，我认为没有必要死守。”孟胜想了想说：“不会的。我是阳城君的老师；即使不算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即使不算他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手下。如果我们不死守的话，那么以后有人要拜见良师时就不会想到墨者了，结拜好友也不会想到

墨者了，聘请好员工也不会想到墨者了。我这是为了墨家的道义而死，是为了让墨家的事业继续传承。我将巨子的位置传给在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位贤能的人，一定可以带领墨家强大，这样的话，就不怕墨家断绝、墨者绝世了。”徐弱听了以后，惭愧地说：“听了老师您的话，我受益匪浅，就请让我先死，为您在黄泉开道吧。”于是冲出去和楚军搏斗至死。最终，阳城被楚军攻破，孟胜殉城，追随他一起殉城的弟子有183人。[注]

孟胜殉城，让秦献公对墨家一诺千金的信义精神大为赞赏，心中荡漾着满满的好感。这是秦献公中意墨家感性的一面。秦献公中意墨家理性的一面，也是他强烈渴求的，则是墨家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

墨家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是什么？研发武器和攻守城池。

墨家是典型的“技术派”，特别擅长发明创造，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显高于其他诸家。根据历史记载，墨家发明的连弩车，能同时放出大弩箭60支，杀伤力非常强，更为巧妙的是弩箭的箭尾用绳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辘轳迅速卷起收回；转射机，较连弩车更为灵活，能够在一人射箭的同时由另一人将机座旋转；藉车，外面用铁包裹，一部分埋在地下，能够投射炭火，主要用来对付敌方的攻城队伍……[注]这些在当时可都是响当当的“高精尖”武器，是秦献公梦寐以求的。

墨家善于攻守城池，这从“止楚攻宋”一事中可见一斑。根据历史记载，楚惠王打算攻打宋国，于是墨子就从宋国来到楚国，劝楚惠王打消这个念头。楚惠王还真就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楚惠王的耳根子就这么软，这么不经劝？当然不是！原来，墨子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般用皮带当作城墙，用小木板当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攻防“推演”。“推演”结果表明，楚军没有胜算，楚惠王这才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当时的楚国，正值

复兴强盛时期，再度步上争霸行列，这样一个强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子的“推演”改变，可见墨家在攻守城池方面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秦献公非常中意墨家，可墨家会乐意效忠秦献公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秦献公登基不久就彻底废除了以人殉葬的制度，这深深博得了墨家的好感，因为墨家最主要的主张之一就是“节葬”，坚决反对人殉。

另一方面，秦献公征召墨者的时候，秦国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以“兼爱非攻”为信条的墨家所乐意效忠的对象。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而历史也将证明，秦献公和墨家的风云际会，将令整个世界骚动不安！

设改革特区搞“一国两制”

好事多磨，麻烦很快就来了。两百多年来，秦国在国际上也就是“打打酱油”的角色，可秦国的贵族在国内可不是省油的灯。

这边厢，秦献公任用墨家进行改革还没有来得及广泛推行；那边厢，秦国贵族们的反对声就已经不绝于耳了。

话说秦国两百多年积贫积弱，在经济方面，除了人殉制度让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白白杀死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的极度落后。直到战国中期，秦国所采用的土地管理制度，依然是自周朝传下来的已经千疮百孔的井田制。

井田，就是把一大块土地，三横三纵分成九份，最中间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为私田。在井田制下，农户以公田的产出为税，私田里的出产是完全归农户的。

井田制推行初期，情况还是不错的，农户们都兢兢业业地把公田种好，连久旱逢甘霖时，也会希望“雨水先浇灌好公田，再来浇灌我的私田”。[注]但这样的景象肯定不会长久，由于人性的原因，要农户们时刻都保持先公后私的觉悟是无法办到的。渐渐地，荒公务私现象就日益严重，农户们都在私田里下力气，在公田里磨洋工，这就导致了公田出产的降低，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普及应用和牛耕技术的广泛推广，大大提高了资源开发能力，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并成为私田，各种类型的私有土地急剧增加。私田数量虽然大量增加，但由于不必交税，而且多数都没有登记在册，因此国家的税收并没有得到增加，这就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收益。

国库空虚，财政缺钱，综合国力自然也就强不到哪里去。秦国也不例外。

针对井田制的种种弊端，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国家就早早完成了对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郑国的“作丘赋”。[注]这些国家要么根据土地的好坏贫瘠征收不同的赋税，要么依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不同的赋税，要么根据土地的实际出产征收一定比例的赋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承认土地私有，并以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

可是秦国，直到公元前407年，才由秦简公推行了一种叫作“初租禾”的土地改革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比齐国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晚了近300年。

可惜的是，初租禾制度受到了秦国贵族的激烈反对。这些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打着井田制的旗号无偿占有农户们的劳动时间，实际主要是耕作贵族私占的田地，一旦推行初租禾，私占的田地就没人去耕作了，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受损失。而且，井田制下，耕地名义是国君的，但实际被贵族占用，一旦推行初租禾，许多耕地就会为地主、自耕农所有，这是贵族们不愿看到的。在贵族的强力抵制下，初租禾并没有真正推行。

秦献公自然知道，在贵族势力的眼皮子底下推行改革，而且是损害贵族利益的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如果不推行改革，秦国将失去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就只能继续偏安一隅，抱残守缺，坐等亡国。

于是，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做了他上任后的第二件大事——迁都，将秦国都城从位于秦国中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位于秦国东部、靠近河西之地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至于理由，秦献公说得振振有词：这是下定决心，要与魏国死战到底；这是背水一战，要夺回河西之地；这是坚定信心，要重振秦国国威。如此冠冕堂皇，谁也反对不了。但实际上，秦献公主要是挣脱贵族聚集的旧都雍这个“囚笼”，另起炉灶搞一个秦国的“改革新特区”，实行“一国两制”，在和魏国长期进行拉锯战的秦东地区推行初租禾。

这是个一箭三雕的办法。

第一，魏国已经在河西实行了土地新政，给魏国老百姓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靠近河西地区的秦东地区老百姓早都跃跃欲试，从而让秦国在秦东地区推行土地制度改革有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第二，由于长期的拉锯战，今天魏国攻过来，明天秦国打过去，秦东地区的土地权属变更频繁，不属于秦国贵族的“私产”，“身家清白”，大大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难度。

第三，秦东地区远离秦国贵族的大本营，贵族们养尊处优，“享受在前，奉献在后”，并不愿意为秦国的二次创业出力使劲，也懒得过多涉足秦东地区，眼不见心不烦，对特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样，初租禾在秦东地区稳稳当当地推行了。初租禾的实施，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人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不仅百姓得到了实惠，国家的财政也因此丰盈起来。

根据历史记载，迁都栎阳实施初租禾后，不仅秦东地区的百姓得到了实惠，而且秦中、秦西地区的老百姓甚至周边国家的老百姓也纷纷涌向秦东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投奔秦献公，来到栎阳干事创业，栎阳很快就成为秦国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代替了旧都雍的地位。

户籍连坐“发动群众监督群众”

秦东地区，作为秦献公改革的基本盘，随着初租禾的推行，农业稳步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经济逐步繁荣，在秦国的分量越来越重，成为税源和兵源的主要基地。这让秦献公有了较为坚实的根基，在旧贵族面前真正站稳了脚跟。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是秦献公的心头大患，让秦献公坐卧难安。

究竟是什么心头大患？这得从秦献公的亲身经历说起。

话说秦献公也是个命运多舛的人，或者说是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

秦献公，秦灵公的儿子，即位前人称公子连。秦灵公死后，公子连的君位被他的叔祖父秦简公抢去了。为防不测，十岁的公子连逃到

东边的邻国魏国，开始了流亡生涯，这一流亡就长达29年之久。秦简公在位期间，朝政紊乱，国力衰減，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秦国人民怨声载道。秦简公的儿子秦惠公在位期间，也是乏善可陈。秦惠公死后，儿子秦出公即位，他只是一个两岁的婴儿，于是秦国政局陷入一个十分混乱的局面。秦人都希望能够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秦国走出困境。公子连可谓众望所归。此时，摆在公子连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从魏国平安回到秦国。起初，公子连一行人选择的是和魏国有陆路联系的郑氏塞，但是郑氏塞的守将右主然断然拒绝了公子连的入境请求，并且大义凛然地告诉公子连：“臣是有信义的人，一人不事二主，请你离开吧。”公子连气得要死，但又丝毫没有办法。于是，公子连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渡过渭水，朝最近的焉氏塞奔去，希望能从那里入境回秦国。驻守焉氏塞的守将是菌改，菌改二话不说，放公子连一行人入境了。注

饱受惊险、惊吓、惊骇的回国之路，在秦献公心底刻下了一道道不可磨灭的印记。秦献公深刻认识到，守城将士的忠诚和操守是多么重要，防谍杜奸一刻都不能放松——城防之法，宁失之过严，勿失之过疏。

而在秦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公元前381年），墨家巨子孟胜及其弟子183人集体殉城之后，负责城防的人选在秦献公心中已经是“舍墨其谁”了。秦献公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城县等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长官都从墨者中甄选。

墨家也对秦献公尽心尽力，拿出看家本领，做好城防工作。比如整编守城的士兵，每五个人编成一个伍，伍长负责；两个伍也就是十个人组成一个什，什长负责，称“什伍”。一个伍中，实行连坐，也就是只要有一人犯事，五个人都会受罚，由此促成五个人相互督促，增强团结性，提高战斗力，扼守城防，效果颇佳。这在《墨子・备城门》和《墨子・迎敌祠》中都有记载。

城防工作做好了，秦献公甚为满意。但秦献公还有忧虑：虽然城防工作做好了，但人民群众中如果有“谍奸之人”，该如何是好？于是，秦献公向墨家讨教，如何在人民群众中防谍杜奸？

墨家开出的药方，就是把用于城防的“什伍+连坐”的办法扩大到民间，建立户籍制，实行连坐制，让全国人民都成为君王的耳目，相互监督，有点发动群众监督群众的意思。墨家是这么说的：就算远在千里之外，有人做了好事，他的族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他的家乡人可能都不太知晓，但君王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并对他进行奖赏；同样，就算远在千里之外，有人做了坏事，他的族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他的家乡人可能都不太知晓，但君王却知道得明明白白，并对他进行惩戒。把全国的人都变成君王的耳目，这样一来，全国的人都会规规矩矩，不敢胡来。注

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秦献公接受墨家的建议，在秦东地区趁热打铁，建立户籍制，实行连坐制。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每五户为一伍，这五户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其中一户的人犯了法，其他四户也要负连带责任。也就是以倒逼机制，督促五户之间相互监督，遵纪守法。而且，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的编组是统一的，县连着乡，乡连着里，里连着伍，伍连着户，户连着口，于是就构成了以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链条。注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墨家的手段并不是要实行恐怖统治，出发点是向善的、反暴力的，是不滥刑的，从根本上是为人民谋福祉的。在平常情况下，“同伍连坐”之罪是有严格限定的，“伍人检举”也不是信口雌黄的。就算在军队里，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动辄连坐重罚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军功高

秦东地区，在秦献公的励精图治下，初步呈现了繁荣景象，秦献公自然很高兴。可“人怕出名猪怕壮”，秦国的旧贵族们也开始垂涎欲滴蠢蠢欲动了，都希望能被分封一块富饶的秦东之地。

为了防止改革的果实被旧贵族侵吞，捍卫改革成果，秦献公力挽狂澜，于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六年），把秦东地区的蒲、蓝田、善、明氏等地改为县制，不分封给任何人，由自己直接掌控管理。

县制并不是秦献公的发明，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萌芽了。春秋初期，秦国、晋国、楚国等，就已经在新兼并来的地方设县。县与封邑不同，封邑是分封给卿大夫的，国君并不直接管辖，而是委托卿大夫代理管辖；县是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区域，直接对国君负责，有利于国君对地方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的频仍，兼并更加频繁，设县的地方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国家在内地也设置了县，但是数量很有限。春秋末期，这一形势得以延续，兼并来的土地更加广阔，为了便于管理，有的国家在新兼并来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当时的郡，面积要比县大，但是由于位置偏僻，人烟稀少，所以地位要比县低。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逐渐得到开发，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于是在国家中的地位跃升为比县高，有的国家在郡的下面设了县，从而形成了郡县制。[注]郡县制使诸侯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一套比较完备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形成中央集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在秦东地区推行县制，秦献公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让秦献公在秦国的政治中真正有了主导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秦献公是拿什么理由力排众议从而推行县制的？

要知道，秦国的旧贵族们可不是吃素的，废立君主也不止干了一回两回，秦献公的前任秦出公就是被旧贵族们扔到黄河溺死的。[注]推

行县制，不是你秦献公空口白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至少得给个充足的理由，使之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秦献公确实给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那就是国难当前，大片失地还没有收复，要奖励军功，实行军爵制，鼓励秦人“守城则众志成城固若金汤，出征则英勇杀敌凯旋方归”，可谓“万般皆下品，唯有军功高”。这个理由太充足了，任谁也挑不出理来，堵住了贵族们的悠悠之口。

秦献公给出的理由之所以充足，是因为奖励军功、实行军爵制确实符合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

周朝分封后，各诸侯国普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亲亲尊尊”路线。后来，随着诸侯国的兼并，军功越来越受重视。西周共分封了成百上千个国家，几乎是一个城池一个国家。通过不断兼并，到了春秋初期，只剩下160多个国家，到了战国时代，仅剩十多个国家。[注]绝大多数兼并都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军功越来越受到重视。军爵制度在春秋时期就萌芽了，但施行的范围和程度比较有限。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的不断逐鹿和角力，军事形势的进一步严峻，在现实情况的倒逼下，按军功论爵位的观念越来越被接受。

其实，在秦献公改革之前，其他国家的变法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军爵制度。比如，魏国李悝变法，提出“有饭吃的人是通过劳动得到，拿国家俸禄的人是对国家有功的人”，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爵制的性质。

秦献公即位之初，百废待举，抵御外侮，首要的就是巩固城防，而巩固城防，取得墨者的帮助是最紧要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秦献公效忠之忱，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秦献公非常清楚，无论是推行县制，还是坚守城防，抑或收复失地，甚至攻城略地，墨者都功莫大焉。因此，奖励军功、实行军爵制，也是秦献公对墨者投桃报李，不是贵族子弟的墨者，也能通过军功被授予爵位。

后来，秦献公通过战争，不仅夺回了河西之地，还侵占了魏国的不少地方，这些新得来的土地，秦献公统统推行县制，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下。

废止人殉制度，大搞改革特区，落实实物地租，进行户籍改革，实行连坐之法，大力推行县制，明确军功导向，秦献公的系统改革，既是对以前积贫积弱病症的对症下药，也是对未来走向统一集权的提前布局，秦国的强大顺理成章。

商鞅变法是秦献公改革的“升级版”

废井田、开阡陌，鼓励耕织，奖励军功，实行郡县制，建立户籍制，创建连坐法，秦献公在秦国进行了系统改革，成为秦国转弱为强的真正起点。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商鞅变法就无关紧要、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

并不是。虽然秦献公改革是秦国由弱变强的真正起点，但商鞅变法将秦献公改革全面深化了，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秦献公改革，成为秦献公改革的升级版，因此商鞅变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的意义。

商鞅变法是秦献公改革的升级版，升级表现在哪些方面？

升级一：秦献公改革不太发动群众，而商鞅变法特别注重发动群众。

距今两千多年前（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政府在首都栎阳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材，并在旁边贴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材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奖赏十金（当时的“金”实为黄铜）。栎阳城规模并不大，从南门到北门的距离，也就几里路的路程。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任务，这么重的奖赏，天上掉馅饼也不会掉这么大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咄咄怪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去搬运木材。过了小半天，人越聚越多，这时旧告示被撤下来，换上了新告示。还是这根木材，还是从南门搬运到北门，赏金涨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过了小半天，终于有个人将信将疑地把这根并不太沉重的木材搬运到了北门。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告示所言不虚，这个人果真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注]众人既羡慕，又后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这起咄咄怪事的幕后推手，就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的商鞅。商鞅之所以干出这种让人啧啧称奇的怪事，就是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变法。

升级二：秦献公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而商鞅变法则扩展到了存量改革。

秦献公推行的军爵制实际上只有一条：只要有军功者，不管你出身什么门第、阶级和阶层，都能够享受爵禄，军功才是授予爵禄的最重要条件。而商鞅变法实行的军爵制还增加了一条：取消宗室贵族无条件的世袭特权，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而必须建立军功才能获得以前世袭的各种利益。[注]秦献公改革只是另辟蹊径，让军爵制度成为与传统贵族世袭制并行不悖的另一个重要的上升通道，而商鞅变法则要彻底得多，他是要让军爵制彻底地取代贵族世袭制，可以说是“贵族无军功，也喝西北风”。

秦献公推行县制，只限于秦东地区和后来兼并的土地，秦国旧贵族控制的秦中和秦西地区仍沿袭过去的分封制。商鞅不仅把对外战争兼并得来的土地实行县制，而且由于军爵制度的执行，不少贵族因没有军功而失去爵位和采邑，这些原本属于贵族的采邑，被商鞅整合以后设置成县。因此，商鞅时期秦国推行县制，不仅在增量（秦东地区和新兼并的土地）上做文章，而且在存量（贵族因没有军功而失去的采邑和乡）上做文章，因此广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秦献公时期，也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这让秦国比其他国家权力更加集中，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战争。

升级三：秦献公改革充满妥协和平衡，而商鞅变法十分彻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

重视农业方面。秦献公奖励耕织，并不限制商业活动，正常的工商业活动政府并不干涉。商鞅变法为了让国民都去种地，采取了诸多措施全方位、立体化抑制工商业发展。首先，对工商业本身严加限制。包括设置重重禁令壁垒，征收惩罚性重税，把商人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其次，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从事工商业必须满世界跑才能赚到钱，商鞅故意在这方面“卡脖子”，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再次，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从事工商业必须要有钱进行流通，商鞅做得很绝，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栎阳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国几乎没什么商贸活动了。

推行军爵方面。秦献公推行的军爵制，只是要激发民众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明确一个军功格外重要的导向。而商鞅推行军爵制，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全体秦国人都绑在了战车上，每户国人能分到多少土地，奴役别人还是被别人奴役，完全取决于砍了多少脑袋。因此，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居然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打仗，父亲送儿

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临行，还不忘千叮咛万嘱咐："你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注

伍什连坐方面。秦献公时期，"伍什连坐"之罪是有一定范围的，"伍人检举"并非漫无限制。而商鞅变法时期，连坐被滥用了。当时，无论是邻居也好、朋友也好，还是亲戚、亲人也罢，都缺少最起码的信任和安全感，为了明哲保身，纷纷沦为潜在的告密者。而后来所标榜的"（商鞅）变法推行了十年，秦国民众对变法一片叫好，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捡，大山丛林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国民为国家打仗都很英勇，喝酒闹事打架的事却不敢做，整个国家得到了大治"，注这与其说是商鞅变法让秦国民众素质大为提高，倒不如说是人人自危更为贴切。

此外，商鞅变法推行的征收重税、抑制文化发展等弱民、愚民、辱民的政策措施，也为后世所诟病，这些是秦献公改革所没有的。

小 结

秦国崛起了，墨家消失了

秦国自秦献公起转弱为强，之后国势日盛，迅速发展强大，不仅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可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墨家，却逐渐销声匿迹。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坑儒之时，墨家几乎已经完全湮没无闻了。

这实在是千古之谜！

但也有线索可追踪。

当秦献公征召墨者之初，秦国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以“兼爱非攻”为信条的墨者所乐意帮助的对象。合作之初，双方都觉得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鱼水两欢。可不曾预想，局势发展下去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

一则，经过秦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后，秦国已经变成强大的军事侵略国。这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阻碍了墨者组织的继续发展。

二则，战国时期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集权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多数被分配到了技术官僚机构的不同部门，不在权力核心，对意识形态影响非常小。

三则，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在被政府汲取利用后，边际效用递减，其地位和功用就注定会越来越“边缘化”。墨者和秦国统治者不是利益共同体，墨者只是秦国国君强国强军的技术棋子。

然而，墨者却无法抗拒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洪流，“飘啊飘，摇啊摇，像无根的野草”。

秦朝的建立，在政治上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君主从未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追求。

墨家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却无情地被时代化为吞噬自身生命的“黑洞”。注

诸子百家，哪个又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呢？

区别只是，五十步，还是百步。

1. 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载《光明日报》200年6月3日第0版“光明讲坛”栏目。

2.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

3.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4. 《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5. 左丘明：《左传·文公六年》载："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6. 《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孔子反对人殉制度的反问，意思是：第一个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难道就没有后嗣了吗？之所以用陶俑代替活人，是因为心中有仁。）

7. 《吕氏春秋·离俗·上德》："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8. 叶山：《攻守城器械及东周军事技术》，载《中国科技史探索》，第403~435页。

9. 《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10. 吴晔、马亮：《秦献公暗筑"改革新特区"》，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年9月20日第9版。

11. 《吕氏春秋·当赏》载："秦小主夫人用奉变，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术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寨，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塞守菌改入之。"

12. 《墨子·尚同·中》载："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13. 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载《光明日报》200年6月3日第0版“光明讲坛”栏目。

14. 《郡县制之始》，载《西部资源》2005年第2期。

15.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载：“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16.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7页。

17.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

18.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载：“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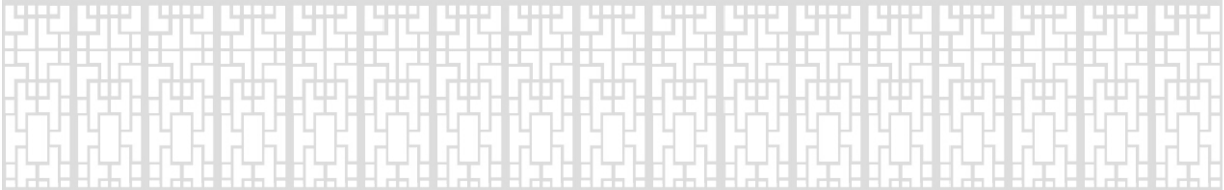
19. 《商君书·画策》：“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

20. 司马迁：《史记·商君传》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21. 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载《光明日报》200年6月3日第0版“光明讲坛”栏目。

第三章

汉宣帝改革：正本清源成就最鼎盛





治大国如烹小鲜。最厉害的厨子，不是用山珍海味做满汉全席，而是把已经串味的饭菜给正过味来。汉宣帝就是这样一个厨子。

汉朝最鼎盛、最繁荣的时期，是谁在位的时期？

十个人当中会有九个人回答“汉武帝时期”。因为教科书通常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汉武帝雄才大略，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治理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实际上，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是在汉宣帝统治时期。汉宣帝通过正本清源式的改革，让当时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军事强盛、四夷咸服，成就了汉朝最鼎盛、最繁荣的时代。

汉宣帝时更胜汉武帝时一筹

说“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并不是要哗众取宠而“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概括和总结。下面就让我们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对比一下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的情况。

先看人口。

在古代，人丁兴旺是国富民强的标志，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强盛与否的最主要标准。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至汉武帝前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30年），在70年“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加上汉武帝励精图治，西汉人口由1 300多万增长到3 400万左右，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汉武帝中后期（公元前129年~公元前87年），由于与匈奴的长年战争等原因，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国人口先是进入增长停滞期，随后显著下降，汉武帝晚年，人口减少到2 800多万；汉昭帝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86年~公元前2年），社会较为安定，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时期，并达到6 400多万的高峰。[注]汉武帝在位时期是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共54年；汉宣帝在位时期是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共25年。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人口最多时约为3 400万人，人口最少时约为1 300万人；汉宣帝时期，人口最多时约为5 000万人，人口最少时也必定超过3 000万人。换句话说，汉宣帝时期人口最少时，也跟汉武帝时期人口最多时旗鼓相当。

再看粮价。

在古代，粮食价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繁荣与否最主要的标准之一。一般而言，经济繁荣时期，粮食丰收，粮食供应充足甚至出现剩余，粮价就会走低；经济萧条时期，粮食歉收，粮食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粮价就会走高，甚至出现畸高现象。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争、不断的灾荒，农民流离失所，致使物价腾贵，奸商囤积居奇，

粮食价格更是首当其冲。汉高祖二年，一石（读dàn，古代粮食重量单位，二百五十市斤为一石）米的价格超过一万钱。注通过休养生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了汉文帝时期，一石谷的价格下降到几十钱。注之后，粮食价格逐渐稳定，一直到汉武帝早期，都没有大的波动。但汉武帝开始对匈奴的战争后，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粮价开始大幅上涨，一石谷的价格上涨到百钱以上，甚至数百钱。汉宣帝时，由于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一石谷的价格下降到只有五钱。注虽然谷贱伤农，但这也说明汉宣帝时期粮食连年丰收，粮食储备极度充盈，甚至到了粮食过剩的地步。

再看匈奴。

汉武帝时，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开始反击匈奴，历经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最终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决战中击败匈奴，奠定了战略上西汉对匈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是，匈奴没有真正臣服，经过十几年的韬光养晦后，匈奴又常常与西汉争斗，而且赢的多输的少。汉武帝后期，大将赵破奴的两万骑兵在受降城被匈奴击败，大将李广利的3万骑兵在天山被围歼了六七成，大将李陵的5000步兵在浚稽山接连失利，更惨的是大将李广利的7万骑兵全军覆没在燕然山。所以说，汉武帝并没有真正征服匈奴，与匈奴的拉锯战甚为艰辛。汉宣帝时，公元前72年，汉朝派出16万骑兵，兵分五路征伐匈奴，这是西汉东汉400年历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出征。这次出征，将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又经过10年左右的持续打击，匈奴的国力被大大削弱，从此一蹶不振，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以前，更希望与汉朝战，而不是和；现在更向往与汉朝和，而不是战了。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归顺汉朝，被封为归德侯。公元前51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西汉的首都长安，对汉宣帝俯首称臣，被称为“北藩”。因此可以说，是汉宣帝真正征服了匈奴，虽然是在汉武帝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管中窥豹就可得知，在文治武功的对比中，汉宣帝胜了汉武帝一筹。其实，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比如吏治好坏、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度等诸多方面，汉宣帝时期的状况都要比汉武帝时期更好一些，这在下文中会逐一展开，详细论述。

所以说“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并没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而是实事求是、名副其实！

“暗战”霍家积累改革权威

汉宣帝让汉朝进入最鼎盛、最繁荣的时期，也就是历史学家评价的“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注]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改革，而且是正本清源式的改革。

要推行改革，改革领导者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要推行正本清源式的改革，改革领导者的权威和力量必须更胜一筹才行。否则，既得利益集团就会进行重重阻挠，改革就会变成一纸空文，难以真正推行下去，得不到贯彻落实，让改革最终成为走样子，沦为花架子。

很显然，汉宣帝继位伊始，是没有这个权威和力量的。

汉宣帝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在霍光废黜仅当了27天皇帝的昌邑王刘贺（史称汉废帝）后登上皇位的。汉宣帝也深深明白，霍家权力极大，除了霍光本人摄政、权倾朝野之外，霍家还把持了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先看霍光的儿子霍禹，担任中郎将统率宫卫郎官；接着看

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再看霍光的两个侄孙，霍云担任中郎将统率宫卫郎官，霍山担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的骑兵；除此以外，霍光的堂兄弟、亲戚也都在朝廷担任了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实际上，霍光才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他的权势和声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注]汉宣帝时刻提醒自己，为了避免成为“昌邑王第二”，必须避其锋芒、韬光养晦。但汉宣帝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用政治智慧“暗战”霍氏家族，逐步积累足以推行改革的权威。

“暗战”第一回合：后宫后位之争

汉宣帝刘询尚在民间时，就有了结发妻子许平君，夫妻恩爱、情深意长，许平君给刘询生下了儿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公元前74年，刘询不经意间成了皇帝，霍光将次女霍成君嫁给汉宣帝为妃。立皇后时，汉宣帝的本意是要册封许平君为皇后，但由于霍家权势熏天，当时公卿大臣们都认为霍光之女是最佳的皇后人选，集体上书请立霍成君为皇后。两难之际，汉宣帝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下了一道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诏书：“朕在贫微之时曾经有一把宝剑，特别喜爱，视若珍宝，后来却不慎丢失了。如今我十分想念它，众位爱卿能否为我将其找回来。”群臣看了诏书，揣摩上意，知道皇帝的本意是要立许平君为皇后，同时也出于对霍光权势的妒忌和不满，于是一个个又改主意上书请立许平君为皇后。[注]霍光见势，也只好应允了。

汉宣帝利用公卿大臣与霍光的心结和矛盾，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隔山打牛，在不恶化与霍光关系的前提下，如愿以偿立了许平君为皇后，初步展现了过人的机警智谋。

“暗战”第二回合：武帝庙乐之争

汉宣帝刘询虽然是汉武帝的嫡曾孙，但由于受到其祖父戾太子刘据起兵反汉武帝的牵连，自小长在监狱，出狱后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抚养成人，地位低贱，并不具备储君候选人资格。当广陵王刘胥得知刘询被立为皇帝后，非常惊讶与愤怒地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霍光立刘询为帝，很大程度上也是觉得这个没有外戚撑腰、全无根基的布衣皇帝便于掌控。

如何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合法性、权威性？汉宣帝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琢磨。过了将近两年，汉宣帝终于想到了一个"一石三鸟"的好办法。啥办法？为汉武帝立庙。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五月，汉宣帝下了一道诏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命令大臣们讨论确立汉武帝的"尊号"（庙号）和"庙乐"。㊟大臣们很识趣，纷纷鼓掌赞成，唯独长信少府（皇太后寝宫的主管）夏侯胜，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反对，认为"汉武帝虽然有征服四夷开疆拓土的功勋，但还没到要为其立庙乐的地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丞相蔡义、御史大夫田广明赶紧带头声讨夏侯胜"大逆不道"，说他是"非议诏书，毁先帝"，这可是大罪。于是，夏侯胜被捕入狱，还被判了死刑。不过汉宣帝重拿轻放，既没有处死夏侯胜，也没有株连他的家族，仅仅是长期关押了事。（后来，汉宣帝大赦天下时，夏侯胜不仅出了狱，还继续做了官。）

经过这么一出杀鸡吓猴的"戏码"，汉武帝"尊号"（庙号）和"庙乐"的方案很快就拟定好了：尊汉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汉武帝生前巡幸过的49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让汉武帝像高祖（刘邦）和太宗（汉文帝刘恒）一样，享受世人的供奉和膜拜。

汉宣帝为汉武帝立庙如何“一石三鸟”？为汉武帝立庙，表面上是尊崇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实际上是宣示自己才是汉武帝的嫡系后代（祖父刘据是汉武帝嫡长子），显示自己才是继承西汉帝业的正统，自己继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是正本清源；打着汉武帝的旗号，霍光也只能支持，就算不支持，至少是不会反对的；当夏侯胜犯轴反对时，顺势将其问罪，给大臣们一个下马威，自己的权威就树立起来了。立庙一事，既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嫡曾孙的身份，又成功推行了自己的独立施政，还初步确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一举三得，初步展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干。

“暗战”第三回合：平定霍氏叛乱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撒手人寰。霍光死后哀荣至极，汉宣帝不仅按最高规格给他安排葬礼，还亲临葬礼，并加封霍光的众多子孙。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汉宣帝抓住机会开始亲理朝政。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权势不会自然而然地随霍光而去，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都控制在霍家的亲属和亲信手里，而且兵权也仍然掌握在霍家手中。于是，汉宣帝开始了解除霍家大权的步伐。第一步，解除霍家对禁军的控制。之前提到过，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卫尉，汉宣帝就解除了他俩的职务，紧接着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职位，让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都由自己的亲信担任，从而把禁军的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第二步，解除霍家对兵权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汉宣帝对霍光的儿子霍禹明升暗降，表面上官升一级提拔为大司马，实际上剥夺了他担任右将军掌握屯兵的实权。第三步，进一步架空霍家。汉宣帝对上书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前，吏民上书先经过尚书再转呈皇帝，领尚书事有很大的筛选权力；改革后，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

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通过这一系列步骤，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自己手中。

面对汉宣帝步步为营的夺权行动，霍家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丧失理智决定铤而走险进行叛乱，但汉宣帝早有准备严阵以待，叛乱根本就没能成气候。汉宣帝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平定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处以极刑，并废黜了皇后（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霍光的女儿霍成君，在汉宣帝的原配许平君许皇后离世后，被立为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20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

但值得一提的是，霍家灭族以后，霍光之墓未被牵连，依旧陪葬茂陵（汉武帝陵）。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抚今追昔，想起功勋卓著之臣，为了纪念和表扬这些功臣，他令人画了11名功臣的图像挂在麒麟阁，霍光名列榜首。为了表示敬意，11名功臣像唯独霍光不写出全名，而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这也显示了汉宣帝的政治智慧，威压和怀柔并用，既用霹雳手段，也显菩萨心肠，让活着的人更加为自己卖命。

至此，“暗战”终结，汉宣帝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推行正本清源式改革，汉宣帝具备了足够的权威。

正本清源从“打老虎”开始

正本清源，通常从“打老虎”开始，汉宣帝也不例外。原因很简单，打老虎立竿见影，能最快赢得民心，争得主动。

汉宣帝打的第一个“大老虎”，是位高权重名列九卿之一的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个功劳

叫作“决疑定策”，注因此被汉宣帝封为阳成侯，出任大司农一职，主管全国财政。

大司农可是一个大肥差，田延年也确实是把这个岗位当作大肥差对待的，结果就倒在了这个大肥差上。事情是这样的。

话说汉宣帝的前任汉昭帝年纪轻轻就忽然去世了，皇室事先并没有预备好修造陵墓的物资，所以非常着急。而茂陵的富户焦氏、贾氏等人，曾经花费了几千万钱，收购了大量修造陵墓的物资。焦氏、贾氏以为这次能卖个好价钱发笔横财，谁知高兴得太早，田延年不仅不肯花钱从他们手里购买，反而生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上奏皇帝，指焦氏、贾氏等商人蓄积建陵物资是非法勾当，应该全部予以没收。于是，焦氏、贾氏赔了个血本无归。

但焦氏、贾氏这些富户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吃亏之后，就盯上了田延年，出钱找人调查田延年的罪行，伺机报复。

而田延年也确实就是个贪官。一边厢，他借诏令没收商人的东西，似乎是替政府省钱；但另一边厢，他却凭借手中的财政大权，大做手脚，大肆贪污。为汉昭帝修建陵墓，要用大量的沙土，运输沙土又需要大量租用民间的牛车。拉一车沙土，要付给百姓一定数量的租金，田延年虚报账目，每车沙土都虚报两倍租金。陵墓修完，运送沙土的租金共花销了六千万钱，其中三千万钱进了田延年私人的口袋。

焦氏、贾氏两家花了不少钱，终于掌握了田延年贪赃枉法的真凭实据，于是上书告发。汉宣帝下诏，命丞相彻查这宗贪污大案。有大臣以“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为理由，为田延年说情，不过汉宣帝并不以为然，派人传话要田延年到廷尉那里去接受审查，结果田延年畏罪自杀了。

田延年并不是汉宣帝打掉的唯一一只“大老虎”，实际上，汉宣帝对贪污腐败向来毫不手软、严惩不贷，“拍苍蝇”一直不断，“打老虎”也一直不停。

腐败往往跟冤狱相伴而生，由于汉宣帝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深恶痛绝。“打老虎”之后，力矫严酷、平理冤狱，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汉宣帝关注的重点。

重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是汉武帝后期的弊政之一。当时的刑罚，严苛到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死人的血在街市上流淌，等待受刑的囚犯一个挨一个，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判处死刑。”何以至此？因为当时流行酷吏，负责判案的官吏把严苛当作严明，从而博得“公正”的美誉，但这绝不是真正的公正——由于公正断案往往会给自己招致麻烦，所以负责判案的官吏们索性就把案犯置于死地，这样做，并不是判案官吏恨人之切，而只是他们自保的办法。汉武帝晚年，虽然下了轮台罪己诏书，提出“与民休息，思富养民”，但刑罚深刻、重用酷吏之风积重难返，一时并未得到解决。汉昭帝时期，大将军霍光为防止大臣争权，仍遵循汉武帝时的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注所以官吏们都把严酷当作本事能耐。

汉宣帝即位后，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极力纠正酷吏之风。当时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为杀人如麻，被称为“屠伯”，汉宣帝对他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有代表意义。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在打击豪强、扶助贫弱方面功劳不小，但他滥用刑罚，不择手段，被他阴谋诬陷的人也非常多。严延年治理下的河南郡，每年到了冬天，就会把所属各县的囚犯集中到郡府门口，杀头处斩，往往流血数里，恐怖至极。因此，河南郡的人都称他为“屠伯”。严延年过于严酷，杀戮太重，连他的母亲都数落他的罪过：“你受皇上恩幸，能够担任郡守，独立治理千里之地。从没听说你施

行仁爱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反而一味依靠刑罚，动辄施刑杀人，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这难道是你做官的本意吗？”数落一番还没完，严延年的母亲更是预言：“天道神明，杀人太多的人必遭报应，我不愿在我老年时看见我的儿子受刑被杀戮！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海郡，等待你的丧期到达。”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汉宣帝查处，被处斩，并弃于市。

处理了严延年，汉宣帝琢磨，一个接一个地去处理酷吏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想到几个不错的法子，着力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首先，专设四名廷尉平。以往判案，各个郡的太守签署了就算是终审拍板了，冤假错案还真不少。汉宣帝派廷尉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帮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所有死刑判决，必须由廷尉复核才能生效，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

其次，恢复文景时期“平狱缓刑”的政策。汉宣帝亲政后不久，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公正判案做表率，并尽力平缓刑罚。据统计，汉宣帝每年平缓死囚达千人，而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的狱吏也会得到提拔和重用。

再次，废除那些伤害百姓的不合理律令。如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下令解除“首匿”罪；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免除触犯他名讳之人的罪；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下令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下令解除关于乡民相贺的禁令……另外，还多次大赦天下。其中，“首匿法”是指在打击逃亡犯本人的同时，还要惩罚逃亡犯的窝藏者。汉宣帝下令，如果子女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这样的情形都在人伦情理之中，无须连坐。

打老虎、矫严刑、平冤狱，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全国上下一片叫好声，汉宣帝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主动。

正本清源在整顿吏治中深化

打老虎、矫严刑、平冤狱，虽然成效明显，但汉宣帝明白，这只是治标。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早年的民间生活经历，让汉宣帝更了解社会实情，更知晓民间疾苦，深深懂得吏治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治本，必须抓住“关键少数”，从根本上整顿吏治，这就成为汉宣帝推行的正本清源式改革的重点。

整顿吏治，先从慎重选拔良吏着手

自幼生活在民间的汉宣帝，对汉武帝晚年以来地方官吏的“酷暴”深有体验，在此基础上，他意识到，一个地方治理得好坏，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全靠一方官员。所以，他对于地方长官和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先由大臣举荐，接着进行廷推，然后择日亲自召见，仔细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再做定夺。汉宣帝“慎选龚遂”，就是严格选拔良吏的典型案例。

汉宣帝在位时，渤海附近郡县闹灾荒，饥民纷纷起来造反，太守也没有办法。汉宣帝想选一位能够治理渤海郡的人，丞相和御史大夫都推荐了龚遂。汉宣帝不想轻易任用渤海郡太守，他要先亲自考查一下龚遂的人品、能力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再任用他。

刚见龚遂时，汉宣帝显然有些失望。当时的龚遂已经70多岁了，貌不惊人，又矮又小，汉宣帝担心他不能称职。于是，汉宣帝就问龚遂：“渤海郡法律废弛，饥民作乱，我很担忧，你准备怎么处理盗贼？”龚遂回答说：“渤海郡远离京师，没有称职的官吏去安抚，百姓饥寒交迫，不得已做了不该做的事，并不是真正的盗贼。就好比皇帝的子民拿着皇上的兵器在水塘中戏耍罢了，并不是真心叛乱。如今皇上是让我安抚他们呢，还是让我镇压他们呢？”汉宣帝听后心头微

微一惊，觉得语出不凡，于是说："选用贤良，当然是让你安抚百姓。"龚遂又说："我听说治理乱民就像理一团乱麻绳一样，心急不得，要有耐心才能治理好。我请求丞相和御史大夫不要过于束缚我，多给些自由裁量权，让我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

汉宣帝听了，觉得龚遂说得很对，也很实在，看来龚遂是个很有见地和能耐的人。汉宣帝十分高兴，额外赏赐黄金，派他到渤海郡上任去了。果然，龚遂不负汉宣帝厚望，把渤海郡治理得很好。很快，渤海郡百姓都安居乐业、殷实富裕，诉讼案件也没有了。[注]

整顿吏治，再从加强绩效考核发力

"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汉宣帝深知官员考核的重要性，因此在诏令中反复强调。

一直以来，官员俸禄体系都是"垂直薪酬"制度，一级官员严格对应一级俸禄。汉朝官制，三公最高，俸禄是一万石；九卿次之，俸禄是中二千石；以下还有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官员为了获得更高的俸禄，只能升官，于是很多官员往往把精力花在如何升官"往上爬"方面，而做好本职工作特别是为民众服务的激情却远远不够。可是，越往上官职数量越少，不可能大量增加，如何既不升官又能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是让历代君王头大的一件事，但汉宣帝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宽带薪酬"。

对表现优异而又提拔不了的地方官员，汉宣帝双管齐下，用物质奖励、精神激励的办法进行嘉奖。物质奖励方面，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精神激励方面，颁布诏书在全国通令嘉奖，甚至赐爵至关内侯。总之，就是让表现优异的官员享受到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的双重激励。

胶东国丞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功劳很大，汉宣帝就颁布诏令在全国褒奖，并把俸禄从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提高到中二千石（月钱九千，米七十二斛），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功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汉宣帝下诏称赞，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九卿持平，仅次于三公。注

相比于以往的垂直薪酬，汉宣帝的宽带薪酬有明显优点：虽然官员的职务没有得到升迁，但是利益得到保障，待遇得以改善，政绩得到肯定，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和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者树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激励措施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大量良吏、循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治理“合人心”，得到时人好评。

在宽带薪酬的基础上，汉宣帝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包括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严格执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也就是加强对二千石官员的考核管理，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视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优秀的进行奖励，称职的进行鼓励，失职的进行处罚。

在汉宣帝执政的24年中，不仅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也十分重视其他职能部门官吏的选拔，他先后6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吏为朝廷选拔优秀人才。另外，查阅汉宣帝一朝高级官吏的身世，不少是从基层小吏起步的。如位列三公的丙吉、于定国出身狱吏，魏相、张敞曾经做过郡卒吏，赵广汉担任过郡吏，尹翁归也是狱小吏出身。注

汉宣帝在吏治领域正本清源，对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多年持续的改进，终于革除了长期以来地方吏治中存

在的种种弊端，涌现出了一批勤于吏事、廉洁奉公、为民兴利除害的良吏，为后世所称道，也为中兴汉室奠定了基础。(注)

这些举措使汉武帝后期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严重社会危机得以平息，社会从动荡中又逐渐走向稳定。悬在汉宣帝心头已久、“稳定压倒一切”的这块“大石头”，终于可以平稳落下了。

正本清源在经济调整中升华

“稳定压倒一切”的问题解决后，“发展是硬道理”的任务必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本清源式的改革，紧接着就在经济领域广泛开展起来。

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不告缗，榷酤……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巩固国家统一，强化中央集权，保障边防稳固，助力开疆拓土，打击豪商巨富，扩大对外交往等等，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但换个角度，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来看，从民富与国强的平衡协调来看，却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汉宣帝认真总结汉武帝财政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改革。

汉宣帝时期，正本清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执行的力度从宰相丙吉“问牛不问人”的“怪事”中就可见一斑。这件“怪事”是这样的：

一天，汉宣帝的宰相丙吉出门视察。正走着，突然碰见一群人在打架，你推我一下，我攮你一下，打得难解难分。丙吉的车夫见状，正想开口制止，却见丙吉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瞅了一眼，然后说道：

“别管闲事，继续赶路。”车夫一愣，叹了口气，继续赶路，心里却一直在想“这老丙是咋回事？”

走了不多会，碰见路边一位老汉在赶牛，那头牛有气无力，气喘吁吁的。丙吉忙喊道：“快停车！”然后从车上下来，走到那头牛的跟前，扒开牛的眼皮看看，又撬开牛的嘴巴瞅瞅，然后问那老汉：“你们走了多长时间了？”老汉说：“不长，你们来时看见有群人在打架吗？这头牛就是从那儿走过来的。”丙吉看着牛转了几圈，叹了口气，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这时，车夫有点看不过去了，就问丙吉：“刚才那帮人都快闹出人命了，您连问都不问一声，现在一头牛喘了几口粗气，您就嘘寒问暖的。宰相大人，您未免也太颠倒轻重了吧？”

丙吉笑笑说：“打架的事儿自然会有地方长官管，我堂堂宰相只要负责考察地方长官尽不尽职就行了。现在还是早春，这头牛刚走几步就热成这样，说明今年的天气很反常，对粮食生产不是好事，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跟皇上商量对策，免得误了农业生产。否则，全国人民就得挨饿啊。”车夫听后连声称是。[注]

这件“怪事”，其实不怪，充分说明当时吏治清明，官员各司其职，更说明对经济的正本清源和调整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

其实，汉宣帝为正本清源，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是迁徙豪强。汉代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巨商大贾打着自由买卖的旗号，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兼并土地，导致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注]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汉宣帝决定迁徙豪强，先后三次下诏把“訾百万者”迁往平陵、

杜陵等地[注]，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土地急剧兼并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汉宣帝有选择地使用了一批酷吏，来执行迁徙豪强的政策。

二是假民公田。为了帮无地少地的贫民摆脱地主豪强的奴役控制，重新回归为国家的编户，充实国家的税户，汉宣帝下令将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进行耕种。史载，汉宣帝曾先后四次“假公田，贷种、食”。也就是把国家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并低息甚至无息借给他们种子和口粮。

三是减免租税。汉宣帝即位不久，公元前73年，他免除了当年的田租。接着，针对有些地方遭受了旱灾、地震和瘟疫，免除了这些地方三年的租赋。公元前55年，汉宣帝下令减免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针对老百姓认为算赋钱偏高的呼声，汉宣帝又下令进行减收，每1算减收30钱。公元前51年，汉宣帝再次免除当年的田租。

四是减省徭役。当时，徭役主要用在漕运方面，每年仅从关东向京师运送粮食400万斛，就需要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向汉宣帝建议，减少漕运，在离京师较近的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应京师。汉宣帝欣然允诺，一下子就减省了过半的漕卒，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五是设常平仓。汉宣帝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在谷价低的时候适当抬高价格收购粮食，在谷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卖出粮食，从而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保持谷价稳定，这被称为“常平仓”。[注]常平仓的设立，目的是为了稳定谷价、保障供应，但不是通过行政强制手段，而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通过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常平仓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还使国家常年都有比较充足的粮食储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有助于维持边防稳定，一举多得。

六是整顿工商。汉武帝时期的工商官营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来，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政府专门召开了盐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众臣对一些政策进行了激烈批评，导致取消了酒的官营政策，即“罢郡国榷沽”，但盐铁官营政策岿然不动继续执行。汉宣帝亲政后，继续调整完善工商官营政策，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从中可以看出，汉宣帝时期执行的仍是盐铁官营政策，不过经过整顿后的盐铁官营政策，其中的一些弊端，特别是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得到了有效抑制。公元前67年，针对民众普遍反映的盐价过高问题，汉宣帝下令降低盐价，减轻群众负担，还利于民。

汉宣帝的励精图治，给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生动的诠释和注解：不仅有效安置了汉武帝后期以来产生的大量流民，而且农业生产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粮食连年丰收，甚至出现过剩，谷价创造了汉朝最低的纪录，工商业的繁荣景象也遍及大街小巷。

正本清源在经营西域中拓展

“稳定压倒一切”的问题解决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任务也完成了，文治武功中的“文治”受之无愧了。那么，“武功”也能实至名归吗？

是的，毫无疑问！

汉宣帝时，汉朝彻底征服匈奴，匈奴彻底臣服汉朝，前文已经讲述，在此不再赘述。而这只是汉宣帝赫赫武功中的一件，大的“武功”还有拓疆西域、安定西羌等。

先看拓疆西域。

西域，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存了几十个小国家，(注)历来是匈奴和汉朝的第二角逐场。

西域起初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在西域专门设置了僮仆都尉（“僮”是受奴役的未成年人，“仆”是奴仆，“都尉”是高级武官名，以“僮仆”为官名，可见匈奴将西域各国视为自己的僮仆进行欺压）这一官衔，驻扎地在焉耆，号令西域诸国，并征税索贡。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特别是击败匈奴、征伐大宛后，汉朝的声威也拓展到了西域。有些西域国家，不满匈奴的奴役欺压，于是与汉朝通过使节频繁往来。汉朝见时机成熟，就在渠犁屯田驻兵。从此，汉朝和匈奴就在西域陷入了拉锯战，状态颇为胶着，彼长此消，变化多端，情势复杂。汉武帝后期，因数次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失利，汉朝在西域的声威有所减弱。汉昭帝时，霍光派大将傅介子出师楼兰，取得胜利，斩杀了楼兰王，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又有所加强。汉宣帝继位时，西域仍以天山为界，南边基本是汉朝的势力范围，北边基本是匈奴的势力范围。

车师地区在天山北边，属于匈奴的势力范围，对汉朝十分不敬。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在渠犁屯田练兵的郑吉将军收到汉宣帝的命令，率领附近西域诸国的兵士1万余名和屯田的汉兵1 500名征伐车师，非常顺利地就降服了车师。匈奴获悉后，派军前来试图夺回车师，郑吉早有准备，领兵迎击，匈奴兵败而逃。战后，郑吉就留守了300名汉兵在这里屯驻。

公元前65年，位于天山南边的莎车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国王的弟弟呼屠徵杀了国王万年和汉朝使节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叛离汉朝。当时郑吉还在天山北边，远水救不了近火。

这时，奉汉宣帝之命正在出使大宛途中的冯奉世，不失时机地果断采取行动，率领15 000余名西域诸国联军，攻伐莎车，平定了叛乱，攻破了都城，还把畏罪自杀的呼屠徵的首级一路传送回了长安。

为了更好地管理西域，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汉朝从此开始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西域都护，是受汉朝中央朝廷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属二千石官员，级别相当于郡太守。到西汉末年，前后任西域都护的人有18人。从此，匈奴不敢再与汉朝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地废除了。

设置西域都护，不仅是汉朝的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以后，西到乌孙、大宛，东到车师、鄯善，西域诸国都在汉朝管辖之下，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疆，都成为华夏之地、中华之域。

再看安定西羌。

汉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侵扰内地，甚至攻城夺地。不仅如此，匈奴想联合羌人对汉朝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针对的正是这种联合，只可惜愿望未能实现，派去的军队被羌人打败。

汉昭帝时期，为得到更多放牧的地方，羌人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而且各部落之间联合一致对抗汉朝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时，匈奴趁机而入，极力要与羌人结成同盟，共同侵扰汉朝西部的边疆。汉朝派去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惨重。

汉宣帝时期，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本来矛盾重重、并不团结的羌人部落之间开始化干戈为玉帛了，羌族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

落酋长两百多人“解仇交质”（化解之前的矛盾，相互派人质以巩固联盟），歃血为盟，联合起来共同侵扰汉朝边疆。

汉宣帝接到奏报，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群臣沉默不言。这时，忽然站出一位“白眉大侠”，汉宣帝定睛一瞧，原来是曾在边界跟羌人打过几十年交道、现已76岁高龄的赵充国老将军。

汉宣帝于是问道：“当前形势，有何见解？”

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之患，必须重视。一是羌族形势变了，原先羌族各部落之间互相攻击，汉朝坐山观虎斗易于控制，但近年来各部落间‘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匈奴死心不改，一直想与羌族结成联盟，不可不防；三是羌族可能与其他种族联合，共同反汉。”

汉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70多岁，还是有些担忧，于是问：“将军年纪大了，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赵充国自信得很：“放眼朝廷，没有其他人选比老臣更合适了。”

汉宣帝又问：“将军准备带领多少兵马安定西羌？”

赵充国回答：“听别人讲一百遍，不如自己亲眼一见。用兵多少，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制定攻守计划，画出作战地图，再向皇上奏报。请把攻打西羌的任务交给我，不必担忧。”注

汉宣帝听后，笑着答应了。

赵充国果然不负众望，虽年事已高，但督兵前线，照样冲锋陷阵、智勇双全，不久降服了西羌，安定了边陲。班师回朝后，又三次

向汉宣帝上书，提出“以兵屯田”的主张，防患于未然。汉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意见，收效甚好，西羌后来一直比较顺服安定。

至此，汉宣帝彻底在西北降服了匈奴、管辖了西域、安定了西羌，加上汉武帝时已经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大汉帝国东、南、西、北四方的边患都已经消除了，可谓天下太平，四夷咸服，四海归心。

汉宣帝，“文治”受之无愧，“武功”也实至名归。

遗憾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汉宣帝之后，汉元帝改弦更张，后面的皇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盛世就这样慢慢消逝了，而危机却步步逼近了。

小 结

汉武帝梦想，汉宣帝实现

“我有一个梦想。”

汉武帝的声音一直在历史的天空不断地回响。

汉武帝的梦想，上承汉高祖刘邦的愿望，那就是：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为了这个梦想，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接续奋斗，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积蓄实力。

西汉初年，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

市人口只剩下了十分之二三。汉高祖刘邦要出巡，居然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丞相将军们连马都配不上，只能用牛拉车，民间更是穷得叮当响，百姓没有一丝一毫的积蓄。

70年休养生息，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从人口方面看，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期，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比过去殷实富裕多了。从财政方面看，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家和民间都富起来了，仓库里都装满了积蓄，国家储备的钱财数以亿计，由于常年不用，用来串钱的绳子都腐朽断掉了，中央粮仓里堆了好几年的陈谷，不少已经腐坏不能吃了。注

手里有钱了，汉武帝就开始着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包含了汉高祖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开创汉朝最鼎盛、最繁荣的时代。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诸侯尾大不掉，匈奴侵扰不断，贫富差距悬殊，富豪离心离德，土地兼并严重……

汉武帝大破大立，功绩卓著：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实行“推恩令”，要求诸侯推广恩德，把封地分割给众子弟，封子弟为列侯，肢解了诸侯国，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没有削藩，更胜削藩，彻底解决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难题；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决战中击败匈奴，奠定了西汉强、匈奴弱的基本格局；收回铸币权、官营盐铁酒，推行均输法、平准法，政府牢牢把国民经济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牢靠……

可到了中后期，由于战争太久，拖累了国民经济，几大昏着儿对国家伤害甚大：算缗、告缗、不告缗，让全国的中产几乎悉数破产；盐铁酒官营，追求进度，不顾质量，官商勾结腐败严重；大肆重用酷吏，败坏了民风，导致流民剧增，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总之，汉武帝早期到中期，步步走向鼎盛，到了晚期，形势却急转直下，步步走向衰败，汉武帝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却最终功亏一篑。司马迁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汉宣帝正本清源，大力改革，既学汉文帝休养生息，又学汉武帝霹雳手段，“以霸王道杂之”，兼具汉文帝和汉武帝两帝之长，力避两帝之短。他在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同时还降服匈奴、统辖西域、安定西羌，文治武功，皆有大成，成就了汉朝最鼎盛、最繁荣的时代。

真是，汉武帝梦想，汉宣帝实现。

1. 综合[1]尚新丽：《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考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2]王平、王志伟、张学通、李春娥、王迅、冯琦胜、陈全功：《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载《西北人口》200年第5期；[3]王志伟：《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空间化方法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年。
2. 班固：《汉书·高祖本纪》载：“（高祖）二年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注：斛，古代民间对石的俗称。唐朝之前，斛=石=0斗；宋朝开始，改为斛=5斗，而石=2斛。）
3. 《太平御览·三十五·恒子新论》载：“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
4. 班固：《汉书·食货志》载：“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
5. 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载：“刘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
6. 综合[1]郝建平：《论汉宣名臣张敞》，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2]班固：《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7. 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列传上·孝宣许皇后》载：“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
8. 班固：《汉书·武五子传第三十三》载：“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

9. 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载："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唯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

10. 汉昭帝去世后，霍光等大臣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品行不好，"行淫乱"。霍光非常后悔，想废掉昌邑王另立一帝，却拿不定主意，就把田延年找来商量。田延年没有什么顾虑，对霍光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您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那为什么不奏明太后，另立一位贤君？"霍光又说："我现在确实想这样干，但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先例？"田延年说："伊尹是商朝的宰相，曾经废掉了商王太甲，保全了宗庙社稷，后世都称赞伊尹是忠臣。现在将军如果能这么做，便是汉朝的伊尹啊！"田延年打消了霍光的疑虑，所以说立下了"决疑定策"的汗马功劳。

11. 高福顺：《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2期。

12. 综合[1] 吕志：《汉宣帝慎选龚遂》，载《人才资源开发》202年第7期。[2]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载："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悦，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

13. 孙家洲、张忠炜：《试谈汉代官吏"久任"制的历史启迪》，载《光明日报》2006年2月28日。

14. 综合[1]高福顺：《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2期；[2]刘太祥：《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载《南都学坛》2006年第4期。

15. 综合[1]成国雄：《论西汉昭宣时代为何多循吏》，载《传承》2008年第2期；[2]高福顺：《盐铁会议与昭宣中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3]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载："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16. 马少华：《各司其职还是事必躬亲》，载《国学》202年第3期。

17. 荀悦：《汉纪·武帝纪四》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18. 班固：《汉书·宣帝纪》载："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元康二年（公元前65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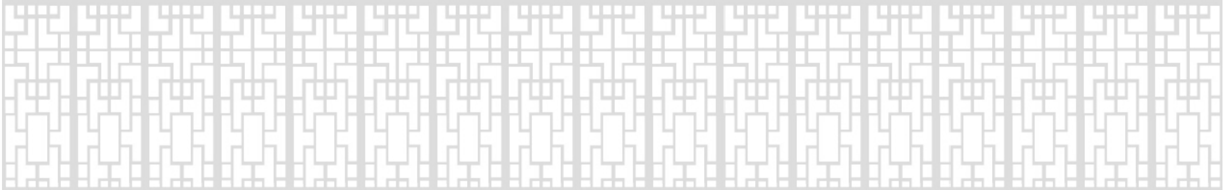
19.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载：“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20. 班固：《汉书·西域传序》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

21. 马士钧：《百闻不如一见——谈用事实说话》，载《新少年》2006年第期。

22.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第四章
王莽改革：在模仿中走进死胡同





王莽拿着一个叫改革的气球，要穿过一个种满仙人掌的花廊，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能够撑多久，那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注)

两千年来，王莽身上的骂名史不绝书，白居易的这首诗，一语道尽了古代史学家以“正统”观念认为王莽是篡位“巨奸”的论调。

到了近现代，虽然有胡适为王莽翻案，但也只不过把王莽看作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皇帝”。(注)

无论是把王莽当作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奸贼、佞臣，还是当作“空想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的所作所为都被认为是有违常理、荒诞不

经、异想天开，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最终，人民群众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了他的统治。

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这样的？

不妨先看他临死前的情景。公元23年（地皇四年）十月初一，长安城被暴乱的军队攻破。初三天明，守宫将士虽拼死搏斗，仍寡不敌众、死伤殆尽。王莽逃往渐台（在未央宫太液池中），平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陪在他身边的，还有身着盛装的公卿大夫、官宦、随从等1 000多人。[注]他们不像是等着被杀戮，而更像是殉道。生死存亡之际，如此多的公卿大臣心甘情愿地为一个行将末路的皇帝殉葬，而没有出现其他皇帝倒台时的“树倒猢狲散”的场景，不禁让人为之动容。

这个反常的情景，其实向后人透露了一点儿真实的信息：王莽死前并未众叛亲离，知识分子追随到灭亡的最后一刻。

这可从侧面证明，王莽改革并非荒诞无稽，而是遭遇既得利益集团联合绞杀，千古骂名也是拜既得利益集团所赐。

“儒经钻研透，当官如捡豆”

辉煌过后是暗淡。汉武帝的梦想由汉宣帝实现后不久，到了汉宣帝儿子汉元帝时期，汉朝就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

关于这一点，汉宣帝其实预见到了。

汉元帝刘奭（shì）“柔仁好儒”，当他还是太子时，眼看着父皇汉宣帝重用法家人物，常用刑罚惩治下属，很不以为然。一天陪父皇用餐时，刘奭乘机委婉地对汉宣帝说：“父皇使用刑罚略显过分了，

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听后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道：“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向来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么能像周朝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不少儒生迂腐得很，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却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都区分不清楚，怎能将治理国家的重任完全交给他们呢？”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将来动摇我汉朝基业的人，就是太子！”[注]

汉宣帝一语成谶——元帝好儒，纯任德教，重用宦官，威权旁落，西汉开始衰落。

汉元帝一即位，就重用儒生，大幅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汉宣帝时太学博士弟子保持在两百人左右，汉元帝时激增至上千人的规模。这些博士弟子往往官运亨通，每年都有甲、乙、丙三科考试，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官职。“留给子孙千箱黄金，不如留给他一本经书。”[注]这是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话。就连当时的儒学宗师夏侯胜也未能免俗，教导弟子说：“你们只要把经书钻研透彻了，当高官就像弯腰捡豆子一样简单。”[注]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入仕的主要途径。

以经取士，导致许多人读经的功利心过强，一切都只是为做官，因而在入仕做官以后，往往只图保持禄位而尸位素餐，并不尽忠守职，也不思进取。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景象：真正有管理能力的做不了官，做了官的人又只会空谈而无管理才能，士与吏分道扬镳，严重影响了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运行效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难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评价汉元帝：“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

与此同时，汉元帝重用宦官，导致威权旁落。汉元帝认为宦官没家没口，不会像外戚、功臣那样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于是始终依赖宦官石显。实际上，这样的“裸官”更可怕，石显早就有“外

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结成朋党，为害朝政。萧望之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家，也是汉元帝的师傅，却因遭石显污蔑抹黑而被逼自杀。当时，汉元帝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悲恸万分，立即把石显招来严厉责问。石显吓得语无伦次，摘帽跪拜，磕头不止。当时，刘奭即位才两年，此后直到自己病逝的14年间，刘奭每年都要专门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追怀。然而，对害死萧望之的石显，刘奭从没考虑过给予任何惩处。“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这是司马光对汉元帝的评价，说得真是一点儿也不错。

汉元帝柔仁好儒、威权旁落，导致豪强大行其道。汉元帝对此一筹莫展，而且病急乱投医——为了安抚豪强，消除豪强对西汉朝廷的二心，甚至把汉宣帝强力推行的将关东豪强迁徙到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取消了。一位名叫京房的儒生曾经问汉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汉元帝面带羞愧无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官僚世族渐成割据之势

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西汉末年，就形成了若干世代为官的高级官僚家族，也就是官僚世族集团：

实际控制鲁苏皖豫一带的刘永。刘永是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在其封国的基础上，联合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官僚世家，形成一个强大的实力集团；

实际控制益州的公孙述。公孙述的父亲担任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多年，后来就实际控制了蜀地；

实际控制天水的隗嚣。隗嚣出身陇右望族，少年时就被举荐出仕州、郡，后在长安任职，以家族武装为主体控制天水一方，后被推为

上将军；

实际控制河西五郡的窦融。窦融祖上好几代都在河西为官，高祖曾任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任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后来窦融被河西五郡太守推举为大将军；

实际控制南阳及周边地区的刘秀。刘秀是皇族后裔，是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代表，后来借助流民和豪强武装，推翻王莽，成为东汉开国皇帝；

……

这些官僚世族集团，都是因官而富，遂成一方豪强，虽没有宣布割据，但实际渐成割据之势，世世代代掌控着实际控制地，“蚕食”着西汉王朝。

在诸多官僚世族集团中，最显赫的显然是外戚王氏。

这个外戚王氏就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娘家。话说这个王政君，虽贵为皇后，但由于并不得宠，所以做人行事处处小心，如履薄冰。王政君共有八个兄弟，从大到小依次是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其中王凤、王曼、王崇与王政君是同胞所生。汉元帝时，王氏并不显赫。

王氏的显赫是从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开始的。母亲王政君的遭遇，汉成帝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十分孝顺皇太后，一心想着加倍回报皇太后。而孝顺的方式，就是没有原则地顺从皇太后的心意，百般厚待皇太后的母家王氏。

汉成帝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封皇太后的长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三个职位都异常显赫，个个都堪比宰相之职，而王凤一人担任三职，显赫得无以复加。而且从王凤以后，这个设置便

成为外戚王氏辅政的专职。这还不算，在皇太后的授意下，汉成帝在同一天内同时封皇太后的其余五个弟弟（王崇已先受封，王曼早死）为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日五侯”事件，这在前代是从未有过的事。

王莽，正是王氏家族的一员，皇太后的亲侄子。但他与众不同，很快便鹤立鸡群。

这个官二代不一样

在汉成帝继位后，外戚王氏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权倾朝野，毫无争议地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家族。

族中之人大多高官厚禄，声色犬马，醉生梦死，奢靡无比，而且还常常强霸一方鱼肉百姓，干些不法勾当谋取暴利。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立是皇太后的兄弟，是个投机倒把的高手。有一次，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然后再将这些土地卖给官府套现，就这么简单地倒腾一次，就赚了一亿枚铜钱。注有专家曾经做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一次投机倒把的纯利润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是3亿。

但也有人例外，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均十分周到；结交社会上的名流学者，侍奉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注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这个世家大族中，王莽绝对是个“另类”，但就是这种“另类”，让王莽声名远播，成为当世的道德楷模，注最有人气的“超男”。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并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时年他仅仅30岁而已。又过了8年，王根病重，病榻上向皇帝举荐王莽代替自己出任大司马。王根死后，仅仅38岁的王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司马，相当于首相。

别人是官越升越骄横跋扈，但王莽不是，他的官越大，反而越发低调谦虚。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了，有官员前来探望，在大厅里见到一个妇人穿着十分简陋，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后来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王莽还十分乐意救济名士，为此散尽家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给宾客，因此在高中级官员中声望非常高，人缘好得不得了。

正当王莽声誉正隆时，他遭遇了一次大的挫折——汉成帝驾崩，汉哀帝继位。王家受到排挤，汉哀帝祖母的母家傅家成了新的当权外戚，王莽被解职后，回到封地新都侯国，韬光养晦，闭门不出，等待时机。

在封地期间，王莽干了一件事，震动了朝野，声望更高。事情是这样的，王莽的儿子王获因杀了一名奴婢，被王莽痛骂，并被逼令自杀。这件事让王莽从道德模范上升为当世圣人，声誉更隆，官员们纷纷为王莽鸣冤，给汉哀帝的上书数不胜数。元寿元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征召王莽回长安，但没有官复原职。

王莽回到长安仅仅一年多，汉哀帝就病死了，9岁的中山王继位成为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王莽重新被任命为大司马辅政。

王莽此次辅政后，依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的声誉更加崇高。

王莽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反而封汉宣帝子孙36人为列侯，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赢得了皇族的支持；他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此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30顷，在他的带领下，共有230名贵族捐献田地，分给贫民……注

这些事，桩桩件件，和他被罢免时的一派乱象相比，真的算得上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而且，由于王莽善于引导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所以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纲纪有所恢复，社会风气也有所好转。

人气王高票赢得皇帝选举

渐渐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包括知识分子，纷纷认为“当世圣人”、“道德楷模”王莽是信得过的领袖，是自身利益的最好代言人。注

王莽执政半年后，士人纷纷上书，称他是当代圣贤，要求封王莽为“安汉公”，就像周朝封周公一样，增加封户28 000户。王莽三次上书辞让，但在朝野一致的呼吁和催促下，最终接受了“安汉公”这个称号，但没有接受新增封户。他越是拒绝接受封户，越是谦恭礼让，他的威望就越加崇高。

“王莽这么好，干脆让王莽做皇帝不是更好吗？”由于接连遇到几个昏君，朝野上下已经对刘姓子孙失去了信心，所以一个隐秘而大胆的想法在士大夫心中蠢蠢欲动。

如此大胆的想法，让每个想到的人都忐忑不安，却又跃跃欲试，但说出来的风险属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想方设法地呼吁提高王莽的地位，至于最后高到什么地步，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在此之前，大臣中威望最高的莫过于霍光，而王莽当时的声望，远远超越了霍光。这可从霍光和王莽之女分别参加皇后“竞选”的遭遇对比出来。霍光想让女儿做皇后，汉宣帝下了道“故剑情深”的诏书，大臣们就纷纷改变主意请立许平君为皇后了。王莽则以退为进，上书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身亡德，子材下”，资质平平，不宜参加皇后“竞选”。结果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吏民儒生守候在皇宫外面，每天上书的有千余人，公卿大臣纷纷到朝堂上表达立场，坚决要求让王莽的女儿做皇后。结果，太皇太后不得不下诏，让王莽的女儿“当选”为皇后。

在此以后，王莽一步步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宝座。

元始四年（公元4年），有大臣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列所有公爵之上。宰衡，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职务，是把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这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创的新名词。几天之内，就有8 000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辅政五年之后，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德行为天下纪，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加封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收到487 572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48万多件上书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西汉末年，全国人口约6 000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盲，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比48万多出多少。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次运动，支持率超过95%。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王公、列

侯、卿大夫达902人，几乎占了全部。(注)当年五月，朝廷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注)

元始六年（公元6年），汉平帝死，立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根据群臣之意，令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

公元8年，刘婴禅让，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称“始建国元年”，改长安为常安。

在朝野的合谋支持下，王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禅让实现政权更替的先河。

学汉武帝利用匈奴转移矛盾

王莽接受禅让做了皇帝，得天下是容易了，可坐天下却更困难了。

西汉末年，官僚世族鼎立，渐成实际上的割据之势，蚕食着整个帝国，皇族只不过是其中最名正言顺和相对最强大的一个。如果把西汉末年的国家比作一个股份公司，皇帝就是董事长，但是并不控股，处处受到掣肘。

王莽接受禅让当上皇帝，社会没有经历洗牌，各种对抗中央的势力依然存在，各种矛盾依然尖锐，社会的严重危机并没有缓解，王莽代表的王姓皇族只是从原来的刘姓皇族的蛋糕中切了一大块据为己有（刘姓皇族在王莽称帝后，迫于压力，虽然表面顺服，实际上绝大多数是阳奉阴违的），如今的中央外强中干，实际上相比以前是更加羸弱了。王莽不仅“不控股”，而且掌握的“股份”更少了。

王莽上台后，社会危机依然十分严重，为了转移社会矛盾，他决定利用匈奴维稳，就像汉武帝那样在抗击匈奴的旗帜下统一思想、集中权力、推行改革、缓解矛盾。

但是，自从汉宣帝彻底征服匈奴后，匈奴就一直老老实实做西汉的藩属，边境一直和平安宁。史书记载，当时塞外边城的城门关闭，原野上牛马成群，几代人生活安宁，连狗的吠叫声都听不到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也不用拿起武器去打仗了。(注)王莽代汉后，匈奴静观其变，并没有来侵犯，也没有挑起事端，如何利用匈奴？

有条件要利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利用！

王莽首先派人给匈奴单于换印。西汉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王莽将之改为“新匈奴单于章”，一个是“玺”，君王专用的，一个是“章”，普通人用的，档次一下就“飞流直下三千尺”。换印时，使节还没等单于看清新印的印文，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旧“玺”给毁掉了，匈奴单于想要回旧“玺”都不可能了。如王莽所料，匈奴单于果然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匈奴发兵进攻西域属国，同时派兵驻扎塞下，威胁新朝，但并没有攻打新朝。

王莽认为还不够火候，于是又把呼韩邪单于的15个儿孙都召去，指着地图把匈奴一分为十五，把这15个人都分封为单于。匈奴单于知道后，非常生气，后果更严重了，“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于是，匈奴派兵掳掠了边境城市云中等地。(注)

边境出现危机了，形势紧张了，国内的视线转移了，王莽的目的达到了。

王莽任命了十二部将帅，征调了几乎全国的军队，打开府库，派发武器。整整30万人集结在北部边境，远远超过了西汉时期任何一次

派兵的数量，一时间战争阴云密布，进攻匈奴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

虽然天下骚动、摩拳擦掌，可是，只见转运粮草、囤积兵力，却始终不见动真格的。王莽这是要干啥？部将严尤以为王莽还在考虑进攻策略，于是给王莽上书，认为用30万人打匈奴，纯属杀鸡用牛刀，应该派精锐部队，快进快退，对匈奴进行突然打击。但王莽没有采纳，继续摆姿势、做样子，但就是不动真格的。

严尤心眼太实，没看出王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莽进攻匈奴是假，囤积兵力是真，匈奴只是外患，癣芥之疾而已，内部叛乱才是心腹之患。转运粮草、囤积兵力的目的，不是要进攻匈奴，而是备着以防内部叛乱。

匈奴单于见边境集结了如此多的军队，心中也打起了退堂鼓，毕竟实力相差悬殊，而且几十年没打仗了。于是，匈奴单于一方面做匈奴人的工作，要匈奴人保持克制；一方面派人到新朝朝廷，希望重新修好。

开弓没有回头箭，王莽还指望着继续利用匈奴维稳，所以只好继续玩弄匈奴：一会儿立这个人为单于，一会儿立那个人为单于，而且还把匈奴单于的级别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甚至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

还有更抽风的：鉴于国内已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为了合起来凑全“四海”，王莽要求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臣服于汉朝的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原本的称谓为“王”，王莽将之统统降格为“侯”；另外，还把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

改革是场“汉武帝模仿秀”

边境出现危机，国内视线转移，王莽于是开始大力推行他的改革了。一些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包括货币、财政、土地、官制等领域，处处都是模仿汉武帝。

货币改革，套用汉武帝

汉武帝的货币改革分为两步。注

第一步，为了筹措与匈奴打仗的军费，汉武帝废除了原来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三铢钱。皮币，就是块鹿皮，面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三铢钱，就是重三铢的钱。皮币、白金币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为保证三种货币能够流通，汉武帝规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税都必须以皮币、白金币缴纳，他不收零钱（三铢钱）。汉武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皮币面额实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汉武帝要求王公巨富必须以黄金向少府（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兑换皮币，黄金于是就聚集到了皇帝手中；白金币针对普通富人，必须用足值的四铢钱换取白金币；三铢钱则针对自耕农，自耕农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铢钱兑换三铢钱。通过这一步，汉武帝严重剥夺了贵族、富人的财富，也顺带稍稍地剥夺了一下自耕农，筹措了大量军费。

第二步，一年后，废除了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全国统一使用五铢钱。

王莽的货币改革其实也是两步，但他把第一步和第二步都重复了一遍，所以总共是四次货币改革。注

第一次货币改革，是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可兑换50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十两黄金。为保证“大泉”和“错刀”能够流通，王莽下令，一年后所有黄金都不再流通，一律没收。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吏豪强手里才有黄金，这次货币改革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剥夺豪强财富，同时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这样反抗不会过于强烈。一年后，王莽筹到了大量的黄金。

掠夺了这么多黄金，王莽觉得应该差不多了，于是实行第二次货币改革，废黜“错刀”，保留“大泉”，增发“小泉”，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缴纳税赋都要以“小泉”计算。

又过了一年，王莽发现官吏豪强手中的钱还有很多，而朝廷又缺钱了，决定再剥夺一次，于是实行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宝货制十分繁杂，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2 160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216枚铜钱。王莽的如意算盘打得是很好，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剥夺官家豪强的财富，可问题是，如此复杂的币制，在实际操作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宝货制实在无法推行，于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实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废除宝货制，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25铢、货泉重5铢，实际上就相当于恢复了西汉的五铢钱。

财政改革，承袭汉武帝。

王莽财政改革的措施是五均六筦。

五均，是对汉武帝平准均输法的发展，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治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当时的西汉，主

要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政府在这六大都市中设五均官，由五均官负责管理物资调配和物价监控。五均官以每个季度的中月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做基数，又参照商品质量的高低，将每种物品的价格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就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任其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价加以收购，以防止农户因此破产。另外，五均官还管理赊贷业务。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救急，如祭祀丧葬的费用，不收利息，但期限很短。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本钱，按纯利润的十分之一收取年利，期限比较长。

六筦，是对汉武帝盐铁官营的发展。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自汉武帝以来就一直在实施。酒的专营，在汉武帝时曾经施行，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后改收酒税；王莽时又恢复专营，规定卖酒毛利的七分都要交给政府，剩余三分作为各种费用和成本。名山大泽出产产品的征课，过去也曾经施行过，王莽时规定得更加明确：凡开采金、银、铜、锡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交给政府作为“贡”；经营这些产品而不向政府申报的，或申报时有隐瞒的，不仅将产品全部没收，而且还要罚一年劳役。注

土地改革，模仿汉武帝

王莽以“王田制”推行土地改革，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王莽的土地改革，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

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与此同时，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注

仔细思量，就会发现，其实王莽的王田制并不是要回到周朝的井田制，而是打着恢复井田制的旗号，对每个人应该占有多少土地进行了详细的限制，并且对每一家的占田数量明确了上限。王莽的土地改革，其实是一部限制豪强占有土地和奴仆的法令，是对汉武帝限田限奴政策的模仿。

汉朝为堵塞土地兼并之路，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一直采取“限田”措施。汉武帝时派刺史巡察地方，其所颁“诏书六条”的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可见当时有着按照社会地位等级限制私人土地面积的明确制度。对于处理“田宅逾制”的豪强，往往采取暴力剥夺的办法，按爵位另行授予土地，而将原籍土地收归国有。但是，土地兼并是经济规律使然，所以愈演愈烈，无法遏制。伴随土地兼并、小农破产，奴婢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王田、私属，这两项政策，是王莽开出的“药方”，分别针对西汉以来特别突出的土地和奴婢这两大社会问题。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却根本实行不了。

改革官制，效仿汉武帝

重新当上大司马后，王莽动作很迅速，很快就张罗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班底：心腹谋士是王舜、王邑，负责决策的是甄丰、甄邯，掌管机密的是平晏，撰写文诰引导舆论的是刘歆，等等。

当上皇帝后，他效仿汉武帝，在中央官职上进行增量改革，以增量消解存量，让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新朝建立后，始建国元年正月，王莽建立了一整套建立在原西汉官制基础上的新官制，其重点是十一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有很多都是王莽新增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都列于九卿。

通过改革官制，王莽大权在握，独断乾纲。

件件都有汉武帝的影子，处处都是汉武帝的痕迹。由此可见，王莽推行的改革，就像是一场“汉武帝模仿秀”，他想跟汉武帝一样，把历史的车轮拉回正常的轨道。

改革仅仅搭建了“纸牌屋”

王莽在模仿汉武帝时，想必是信心满满，期待立下汉武帝一样的功业。可惜，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模仿，不仅没挣得功业，反而失了江山、掉了脑袋。

为什么王莽模仿汉武帝，改革措施雷同，却同途殊归、天差地别？

在中央权威方面，两者天差地别

改革，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力推行。

汉武帝启动改革时，“七国之乱”已经平息，削藩基本成功，中央具有不容对抗的权威和集权能力。

反观王莽改革，夺取汉家江山，未动一兵一卒，开创了封建社会通过禅让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先河，堪称“光荣革命”。但事情都是两面的，这种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也给王莽带来消极影响，让新莽政权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结构的触动非常少。因此，王莽推行改革时，官僚世族鼎立，中央只是官僚世族中最大最强的一个。总的来说，中央是软弱无力的，能够对抗中央的政治实力集团不止一个两个。

在政权认同上，两者也有差别

汉武帝推行改革时，汉朝中央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质疑中央的合法性，也没有人是想对抗中央的。

王莽推行改革时，新朝中央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不仅原来的刘姓皇族们是反对中央朝廷的，而且很多世族豪强也在封地或控制地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事实证明，后来取代新朝政权的正是割据地方的豪强集团。

在统一思想和转移矛盾方面，两者同途殊归

为了统一思想，转移视线，把人民发动起来，汉武帝选择了对匈奴作战。由于汉朝成立以来，匈奴就一直不断侵扰汉朝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怨很大，因此对匈奴作战顺应了当时的民心，为改革赢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王莽虽然效仿汉武帝，利用匈奴维稳，但由于之前与匈奴打仗几十年，彼此消耗太大，人民深受其害，反对战争。而且，此时匈奴已经归顺，和平相处了几十年，人民普遍反对战争。王莽效仿汉武帝，利用匈奴转移国内视线，违逆民意，不仅不能为改革赢得舆论支持，还给改革背上了不得人心的战争负担。

而匈奴单于后来失去了耐心，铁了心反王莽，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如此。这样一来，事情就超出了王莽的设想和把控了，苦心经营的数十万军队因此长期陷于边疆，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导致中原空虚，可用之兵所剩无几，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王莽本来是想利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来转移国内矛盾的，结果搞砸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时间窗口上，两者差别悬殊

汉武帝改革，是建立在70年“文景之治”厚实的基础之上的。长期的休养生息政策让民间真正富起来了，但民间只是富，虽然出现了豪强，但还没有变成政治实力集团，易于推行改革，进行利益再分配。

刘汉王朝留给王莽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不可救治的烂摊子，不仅财力疲弱，而且天灾不断。另外，财富主要集中在官商一体的官僚世族集团手中，要推行改革进行利益再分配，无异于与虎谋皮，难度可想而知。

在政策落地上，两者泾渭分明

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削弱或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特殊利益，动人家的奶酪，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对。

汉武帝推行改革，依靠的是独立于贵族、诸侯、豪强等既得利益集团以外的官僚集团，特别是任用酷吏，手段霹雳，快刀斩乱麻，执行力强，效果明显。

王莽“新政”实际上是由被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执行的。看看王莽政府的组成，辅国重臣都曾经在西汉为官，除了前朝宗室外，统治阶层的总体构成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权力结构也没有本质的变

化，利益结构也没多大触动。在这种情况下，后果可想而知，改革的阵痛被转嫁到人民群众的头上就不可避免了，一些好的改革措施异化为残害百姓的工具，善政硬是扭曲为新的暴政。

因此，王莽改革，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只是搭建了一个“纸牌屋”，风一吹就七零八落了，根本经不起困难的洗礼。

小　结

模仿汉武帝，却成替罪羊

西汉末年，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

一方面，官僚世族持续做大，尾大不掉，遂成一方豪强，虽没有宣布割据，但实际渐成割据之势。“我的地盘我做主”，世族世代掌控着实际控制地，“蚕食”西汉王朝，皇帝逐渐失去了对江山的“控股权”。

另一方面，统治者荒淫无道。汉元帝奢靡无度，溺于声色；汉成帝荒淫有术，治国无能；汉哀帝则癖爱男色，动辄赏赐千万，男宠董贤死，家财竟达四十三万万钱。皇帝的荒淫无道，加剧了统治危机。

至此，西汉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人心丧失，王朝行将倾覆，已成意料中的事。

“救星”似乎来了——王莽，一个道德楷模，一个当世圣贤，未动用一兵一卒就在万民拥戴下轻易夺取汉家江山。

“曙光”似乎闪现——为了力挽狂澜，王莽效仿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将历史的车轮拉回正常的轨道。

可惜，已经迟了。

此时的西汉社会，犹如一幢经历地震后的危楼，摇摇欲坠，只有框架残存，早已失去了肌体和灵魂，已到无法挽救的地步。无论王莽的改革策略是否高明，也无论他的统治手腕是否高超，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已经注定在所难免。而且，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注定王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的，因为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结构几乎没有触动（仅刘姓皇室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王莽这个皇帝比之前的皇帝对江山的“股份”更少。

也就是说，王莽改制，既不是一场篡位的阴谋，也不是一场空想的试验，而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并且是模仿汉武帝的改革。可悲的是，王莽面临的严峻形势是汉武帝面临严峻形势的“升级版”，而王莽本人却只是汉武帝的“降级版”，这场“模仿秀”式的改革注定会走进死胡同。所以，由“开国之君”沦为“亡国之君”，王莽的下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不难看出，王莽建立的新政权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就是西汉王朝的借尸还魂，西汉末年的所有社会问题，一样不少的全都存在于新莽政权中。而且，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不可能仅仅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王莽推行的改革，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统治危机。

王莽的改革与王莽的败亡，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刘汉王朝留给王莽的本来就是一个烂摊子，即使王莽不改革，新莽政权一样会灭亡，因为历史没有赋予他任何的回旋余地。无论是拿着“新船票”的王莽，还是拿着“旧船票”的刘姓皇族，都无法阻挡西汉这条破船沉没的结局。王莽只是西汉腐朽政权的替罪羊罢了。

一句话，王莽不改革是等死，适度的改革是缓死，剧烈的改革只能是速死。注

刘姓皇族必须感谢他，如果没有王莽把矛盾全部吸引到新朝和王氏家族身上，经过一场社会大动荡后，皇权绝不会回到刘氏手

中。

从皇权回到刘氏手中的那天起，王莽就注定成为“罪人”，因为刘姓皇族需要一个替罪羊，去承载连山川都载不动的悲哀。

1. 陈为人：《王莽岭颠覆“授命说”》，载《社会科学论坛》203年04期。（备注：白居易被贬江州，途经太行王莽岭，曾经感慨地赋诗《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以摄政周成王的姬旦与王莽作比照，写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名句。于是盖棺定论，把王莽钉上了历史耻辱柱。）
2.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3年版，第65页。
3. 葛剑雄：《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上海书店出版社。
4.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5. 班固：《汉书·韦贤传》载：“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6. 许家鹏：《“儒术独尊”与“霸王道杂之”》，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7.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房曰：‘《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
8. 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3年版，第66页。
9. 葛剑雄：《我看王莽》，载《读书》997年第0期。
10. 袁媛：《历史让我们心平气和》，载200年0月8日《中国经营报》。
11. 张宏杰：《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5月上半月刊。
12. 张宏杰：《王莽本纪》，载《当代》2006年第期。
13. 张博文：《改革失败很可怕》，载《大科技（百科探索）》2007年9月下半月刊。
14. 综合[1]陈为人：《王莽新政的“授命说”拷问》，载《名作欣赏》202年第8期。[2]张宏杰：《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5月上半月刊。

15. 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载："元始五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请赐王莽九锡。……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亲赐王莽九锡。"

16. 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17.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十七卷》载："莽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诸子，欲以次拜为十五单于。苞、级使译出塞，诱呼左犁污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皆厚加赏赐；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

18. 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3年版，第6~62页。

19. 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3年版，第82~87页。

20. 综合[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五均六筦"词条；[2]罗开玉：《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商业大都会的建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6期。

21. 班固：《汉书·王莽传》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22. 陈忠锋：《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第五章
汉明帝改革：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



历代官员都爱对着皇帝撒娇，对着百姓傲骄，汉明帝不解“娇骄”风情，专治各种官场矫情，于是官员们再也不敢撒娇傲骄了。

汉明帝刘庄手提一根大棒，抬手便是一棒，砸向面前的侍从尚书郎药崧。

药崧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汉明帝见药崧居然敢跑，一下子怒不可遏，提起大棒就追，边追边没头没脑地朝药崧打去。两人一个逃一个追，绕大殿转了数圈。药崧体力不支，实在跑不动了，于是找了个空，一头钻进了床（古代的坐具称为床）底下。

汉明帝在床边，一边拄着棒喘气（刚才的追赶也让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一边恶狠狠地向床下的药崧大吼：快给我滚出来，乖乖挨我五十大棒。

床下的药崧好不容易才喘得过气来，不慌不忙地顶了一句：自古以来，天子庄严肃穆，就没听说过有当皇上的亲自拎着棒子追着人打的。

汉明帝闻言一愣，想了一下，把棒子一扔，说道：“算了，恕你小子无罪，出来吧。”注

这闹剧似的一幕，不是后世小说家的虚构，而是真正发生在汉明帝刘庄身上的事情。

这个汉明帝刘庄，虽然知名度不及他的父亲光武帝刘秀（东汉开国皇帝）的百分之一，但正是由于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兴利除弊，才使光武帝开创的中兴局面的成果得以保全，才使东汉立国后的光武、明、章三代皇帝的统治期成为东汉的黄金岁月。汉明帝在位的18年，是连接后代史家称颂的“建武永平之政”与“明章之治”的核

心时代。如果一定要找个时期类比的话，就相当于康雍乾盛世中的雍正时期。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汉明帝的大力改革，光武帝的开国奠基之业、休养生息之功，恐怕延续不了多久就灰飞烟灭了；如果没有汉明帝的大力改革，留下比较坚实的底子，先天不足的东汉王朝，恐怕撑不了多长时间。

看来，汉明帝是位名声不著却实际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兴之主和改革家，是位明君。

既然是位明君，汉明帝为何会上演提着大棒追打药崧的闹剧？

要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他的父亲光武帝时期的“官好当”说起。

光武帝时期“日子好混官好当”

史书记载，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以柔治国”，宽柔好仁。

虽然国家统一、政权稳定后，光武帝刘秀也着力加强自己的权力：一方面，请世家豪族的人做三公九卿，用高官厚禄安抚他们，给予高规格政治待遇，尊重他们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将皇帝身边的小官尚书的权力充实起来，把外廷架空，使尚书台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总理国政，这样一来，大权就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但这只是为了加强皇权、维持王朝稳定所进行的最低限度的战术调整。

总的来说，光武帝刘秀在“柔道治国”的理念下，虽然也力求公允，但在对待宗室、外戚、功臣等方面，往往是不求细察，很多时候是“装糊涂，和稀泥”，凡事都“讲情面”，处罚只是特殊现象，史

称“建武中，禁网尚阔”㊟。当时的官吏（广义上的，包括各种吃国家俸禄的人），都觉得官好当。

对宗室庇护有加

公元35年（建武十一年）6月，中郎将来歙在武都郡河池县军中被刺身亡。6月27日，来歙的灵柩抵京，光武帝刘秀亲自率领百官到城外迎接灵柩。进城之后，刘良（刘秀的叔父）的车马与右中郎将张邯的车马相逢，因道路狭窄，交通阻塞。刘良十分生气，不仅大声呵斥张邯让道，还将管理城门的门候（专职守城的门官）岑尊叫去狠狠斥责了一顿。此事引起朝野大哗，担任司隶校尉的鲍永上奏弹劾刘良：刘良是诸侯藩臣，蒙皇上恩宠入侍朝中，但他明知门候是皇上任命的六百石级别的朝廷命官，还肆意责骂，并迫使门候在京都大道上叩头认罪，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但光武帝刘秀对刘良并没有任何惩罚。㊟

刘良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子春，李家是怀县的豪强大户，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了人也没人敢管。后来，刚正不阿的赵熹出任怀县县令，追查此事，两个凶犯被迫自杀，李子春也被拘捕入狱。刘良找刘秀说情：“皇上，臣和李子春交情深厚，听说他犯下了罪，赵熹要杀他，我想请皇上放他一条生路。”刘秀当时正着手解决豪强肆虐问题，听了这个请求很为难，就对刘良说：“官吏依法办事，律法之事不能违法曲断，换个别的事情吧。”刘良不久病故，刘秀又念及叔父的养育之恩，下诏特赦了李子春。㊟

对外戚培植利用

建武十七年，刘秀将郭皇后废为中山王太后，立阴皇后。两年后，前郭太后所生太子刘强被废为东海王，阴皇后所生原东海王刘阳改名刘庄，立为皇太子。

通常而言，废黜皇后、太子意味着腥风血雨，因为废皇后、废太子所在的集团势必被视为新皇后、新太子的绊脚石而成为清洗对象，家族势力要被整肃。但刘秀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在废郭皇后和太子刘强的同时，刘秀对郭氏集团优容有加。废太子刘强被封在最大的诸侯国东海国，封地还几次增加；郭后家族的郭况徙封大国，为阳安侯；郭后从兄郭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相；郭竟弟郭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

当然，刘秀不会忘记加力培植新皇后、新太子的势力。这一重任，他直接交给了南阳豪族集团，特别是皇后出身的阴氏家族。刘秀以阴识为太子太傅，此后，“帝每巡郡国，识常留守京师，委以禁”，阴识实际成为太子的保护者。

对功臣富贵休养

从西汉后期开始，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事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

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于是李挺就向光武帝请病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不仅马上准假，还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注

大臣们通过此事知晓了光武帝的心思，都“占着茅坑不拉屎”，居高位、拿高薪、享特权，但不问政事、不管闲事、不操心事，没负担、没压力、没风险。大臣们一个个过得那叫一个舒坦，而光武帝心里自然比他们更加舒坦。

……

光武帝后期，“柔道治国”的弊端纷纷暴露出来，律法对权贵官吏来说已无威慑力可言，政府缺乏效率，官员缺乏节操，百姓缺乏庇佑，社会矛盾又逐渐尖锐起来。

汉明帝提着大棒追打药崧，是汉明帝继位后改革整顿的一个生动注脚，是要把不正常的“官好当”局面扭转到“官不聊生”的轨道。

“官不聊生”，并不是说要把当官的弄得惨不忍睹、哀鸿遍野，而是说为官者要造福一方可不容易，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一方面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殚精竭虑地为百姓办事，劳累是在所难免的；另外，还要面对各方面的监督和非难，身心煎熬也难以避免。

汉明帝难得清醒地认识到：凡是“官不聊生”的地方和时代，百姓就安居乐业；凡是当官的骄奢淫逸的地方和时代，群众就生计艰难，甚至民不聊生。

汉明帝改革，想要的就是——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

官不聊生，百姓就安居乐业；官吏骄奢淫逸，就会民不聊生。这个道理，光武帝刘秀难道不懂？

光武帝刘秀，作为曾经的太学高才生，不可能认识不到。

既然认识到，光武帝为何还要让自己治下“官好混”呢？

恐怕光武帝也别无选择，因为东汉王朝从立朝开始就先天不足、根基不稳。

根基不稳的东汉王朝

说东汉王朝先天不足、根基不稳，一点都不夸张。

古代中国，理想的国家结构是这样的：一个个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小家庭，构成最基础的统治单元。国家通过向下派出的各级官员直接控制每个小家庭，向其征收赋税、征发劳役，政府则为自耕农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自耕农家庭自身无法生产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盐、铁器等。在这种结构下，政府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证，王朝上下将不存在能挑战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整个社会就会安定发展。

虽然历朝历代离这种理想的状态都有较大距离，总是存在自耕农之外的较为强大的力量集团，比如贵族、地主、富商、豪强等等，但东汉显然是离理想状态最为遥远的王朝之一，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理想状态的“负片”和“反转片”。

话说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开创东汉王朝，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相帮的结果，最重要的“桩”就是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豪族出身的刘秀集团，面对天下大乱、遍地豪族武装的局面，统一天下的过程，也主要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这和汉高祖刘邦与平民百姓一起创建西汉，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在统一全国的征战过程中，刘秀的对策很现实也很管用。一方面，他用武力征讨不归服的地方豪族势力，另一方面，用高官厚禄招降纳叛，只要对手能投降，不惜给予极大的宽容度，从而加速了全国的统一，并形成了虽然力量强大但组织却较为松散的大型军事集团。

因此，东汉从一开始，全国就遍布着大大小小的豪族，政治上就是皇权和世家豪族两种势力并存，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的联合政权。西汉（不包括西汉末年）的主流是皇帝掌握压倒性的强大权力，但东汉皇权相对较弱，实际是与豪强大族联合执政。

史书记载，东汉初期，除了皇族，还有非常显赫的六大家族，也就是帮助刘秀复兴东汉王朝的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

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

邓禹家族。邓禹为刘秀中兴汉室立下大功，满门显贵，异常显赫。宋代姓氏学家邓名世、邓椿哀父子撰写的《古今姓氏书辩证》说："自邓氏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

耿弇家族。耿弇，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耿弇的弟弟耿国当了驸马都尉，耿广、耿举都做了中郎将。从东汉开国到建安末，耿氏家族共出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娶公主者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

梁统家族。建武五年（公元29年）四月，梁氏先祖梁统附汉。从梁统至汉和帝时大将军梁冀，先后有七代十五人封侯。仅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食邑称君者七人，娶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窦融家族。窦融，东汉开国功臣，历任冀州牧、大司空、代行卫尉事，兼领将作大匠。窦氏一门贵宠，前后一公、两侯、娶公主者三人、二千石四人，府邸相望京邑，奴婢数以千计。

马援家族。马援，东汉开国功臣、著名的军事家，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女儿后来成为汉明帝皇后，封侯者数人。

阴氏家族。阴兴、阴识都是开国功臣，阴丽华是光武帝刘秀的皇后，后来又出过皇后，封侯者数人。

除了这六大超级豪族，全国还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东汉和西汉是完全不同的，刘秀依靠豪强当上皇帝，也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世家豪族往往世代高官，不仅

门生故吏盘根错节，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且还拥有私家武装，很大程度上裹挟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

如果拿现代股份制公司打个比方的话，光武帝刘秀是公司董事长，也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这个最大股东的股份远远没达到51%，做不到绝对控股，而只是对每一个股东有相对的优势。东汉，是一个弱势董事长和股东遍地、股权复杂的股份公司，所以光武帝这个董事长，只能笼络联合六大超级豪族的股份，才能实现控股。

这也就不难理解，光武帝为何要“柔道治国”，爱“讲情面”、喜欢“装糊涂、和稀泥”了。光武帝的宽柔求仁，在当时历经战乱满目疮痍的情况下，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了。

从实际效果看，光武帝的柔道治国、与民休养，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经历了长期战乱民生凋敝的东汉初期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实现了社会的安定。

但是，到了光武帝后期，当经济基本恢复、社会稳定多年后，柔道治国的弊端就更多地暴露出来了。如果要问为什么没出什么大乱子的话，原因不复杂，光武帝投桃报李，权贵们也对光武帝“讲情面”，毕竟光武帝是马上打江山的开国之君，大家还是信服的，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至于太嚣张。

但光武帝一死，情势就变了。由俭入奢易，由谦入骄更容易，一班“官二代”、“富二代”的皇亲国戚、世家豪族骄奢淫逸惯了，在他们眼中，刚刚登基的年轻的汉明帝，只不过是个恰巧当了皇帝的普通“皇二代”，当然没有其父皇光武帝那么大的“面子”。如此一来，柔道治国的路就走不通了。

“小时了了，长大仍佳”的汉明帝

情势改变，说来就来。

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驾崩。

在混乱的葬礼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从各自封国赶来京师洛阳参加葬礼的诸侯王（也就是刘秀的儿子）们，居然不分尊卑上下地和即将即位的皇太子刘庄（也就是日后的汉明帝）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举止轻浮无礼，正欲借此机会大闹朝堂，完全没有皇家的礼仪和规矩。

这是光武帝刘秀柔道治国结出的果实之一。

这些无法无天、大闹朝堂的藩王们，实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可是“小时了了，长大仍佳”的汉明帝刘庄，这个“皇二代”可不简单。史书上记载过这样几个故事。

光武帝统一全国后，发现垦田亩数和人口对不上，于是开始重新清查田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度田事件。清查完毕，各地的官员逐一向光武帝汇报工作，刘阳（后来被封为皇太子时改名为刘庄）站在刘秀身后，学习观摩。刘秀一边听汇报，一边翻阅文书账本，突然在陈留县的吏牍中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觉得很奇怪，摸不着头脑，就询问汇报官吏。汇报官吏支支吾吾，只说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不肯吐露实情。这时，刘阳得到父皇的允许，解释说：“河南是国都所在，中央的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此。这两个地方的田亩和宅第逾制的很多，但地方官又惹不起这些人，所以不敢认真核查。”刘秀恍然大悟，惊叹12岁的孩子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注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单臣、傅镇等人造反，攻占了原武城，劫持了该城的官吏。臧宫奉光武帝之命率兵围剿，将单臣、傅镇等围困在城中，可是由于叛乱分子粮草充足，所以原武城久攻不破。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多数人都主张强攻，只有太子刘庄提出反对意见。刘庄认为不仅不需要强攻，反而可以故意卖一些破绽给叛乱分子，给他们制造突围的机会。刘庄十分自信地预言：“当他们突围的时候，只要一个小小的亭长，就可以制服他们。”结果真如刘庄所料，叛贼分散突围后，很快都被消灭了。[注]此时的刘庄，已经不仅仅是抖机灵耍小聪明了，而是开始显示其治国安邦的大智慧。

如果说“原武围城”一事，体现的还只是汉明帝刘庄的战术智慧的话，那么“议讨匈奴”，反映的则是汉明帝刘庄的战略智慧。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因为战乱刚刚平息，国力尚未恢复，对匈奴政策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防御。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大部分。南匈奴主动要求和解内附，于是光武帝册封了南匈奴，还与南匈奴通婚和亲。北匈奴看到南匈奴和东汉和亲，也要求与东汉和亲。光武帝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公卿大臣们商议，但大家众说纷纭，意见统一不了。左右摇摆之际，已是太子的刘庄提出不与北匈奴和亲，原因如下：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同水火，现在北匈奴害怕我们，是因为南匈奴与汉朝和亲联手；如果我们又和北匈奴和亲的话，那么南匈奴就会对汉朝有二心，而且北匈奴也不会再怕我们。光武帝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就否决了与北匈奴的和亲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

怎么样？确实是“小时了了，长大仍佳”吧。

所以，面对这些失礼失仪、无法无天、大闹朝堂的诸侯王们，汉明帝刘庄并没有惊慌失措，其实他早有准备。你瞧，正当这些藩王们闹得正欢畅得意的时候，只见顾命重臣太尉（最高军事长官）赵憙手

执宝剑而来，对着这些藩王们一阵厉声呵斥。藩王们哪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吓得面面相觑，立马变成了纸老虎，灰溜溜地被赶了下来。

这件事，只是汉明帝力纠以往宽柔政风的一个开端。

接下来，汉明帝将力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的改革。

官不聊生之只给宗室“半碗饭”

光武帝葬礼上的混乱和荒唐，让汉明帝一当上皇帝就下定了打击宗室的决心。

但汉明帝对付这些宗室的主要策略，既不使用暴力“用棒责打”，也不使蛮力“用手阻止”，而是使巧力“用眼监督”。“你在做，我在看”，一切尽在掌握中，你干什么我都知道，可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山阳王刘荆，与汉明帝是一母所生，如假包换的亲兄弟，但他胳膊肘往外拐，包藏祸心。汉明帝登基后不久，他假冒废太子刘强的舅舅大鸿胪郭况给废太子刘强写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废太子刘强和废皇后郭后的旧事拿出来大书特书，为两人喊冤叫屈，挑唆鼓动刘强起兵造反，夺回皇位。这封书信，把没有非分之想的刘强吓坏了，立马连信带送信人都押送到京城，交给汉明帝查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竟然是刘荆所为。但汉明帝并没有立即捉拿刘荆问罪，而是暗地里加强了对刘荆的监控，从此刘荆的一举一动，尽在汉明帝的掌握中。

刘荆不知情，仍小动作不断。他看一事不成，又在羌人造反时，打算趁火打劫起来造反，可他还没来得及行动，汉明帝就知道了他的意图，把他改封为广陵王，而且立即离开京城前往封地。

刘荆离开繁华的都城，封地的冷清日子让他觉得郁闷。一天，他招来术士询问："我长得像先帝，先帝30岁当皇帝，我今年也30岁了，可以起兵造反吗？"术士一听，吓个半死，立刻打了小报告。刘荆知道事情败露后，就把自己投进监狱，算是自首。汉明帝就坡下驴，趁机裁撤了刘荆的卫队、随从，但没有追究其谋逆大罪。

可惜刘荆死不悔改，不久又请巫师诅咒汉明帝，结果汉明帝很快就知道了。刘荆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在皇帝掌握中，自己的野心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就在绝望中自杀了。注

刘荆是汉明帝的同母亲兄弟，尚且被盯得如此紧，其他藩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汉明帝"你在做，我在看"的严察之下，10个兄弟中，除长兄废太子刘强、东平宪王刘苍、临淮王刘衡之外，其他7个都因为各种罪名被加以不同程度的处罚，多数藩王的封地被削减过半。至此，与汉明帝同辈的藩王们就都服服帖帖的了。

对自己的儿子们，汉明帝则采取了"半封"的政策。

历代皇帝在分封时，往往是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与皇帝越亲，分封的土地越大、位置越好。而且，分封土地的大小，是有一定定制的。但汉明帝却没有这么做，他对自己最亲的儿子们的分封，是在光武帝分封标准的基础上缩小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光武帝分封自己的儿子，每个人是四个县，那么汉明帝分封自己的儿子，每个人就只有两个县。这就相当于，以往皇帝都给每个儿子"一碗饭"，如今汉明帝只给儿子"半碗饭"。

为何"半封其子"？

汉明帝是这么解释的。光武帝的功德可以与高祖皇帝（刘邦）相比拟，这是东汉的任何皇帝所不能比拟的，不让自己的皇子与光武帝的皇子等同，标准降低一半，这是对光武帝的尊崇。而光武帝的诸子对于自己来说是兄弟，自己裁抑诸子而不裁剪自己的兄弟，是为亲亲之举，这是对自己诸位兄弟的无形恩宠，显示了汉明帝对于诸位兄弟的恩情。

而实际上，汉明帝这么做是为了抑制藩国，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是要宽慰与自己同辈的藩王之心。汉明帝对七个藩王进行处置之后，特别是广陵王案与楚王案牵连了很多人，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较大恐慌，这种恐慌是不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稳定的。通过减半封子，凸显了自己对诸位兄弟的优宠，势必会让诸位藩王打消疑虑，从而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而且，既然连皇帝自己儿子的封地都减半了，等诸位兄弟死后，继承爵位的下一代藩王的封地理所当然也必须减半，实际上也只有“半碗饭”了。

自此之后，藩国已无力与中央政府相对峙，东汉王朝再没有发生诸王谋反的事件，可以说这种防范是恰当的，有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统治，有利于维持东汉王朝的稳定发展。

官不聊生之“朝中有人也不灵”

外戚、豪强，往往合二为一，威胁朝廷。打击外戚豪强，不少皇帝是专捏软柿子，杀鸡吓猴。汉明帝不同，专找硬的捏，杀猴吓鸡。

外戚里最“硬”的是谁？当然是皇太后的母家阴家了。汉明帝对阴家人犯事也按律法处置。

汉明帝有个妹妹郦邑公主，嫁给了她的表兄阴丰。阴丰是阴丽华太后亲弟弟新阳侯阴就的儿子，也就是汉明帝的亲表弟。史书记载，

郦邑公主傲气十足，醋劲也十足，阴丰则不但好色而且性情火暴。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的一天，阴丰和郦邑公主两口子又发生了争执，一通大吵大闹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一幕：阴丰狂怒之下，操起刀就捅在了郦邑公主的身上，正中要害，刚才还乱蹦乱跳的郦邑公主立刻倒地不起，一命归西。汉明帝刘庄当着母亲阴丽华太后的面，毫不留情地按律法下达命令，将阴丰处斩，国舅姥爷阴就夫妻教子无方，要负连带责任，鉴于是太后的亲弟弟，可以保得全尸，回家自尽，新阳侯的爵位就此到头，不得再传。(注)太后的亲弟弟也不能逍遥法外，汉明帝通过此事向全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朝里有人也不灵。

除了皇太后，外戚里最“硬”的就是皇后家族了。汉明帝虽然与马皇后非常相爱和睦，但公私分明，不仅没有对马家格外恩宠，反而要求更加严格。马皇后也很贤明，再三要求母家谦恭谨慎，争做表率。

汉明帝当皇帝后，根据光武帝的遗嘱，画二十八将于云台，以表彰这些人的功劳。马皇后的父亲，也就是汉明帝的岳父马援，战功赫赫，按客观标准，铁定入选“云台二十八将”。但汉明帝故意不将马援列入，原因就是他作为皇后的父亲要避嫌。(注)这就给大臣们一个明确信号，自己要严格限制和约束外戚。汉明帝在位时，他的大舅子小舅子们都位不过九卿，并无特殊恩遇。

除了对皇太后、皇后的母家严加限制，对嫔妃、长公主们的家人也不含糊。

大臣阎章，工作努力，业绩优秀，精通国家典章制度，按常理早就应当提升要职了。但阎章有两个孙女被选入后宫，被封为贵人，这样一来，阎章便成了皇亲国戚。刘庄对外戚严加限制，结果阎章硬是得不到提拔。

汉明帝的妹妹馆陶公主向汉明帝说情，求他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刘庄的外甥放一个郎官当当，汉明帝没有同意。理由是：郎官虽小，但也是天上的星宿（郎位星），到了外面， 起码也是个一县之长，要管数百里地的百姓，外甥如果不是那么一块料，人民就要遭殃。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不能办。㊟

六大家族中的窦家，主人窦融为人不错但不善于约束自己的家人和子弟，结果子孙多不法。窦融从兄的儿子窦林坐，欺罔臧罪，汉明帝并没有法外施恩，按律法下狱处死。窦融的长子窦穆，是光武帝的驸马，窦穆的封地离六安国比较近，就想占据六安，于是假传阴太后的旨意，让六安侯刘盱休妻后娶自己的女儿。后来此事被汉明帝知道，窦穆被免官，窦氏人中，除了窦融留京，全被迁回故郡。后来，窦融也被汉明帝斥责，吓得窦融也辞职回家养病。窦穆后来被赦免，允许回京城居住，但窦穆心怀不满并不悔改，口出怨言又贿赂官吏，他和两个儿子窦宣、窦勋干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后来都被汉明帝按律法处置了。

再说六大家族中的梁统家族，梁统的儿子梁松是光武帝的女婿、汉明帝的姐夫，十分骄纵，诬陷过马皇后的父亲马援，非议过汉明帝的国策，贪赃枉法的事情干了不少，汉明帝也没有包庇他，按律法处置了他。

东汉12位皇帝，只有汉明帝对外戚和豪族的限制打击最严苛。当时，外戚也好，豪族也罢，纷纷明白了一个道理：朝里有人也不灵！

官不聊生之“如履薄冰官难当”

上文提到过，汉明帝12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明察秋毫了，成年后，更加成熟精明，提着大棒追打尚书郎药崧并不是孤例。

有一天，汉明帝接受西域使者的朝拜后，赏赐了他们十匹丝绸，当时负责登记的尚书郎不小心记错为百匹，并将记录转交给大司农入账。事后，汉明帝查看记簿时，发现了差错，立即把负责记录的尚书郎召来，命令侍卫将尚书郎按在地上，亲自抄起棒子，狠狠打去。尚书台的长官钟离意听说后，急忙赶过来，磕头求情：“这是个小差错，不必用重刑伺候。如果一定要问罪责罚，那么我的职位高，罪责应较重，陛下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更能惩戒百官。”说完，脱去衣服准备接受杖打。虽然汉明帝不能接受“小差错”的看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十写成百，增加了9倍，怎么能算“小差错”呢？但是考虑到钟离意认错态度好，责任意识强，有担当精神，怒气就平息了。

汉明帝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的每一个官员，一旦发现什么过失，无论是谁、什么职务、什么级别、什么背景，都会对事不对人，赏罚分明。对于政务，汉明帝总是尽可能亲力亲为，分清轻重缓急，做到主次分明，认真监督核查，避免漏洞，一旦发现问题，必定追究责任。

官员们知道，想对汉明帝瞒天过海是不可能的，蒙混过关也是想都别想，于是吏治渐渐严整起来，有效保证了纲纪整肃、吏治谨严、行政效率提高、地方政绩改善。

但汉明帝并不是一味严苛，也有宽柔的一面，以免滥杀无辜。

有这么一宗案件，兄弟两人合伙杀人，情况比较复杂，地方官难以判决。此案上报到了汉明帝那里，汉明帝认为，兄长应该判死罪，因为是他主导的，而且已经成年，弟弟年幼无知，应该免去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圣旨时，误说成两人都判为死罪，兄弟俩都被处死。后来，尚书台的官员发现了这一错误，上奏汉明帝，指控孙章矫诏，罪大恶极，按律应该处以腰斩。汉明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询问廷尉郭躬的意见，郭躬认为应该对孙章处以罚金。汉明帝不解，问：“孙章矫诏杀人，仅处罚金过于宽大了吧？”郭躬回答说：“例律规定，

定罪量刑有故意和过失之分，孙章传达圣旨的错误属于过失，并不是故意，应当从轻量刑。”汉明帝又说：“听说孙章和这两兄弟是同乡，说不定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而故意这么做。”郭躬回答说：“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孙章和他们有过节，刑罚之事绝不能凭想象和推测定罪。”汉明帝为避免滥杀无辜，最后听从了郭躬的意见。注

当时的情势，虽然东汉皇室不得不承认并许可地方豪族的存在，但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贯穿始终。换句话说，汉明帝认为，只有不断打击这些地方豪族，让他们不敢扩大兼并、干涉地方政务，才是正确的治国方式。而打击豪强的方法，在汉明帝手中，就是加强吏治——让以前没担当、不作为的官员变得有担当、能作为起来。

在汉明帝推动下，各地官吏挺直腰杆打击豪强，迫使豪族收敛，从而使治安明显改善，治安案件只有之前的两成。注这个数字也许有所夸大，但总体上形成了治安好转、豪强守法的局面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注

让民安生之“绝不折腾老百姓”

“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豪族官吏很严切，另一方面是对百姓很宽柔，与民休养，“绝不折腾老百姓”。

减免税赋。光武帝时期，税率是“十五税一”，已经够低的了，历史上的孔子、孟子认为“什税一”就是仁政了。汉明帝当皇帝后，继续减税，税率减到了“三十税一”。不仅减税，有些年份直接免税，汉明帝多次下诏，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光武帝也免过税，但仅针对特定人群，汉明帝则实行了针对全国的免税政策。

减轻徭役。徭役是平民百姓的一项重要义务，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国家义务劳动一个月，没有任何报酬。汉明帝尽力减轻徭役，尽可能少地征发徭役。

假民公田。东汉由于世家豪强广布，无地失地的农民大量存在，如不安抚就会出现大量流民，带来严重社会危机。对此，汉明帝采取“假民公田”的政策，以解决破产农民的生计问题。国家控制的大量荒地、苑囿、山林川泽都没有得到开发，而大量农民无地可种，于是汉明帝就把这些地方租借给无地的贫民开发耕种，这就是“假民公田”。头几年，国家不向贫民收税，还借贷给他们种子、粮食和生产工具，几年后再正常收取租税。永平九年（公元66年）汉明帝下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下诏：“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这样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把部分荒芜的土地开发了，增加了国家和皇室的收入；另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破产农民的生计问题，使一些流民得到了安置，化解了流民涌动带来的严重社会危机。而加强自耕农的举措，也是为了平衡地方豪族的势力，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也就是国家编户。[注]

治理黄河。西汉末年，黄河、汴渠崩坏，水患持续60余年，大量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王景和王吴奉汉明帝之命，共同主持对汴渠和黄河的综合治理。王景和王吴带领数十万河工，采取了“堵”“疏”结合的办法。“堵”的方面，就是巩固河堤，修固了从濮阳城南到渤海千乘的千余里黄河大堤；“疏”

的方面，就是疏浚河道，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这次治理，不但使黄河决溢灾害得到平息，而且充分利用了黄河、汴渠的水利资源。从此以后，黄河800年不曾改道，[注]决溢灾害明显减少，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对促进农业生产居功至伟。

关爱百姓。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五月丙辰，汉明帝刘庄特意下诏，鳏、寡、孤、独、笃癃（残疾人）、贫者等缺衣少食的人，每个人每年可以分到五斛（一斛为十斗）粟作口粮。

在汉明帝与民休养、让民安生的政策下，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快速恢复，社会更加稳定，人口迅猛增长，东汉步入繁荣昌盛的时代。据史书记载，光武帝末年，全国有户籍可统计的人口仅为2 100多万，汉明帝时期，人口激增至3 400多万，且用时不到20年。

让民安生之“借兵打仗安定边疆”

当年东起洛阳、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高附加值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商业、文化、政治、技术的通道，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功莫大焉。

由于王莽欲借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转移国内矛盾，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导致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恶化了，张骞通西域后开通的丝绸之路因此被迫中断了。

经过光武帝和汉明帝多年的努力，东汉与大多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恢复丝绸之路的机会逐渐来到，但还有几个阻碍因素，一是匈奴还没完全被征服，二是部分西域国家还未归附。当时的匈奴已经分化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归附东汉，并与东汉和亲，但北匈奴仍然不时寇掠东汉子民。

为了安定边疆，汉明帝只得改变光武帝时期息兵养民的策略，重新对匈奴开战。但汉明帝并不想因为对匈奴的战争而影响民众的安居乐业，闹得民不安生，于是他决定“借兵征服匈奴”，也就是广泛发动西域已经归附东汉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兵力去攻打匈奴，而东汉只出动部分精锐兵力，主要是统率各国军队。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二月，汉明帝发动组织的联军兵分四路向北匈奴进发。

第一路：派太仆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的羌人、胡人部队和南匈奴单于的部队，共11 000骑兵，出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塞，攻打北匈奴。

第二路：派窦固、耿忠率领酒泉、敦煌、张掖三郡郡兵和卢水的羌人、胡人部队，共12 000骑兵，出酒泉（今甘肃酒泉）塞，攻打北匈奴。

第三路：派耿秉、秦彭率领由武威、陇西、天水等三郡招募的士兵和羌人、胡人部队，共1万骑兵，出张掖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塞，攻打北匈奴。

第四路：派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七郡郡兵和乌桓、鲜卑部队，共 11 000骑兵，出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塞，攻打北匈奴。

东汉率领的联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并设置宜禾都尉。[注]

击败了北匈奴后，汉明帝又派耿秉、窦固率联军进攻车师国，降服了车师。接着，汉明帝又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文武双全，降服了那些不肯归服的国家，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

公元74年，汉明帝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自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重新恢复到汉朝的管辖下。

丝绸之路得到了完全恢复，东起洛阳，西至罗马，再次成为流金淌银的财富之路，同时也是文明之路，交融着东西方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汉明帝击败匈奴、征服西域、恢复丝绸之路，与汉武帝攻打匈奴凿通西域和汉宣帝征服匈奴西域都不同，没有大量征发兵力，而是借用多国的兵力组成多国部队进行征服的，把对国内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劳民伤财。

在汉明帝“绝不折腾老百姓”的持续经营下，吏治清明，境内安定，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出现了繁荣的盛世局面，揭开了“明章之治”华丽大幕。

不足的是，汉明帝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汉先天不足的社会结构——土地主要集中在豪强地主手中，自耕农比例过低，门阀世族在官员队伍中比重过大，等等。

小 结

官不聊生时，百姓幸福日

汉明帝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说他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赋税低、徭役轻，隔三岔五还免税，缺田少地有人借，兴修水利有人管，鳏寡孤独有人济，就算对外征战，也没有大量抓丁拉夫，而是借力打力组成多国部队征伐匈奴西域，时时处处尽可能不折腾老百姓，与民休养，让民安生。

说他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对于当官者而言，“居高位、拿高薪、享特权，但不问政事、不管闲事、不操心事，没负担、没压力、没风险”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分封宗室只给“半碗饭”，外戚豪强犯事“朝中有人也不灵”，皇亲国戚也罢，世家豪族也好，都要“夹起尾巴做人”。

自古以来，民不聊生大多来自官僚腐败，社会动荡。很多情况下，官僚腐败是社会动荡的根本，民不聊生是吏治腐败的结果。官僚们生活奢靡，过得太舒服了，必然会带来老百姓的生活不舒服。“鱼肉百姓”这四个字，就是为腐败官僚量身定做的一顶帽子。

社会如果不对这些害群之马开刀问斩，那么，这个社会势必会积重难返，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相反，官不聊生必然会带来官场的清风明月。社会清正严明，人民才会安居乐业，才不至于导致民不聊生的恶果。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官不聊生的地方和时代，百姓就安居乐业；凡是当官的骄奢淫逸的地方和时代，群众就生计艰难。

汉明帝时代属于前一种情况，这是当时百姓之大幸，是东汉王朝之大幸，也是历史之大幸。

汉明帝，这位名声不著却实际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兴之主，“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用改革交给历史一个昌明治世。

这是，明帝的小时代。

却是，历史的大时代。

1. 综合[1]《后汉书·钟离意传》：“（汉明帝）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2]兰台：《重读中兴之主：汉明帝刘庄》，凤凰网历史频道专题。

2. 《后汉书·樊鲦传》：建武中，禁网尚阔。

3. 《东观汉记·鲍永传》：“时赵王良从上送中郎将来歙丧还，入夏城门中，与五官将军相逢，道迫，良怒，召门候岑尊，叩头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车驾临故中郎将来歙丧还，车驾过，须臾赵王良从后到，与右中郎将张邯相逢城门中，道迫狭，叱邯旋车，又召门候岑尊诘责，使前走数十步。按良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门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也。’”

4. 《后汉书·赵憙传》：“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贳世子春。”

5. 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3年版，第94页。

6. 《后汉书·刘隆传》：“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

7. 《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众分散，遂斩臣、镇等。”

8. 《后汉书·广陵思王刘荆列传》：“广陵思王刘荆，光武帝子，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地。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显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时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其后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犹不改。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立二十九年死。帝怜伤之，赐谥曰思王。”

9.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公主娇妒，丰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杀主，被诛，父母当坐，皆自杀，国除。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

10.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

11. 孙贵颂：《汉明帝的用人之道》，载《报刊荟萃》2007年第2期第38页。

12.　　综合[1]《法制小故事·误杀从轻》，载《山东审判：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年第5期。[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六·郭躬传》：“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13.　　《太平御览·卷九十一》：“（汉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乐业，户口衣食滋植，断狱得情，号居前世之十二。”

14.　　兰台：《重读中兴之主：汉明帝刘庄》，凤凰网历史频道。

15.　　综合[1]郑长兴：《汉明帝与“永平之政”》，载《周口师专学报》996年第4期；[2]林兴龙：《论汉代的贫困救济——以假田和赐田为例》，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5期。

16.　　综合[1]尧水根：《先秦至秦汉水旱灾害略论》，载《农业考古》203年第4期；[2]杨惠淑：《略论河南治水是中国治水的一个缩影》，载《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4年第7期。

17.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春，二月，遣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馀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耿秉、秦彭击匈林王，绝幕六百馀里，至三木楼山而还。来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得，出高阙塞九百馀里，得小山，信妄言以为涿邪山，不见虏而还。”

第六章

隋炀帝改革：急于求成中功败垂成



无论跑多快，总有跑不过的东西。隋炀帝是那个时代的“闪电侠”，他不愿意停下来等一等他的国家和人民，于是就跑输了命运。他不懂“慢慢来，比较快”。

隋炀帝，何许人也？

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会说：昏君、暴君，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搞垮了繁荣昌盛的大隋王朝，留下了无数荒淫无耻的传说和故事。

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从隋末就开始了，一直被骂到了今天，被骂了一千多年。在市井传说中，他荒淫无道，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千百年来，隋炀帝已经固化为人们心中昏君、暴君的典型代表。

然而，隋炀帝真的那么一无是处、龌龊不堪吗？

其实不是。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推行了诸多改革，最后湮灭在隋末战争的血与火之中的，不是破烂衰败的烂摊子，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做过的事情，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隋炀帝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情，绝大多数唐太宗也做了，除了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以至于有学者追问：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注]

历史不容假设，但偏见必须纠正；批评隋炀帝可以，但污蔑就不大好了。

被关陇集团把持的隋朝朝政

话说隋炀帝刚当上皇帝，坐在龙椅上，高兴得忘乎所以，得意得一塌糊涂，可朝龙椅下的满朝文武大臣望了一眼后，眉头就不禁皱了起来。

为啥？

让隋炀帝闹心的是大臣的构成，特别是宰相班子的构成。

隋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就是宰相，隋炀帝初期的宰相班子构成是这样的：

第一个，尚书令杨素，拥戴隋炀帝登基的大功臣，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二个，尚书右仆射苏威，隋文帝时代的老臣，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三个，内史令杨约，尚书令杨素的弟弟，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四个，内史令萧琮，萧皇后的哥哥，原江陵萧梁（又称西梁）政权的皇帝。

第五个，门下纳言杨文思，杨素的叔叔，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六个，门下纳言杨达，隋文帝时代的勋臣，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

这6个人构成了隋炀帝初年的宰相班子。[注]

6人中，5人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可见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对隋朝朝政的把持是多么严重，可谓“关陇集团一咳嗽，皇帝老子就

生病”。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是不是因为隋炀帝登基不久，根基不稳，所以才出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对朝政把持得特别严重的情况？

那就让我们先看一个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轶事。

隋文帝有次在仁寿宫遇到了尉迟迥的孙女。当年北周宣帝死后，隋文帝杨坚矫诏辅政，引发了三总管起兵，其中势力最大的尉迟迥差点导致隋文帝杨坚的称帝大业功亏一篑。后来，尉迟迥兵败，他的孙女沦为宫女。如今，尉迟迥的孙女已经长大，落落大方，颇有美色。抚今追昔，隋文帝杨坚的内心充满了征服者的豪情，就临幸了尉迟迥的孙女。隋文帝的皇后独孤皇后知道后，气不打一处来，立刻下令杀死了尉迟迥的孙女。隋文帝盛怒之极，却又无可奈何，一气之下骑上马就出了皇宫，一路狂奔，不择路径，不知不觉就深入山谷20多里。

后来，在大臣高颎、杨素的苦苦劝解下，隋文帝才同意调转马头，返回皇宫。他长叹一声说：“我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注

隋文帝是开国皇帝，临幸尉迟迥的孙女，根本就不算个事。独孤皇后何以敢立刻斩杀尉迟迥的孙女？隋文帝悲愤盛怒，为何又对独孤皇后无可奈何？隋文帝为何长叹“我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原因不复杂，因为独孤皇后的娘家独孤家族是显赫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是隋朝立国的几大骨干支柱之一。

再说隋炀帝贵为皇帝，难道就心甘情愿地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把持朝政？当然不愿意，但无可奈何，因为隋炀帝清楚得很，要安稳做皇帝，就不能失去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支持。

说了这么多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么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究竟是何来历？

东汉中叶后，豪强世族把持朝政，此后愈演愈烈。魏晋时期，政治权力几乎被豪族世家所垄断，国家重要的官职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占据，出身高于一切，能力仅为陪衬。到了南北朝时期，王、谢、庾、桓这些曾经名噪数世风光无限的门阀世族们，随着东晋的败亡而湮灭。传统世族没落之时，一个新兴的贵族集团在西北横空出世，并如日中天，这就是纵横中国近两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简称关陇贵族集团或关陇集团）。(注)

关陇贵族集团起源于北魏时期。当时，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安全，在沿边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事重镇，合称六镇。起初，六镇的将士大部分是鲜卑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人豪强，但后来汉人逐步成为主体。这批军事贵族以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为中心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逐渐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军事贵族集团的雏形。

到了西魏时期，由于征战不断，于是政府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在当时战火纷飞的状态下，西魏政权是军政合一的，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军事上是军队的统帅，政治上是国家的核心领导阶层，经济上是当时关中地区最显赫的二十大家族，方方面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垄断了财富、权力和武装力量，是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最有特权阶层。西魏、北周、隋、唐这四个朝代的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皇帝的始祖都是柱国，而隋朝皇帝的始祖是大将军。(注)关陇集团实际统治了中国近两百年，直到武则天时期，才逐渐沉没瓦解。

可以说，西魏、北周、隋、唐这四个朝代，虽说是四个朝代更替，实际上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轮流做皇帝的权力游戏。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隋王朝，既是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的，也是整个关陇贵族集团的，皇帝不过是其中最得势的一个而已。

削减贵族对农户的“剪刀差”

新皇帝登基，大凡都要做出一点施行仁政的姿态，要么大赦天下，要么赏赐全国，要么减免赋税等。

但隋炀帝与众不同，不拘常例，他给天下臣民的见面礼，让有些人拍手称快，也让有些人咬牙切齿。

究竟是什么见面礼？

别着急，要了解是什么见面礼，以及这个见面礼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必须先清楚当时的赋役制度是什么样的。

隋朝的土地制度，是沿用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实行的均田制：

（1）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予种植谷物的田地80亩，女子则授予40亩。拥有奴婢、部曲（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贵族豪强的私兵、家兵）、耕牛的贵族地主等，可以获得额外田地：奴婢、部曲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丁牛（成年能耕田的牛，一般4岁以上）每头受田60亩，一户最多能有4头牛受田。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归还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亩，限3年内种植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为永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制买卖。在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每人授予麻田10亩，女子5亩。奴婢、部曲同样授予桑田或麻田。新定居的农户还可分到少量的宅田（相当于现在的宅基地），农户3口一亩，奴婢、部曲5口一亩，宅田也属永业田，可以世袭，可以买卖。

（3）桑田按现有丁口（成年男子的数量）计算。桑田为永业田，允许买卖一部分，原有桑田已超过应授田数的，不再授予，也不剥夺；达到应授额的，不再授予；超过应授额部分的，可以出售；不足应授额部分的，可以购买。

（4）若全家都是老、小、病、残的，11岁以上及残废者各受丁男一半之田，年过70的不用归还所受的田，寡妇遵守礼法妇道的，授予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免除赋役。

（5）人多田少的地方，居民可以向空荒地区迁徙受田；人少田多的地方，居民不许无故迁徙，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向官府申请借种受田以外的田地。因犯罪、流放、迁徙、死亡等原因造成的无主田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6）各级地方官吏按照官职高低授给不同数额的职分田，离职时移交接任官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新旧任官员上任和离任时进行交接，不许买卖。注

到了隋朝，隋文帝基本沿用了上述均田制，做了几处改动。其一，受田的年龄由15岁提高到18岁，受田的同时成丁；其二，服兵役的年龄由18岁改为21岁，但服劳役的年龄仍然是18岁；其三，对奴婢、部曲受田进行限制，庶人家庭最多能有60个奴婢、部曲受田，亲王最多能有300个奴婢、部曲受田；其四，丁牛不再受田；其五，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分开，都与品级挂钩，另外，内外官署还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隋文帝时，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看上去很美，似乎“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家家有安身立命之所，人人得以安居乐业。实际上，背后问题多多，而且日益严重。

问题一：田地多被贵族占有，授予农户田地往往成“打白条”。

由于奴婢、部曲跟普通农户一样受田，所以贵族地主凭借大量的奴婢、部曲优先受田，占有了大量的田地，而农户应该分到的田地却往往不能落实，“眼巴巴望着，却得不到”，好比煮熟的鸭子却飞了。历史记载，开皇二十年，隋文帝派官员到全国调查均田情况，发现不少地方，一个成丁农民才受田20亩，仅有规定数量（80亩）的四分之一。

问题二：女子出嫁，受田往往落空，家庭的赋役却大大增加。

隋初，一个成年男子成家后，课税就要变成单身时的两倍，因为多了媳妇的那一份。虽然名义上，媳妇嫁过来，媳妇可以得到一份相当于丈夫数额一半的受田，但实际上很难落实。毕竟，土地还受之事，不是那么容易随着嫁过去、娶过来就能办到的。结果，农民一旦娶妻，受田往往落空，课税立刻加倍，家庭的赋役负担大大增加。

问题三：奴婢、部曲受田，课税减半，“剪刀差”盘剥农民。

隋初，奴婢、部曲跟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但课税却有减半优惠，贵族地主凭借占有大量的奴婢和部曲，一方面占有了大量的田地，另一方面却只缴纳一半课税，甘蔗两头甜，便宜两边占。这种捧有余而损不足的“剪刀差”政策，加深了对农民的盘剥。更有甚者，还有一些高级贵族实际上根本就不缴纳课税。

针对上面的情况，隋炀帝准备的见面礼是：免除妇人、奴婢、部曲的课税，同时也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受田；另外，把男子受田的年龄定为18岁，但服劳役和服兵役的年龄提高到22岁。(注)

这个见面礼，自耕农们拍手称快。

这个见面礼，贵族地主咬牙切齿。

为何？

首先，妇人不再受田，只是把根本不能兑现的“白条”扔掉了，而妇人的课税却是实实在在地免除了，这就减轻了普通农户的赋税负担。

其次，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贵族不能再以奴婢和部曲受田的名义大肆圈占土地了，虽然奴婢、部曲的课税免了，但这些课税本来就有名无实，相当于只是把呆坏账归零而已。

再次，男子受田的年龄定为18岁，但服劳役和服兵役的年龄提高到22岁，这期间就有了4年的免课税徭役的时间，这恰恰是一个成家立业的新农户全力发展、固本强基的大好时机。当然了，这也是政府要“养鸡下蛋”。

隋炀帝的见面礼，相当于消除了贵族对农户的“剪刀差”，解决了隋文帝曾经想碰却没敢碰的难题，从经济上遏制了关陇贵族集团的继续坐大。

营建东都跳出关陇“包围圈”

免除妇人、奴婢、部曲的受田和课税，消除了贵族对农户的“剪刀差”，这大大侵犯了贵族地主特别是豪强世族的利益，作为贵族利益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当然就不高兴了，对隋炀帝的政策颇多微词，在施行中加以阻挠。

关陇贵族集团不高兴了，隋炀帝可就坐不住了，要知道当时的形势是“关陇集团一咳嗽，皇帝老子就生病”，之前“取而代之”的不乏先例，隋炀帝心里犯嘀咕，危机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该如何是好？

继续推行消除“剪刀差”的政策，有可能激怒关陇集团，自己被人取而代之。

停止推行消除“剪刀差”的政策，不仅威信扫地，而且问题将更加积重难返。

在进退两难、攸关隋朝命运之际，隋炀帝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营造东都洛阳，从而跳出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并继续推行消除“剪刀差”的政策。

营造东都洛阳，何以是万全之策？

首先，跳出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

隋朝建立后，定都长安（当时称大兴城，隋文帝时在汉代长安城的东南方向重新营建的一个城）。长安是关中腹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防御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对隋炀帝来说，长安城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甚至足以抵消和掩盖它所有的优点——长安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巢和大本营，四面八方都有关陇贵族集团的重兵把守。隋炀帝坐镇长安，进行打压关陇贵族集团的斗争，显然是身处十分不利的境地，相当于置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之中。如果关陇贵族集团图谋不轨，发生叛乱，那坐镇长安的隋炀帝就成了“瓮中之鳖”，逃无可逃。而洛阳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洛阳在长安以东600多里外，地处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之外，不在包围圈之中，在这个地方推行改革，底气就足得多。而且，洛阳以前不仅做过东都，还做过首都，有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底子、条件也都没啥可挑的。

其次，可以安抚和震慑东部地区。

话说隋炀帝当皇帝还没几天，自己的亲弟弟汉王杨谅就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叛乱了。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痛，隋炀帝深深意识到，隋朝的东部地区并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变故。汉王杨谅叛乱时，东部有19个州响应，但隋朝的都城长安远在西北，急切之间，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形势需要在东边建一座都城。另外，平定杨谅叛乱后，隋炀帝为了惩罚叛乱分子，把并州也就是杨谅老巢的十几万老百姓都迁到了河南地区。在隋炀帝眼中，这些人都是不安守本分的，脖子后面是有反骨的，怎么有效地控制他们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都，就近一边安抚一边震慑，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这就跟西周建立后，周公把殷商遗民集中在洛邑，在洛邑建立东都是一样的道理。

再次，可以安抚和震慑江南地区。

汉王杨谅叛乱时，江南地区也不稳定，人心思乱，而且教唆汉王杨谅叛乱的，主要就是南方人氏。怎么解决呢？如果说隋朝的都城长安离山东地区远的话，那离江南地区就更远了，更加鞭长莫及。营建洛阳为东都，一方面相比长安要靠近江南地区很多，另一方面洛阳到江南地区的交通也颇为便捷，这样对江南地区的安抚和震慑作用就大大增强了。注

还有，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实惠。

南北朝及以后，由于北方战乱的原因，人口纷纷往东往南迁徙，经济重心开始东转南移。到了隋朝，山东地区的富庶超过了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而江南地区的富庶更有赶超山东地区之势。

营建洛阳作为东都，可以获得诸多经济方面的实惠：一方面，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过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富庶程度已经超过关中地区，洛阳自身的物资供给能力比长安强；另一方面，洛阳往东北是富庶的山东地区，往东南是富庶的江

南地区，而且交通还颇为便捷（相对于长安到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要便捷很多），危难之际可以从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调运物资供应东都洛阳。

最后，关陇贵族集团也不会反对。

隋朝以前，经济重心在关中时，秦川大地足够养活一个大帝国的都城。而到了隋朝，由于特殊地质结构的原因，关中地区的各种环境开始恶化，特别是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得比较严重，如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因河床下切等原因，灌溉面积骤减十之八九，导致关中地区大旱饥荒时常发生。而且，关中地区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土地集中程度尤其高，贫富差距尤其大，能够上市交易流通和调集调运的物资很有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长安粮食告急，把周边能调运的粮食都调运过来后，才勉强度过了一场危机。[注]而在隋文帝开皇五年，情况就更严重了，把周边能调运的粮食都调运过来后，仍然无法消除饥荒，只好把周边的牛驴牲畜等调运到关中充饥。到了隋文帝开皇十四年，情况更糟了，从外地调运物资已应付不了危机，隋文帝只好带着官员们到洛阳“找食”。[注]到了唐朝，定都长安，这样的情况也屡屡发生。唐高宗去过洛阳6次，唐玄宗去过洛阳5次，唐中宗也多次前往，对此他颇感愤懑，称皇帝沦落成为“逐粮天子”。[注]

对关陇贵族集团成员来说，关中地区时常饥荒，对他们本身也是不利的，所以也不反对营建洛阳作为东都，至少不强烈反对，多持半推半就的态度。

关于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给隋炀帝上奏表说：陛下（隋炀帝）是木命，而长安一带属金，金是克木的，所以长安不可久居。洛阳北面

是山，三面皆水，木长于山，又能够得到水的滋润，大吉大利。洛阳才是陛下（隋炀帝）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定都洛阳，必能千秋万代。而且，隋文帝时就有民谣唱道“重修洛阳还晋家”，陛下（隋炀帝）曾为晋王，是大吉兆！隋炀帝看得心花怒放，于是决意营建东都洛阳。[注]

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不足采信。

首先，这个说法属于典型的捕风捉影式小道消息，根本算不得正经史料。其次，这个说法不合逻辑。章仇太翼是废太子杨勇的党羽，是隋炀帝不折不扣的政敌，不共戴天倒有可能，言听计从实在不可思议。再次，关于营建东都洛阳，隋炀帝的诏书里说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长安远在西北边陲，诸多不便，迁都洛阳，既能弥补长安的不足，又能安抚和震慑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注]

总之，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绝不是单纯出于荒淫逸乐的目的，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注]

开运河打通帝国“任督二脉”

不光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有很多传说，围绕开挖运河也有很多传说。

隋炀帝有一次看到一幅叫《广陵图》的画，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愣在那里，眼睛盯着画一动不动，好久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萧皇后很奇怪，就问隋炀帝：“这画当真就那么好，陛下看得魂都出窍了？”隋炀帝说：“我并不是单单喜爱这幅画，而是怀念以前游览过的地方。”说完，立刻用手指着画上的山水、村落、寺庙，一一讲给

萧皇后听。萧皇后听后，知道隋炀帝思念扬州了，于是就对隋炀帝说：“陛下既然如此思念扬州，何不前往游幸呢？”隋炀帝一听，很是动心，于是就决定走水路、下扬州。

水路怎么走呢？

隋炀帝早有打算，先进入黄河的支流汴河，从汴河到黄河，再进入东海，然后再从海路到淮河，再到扬州。

隋炀帝的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臣们就纷纷表示反对。原因是，如果按这个路线走，必然经过孟津这个地方，此处水流湍急，十分不安全，不能让皇帝去冒这个险。

这可怎么办呢？

正当大家都为难的时候，萧皇后的弟弟萧怀静建言了。他说，最近有术士发现睢阳（今河南商丘）有王气，这可不能等闲视之。既然陛下想走水路，天然水路又不安全，那不如人工挖一条水路，从汴河一直到挖到淮河。挖这条人工水路能一石二鸟：第一，这条水路能够解决隋炀帝下江南的交通安全问题，顺顺利利去扬州；第二，这条水路肯定经过睢阳，可以把睢阳的王气挖断了，以绝后患。隋炀帝一听，感觉很有道理，马上下令执行，于是就有了大运河。

这个说法靠谱吗？当然不靠谱！

这个说法，出自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开河记》。《开河记》作为笔记小说，本来就很不可信，关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这个说法尤其不可信。原因有二：第一，萧皇后根本就没有叫萧怀静的弟弟，只有一个叫萧琮的哥哥，是隋炀帝的内史令。第二，隋炀帝压根就不是个迷信的人。隋炀帝登基后改年号为大业，有大臣上奏说小篆体的“业”字，拆开看上下就像“苦末”二字，大业就是“大苦末”，不

吉利。隋炀帝却不为所动，照样用大业做年号，因为他想开创一番大业。注

因此，无论是游幸扬州也好，还是为了压王气也罢，这样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

那么，隋炀帝开挖运河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一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隋朝是由西边的北周（核心是关中、关东地区）、东边的北齐（核心是山东地区）、南方的陈朝（核心是江南地区）这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虽然用军事手段把这三部分“糅合”在一起，但是东边的山东地区、南方的江南地区一直都不太稳定。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就曾大规模反叛过。后来，隋炀帝当了皇帝，东边的山东地区响应汉王杨谅叛乱的地方也不少。

营建洛阳作为东都，对山东地区、江南地区有一定的安抚和震慑作用，但这种安抚和震慑作用是建立在较为快捷的人力、物力调配基础上的。当时的交通方式，水路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容量最大、速度最快的，综合效益远超其他交通方式。可见，开挖运河在军事上、政治上非常有必要。

二是为了经济上的需要。

到了隋朝，经济重心正逐渐东转南移，山东地区、江南地区都是富庶之地，特别是江南地区不仅发展速度十分迅猛，而且发展后劲十足，赶超之势十分明显，成为最富庶的地区指日可待。但这时，政治中心还在北方的关中和关东地区，这就需要调运山东地区、江南地区的物资以供应关中关东地区。

营建洛阳作为东都，相比长安更加接近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调运物资要方便很多。但由于当时交通还不够便利，物流运输成本过高，使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还不够顺畅。可见，开挖运河在经济上也十分必要。

可以说，如果不开挖运河，洛阳作为东都的功能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东都就名不副实。在这样的情势下，运河开挖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开凿，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非常优化的选择，就好比从帝国的“心脏”洛阳延伸出了两条大动脉，一下子活了整盘棋。

如果说营造东都洛阳让隋炀帝从地理空间上跳出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削弱了隋炀帝对关陇贵族集团的地缘依赖。那么，开挖大运河，就打通了帝国的“任督二脉”，全方位大大降低了隋炀帝对关陇贵族集团的依赖，让隋炀帝从政治、经济方面也跳出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

其实，隋炀帝杨广在当皇帝之前，统率隋军灭了南朝，后又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和扬州总管十余年，对江南的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江南的发展战略也成竹在胸。从后来通济渠、江南河工程设计科学合理、开凿快速顺畅的情况推测，他对开挖运河一事应该是筹谋已久，甚至已经蓝图在手，因此继位之后，很快便下诏开挖运河，通往江南地区的运河一年半就开凿成功了。试想：如果不是多年留心、长久谋划，光是头脑发热、为了玩乐，谁能心血来潮玩出这等水平来！注

改官制开科举打破门阀垄断

建东都、开运河，从地理空间、政治版图、经济基础等方面逐渐开始跳出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之后，隋炀帝就着手谋划从最核心的人事制度方面跳出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

前文已经提到，隋炀帝初年的宰相班子，6个人中5个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具有非常浓厚的“关中本位”色彩。其实，不仅宰相班子的构成是这样的，整个高级官僚层的构成都是这样，关陇贵族集团通过不合理的职官制度，牢牢把持着隋朝的朝政。

于是，隋炀帝从大业二年开始，陆续对官制进行改革。其实，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就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初步整顿，但仍然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合理、三省制没有真正确立、官吏名号重叠、队伍庞大臃肿、品阶制度繁杂混乱等众多严重问题。隋炀帝的官制改革，基本上消除了以上弊端，这些改革奠定了唐代官制的基础，影响非常深远。[注]

第一招，官员升迁，熬年头、凭资历行不通了。

隋文帝时，天下初定，为了笼络各级官员为朝廷卖命，对官员的升迁非常宽松，于开皇十五年规定，各级官员只要任职满了四年的任期，没出过什么大娄子，考绩过得去，就可以得到升迁。[注]隋炀帝于大业二年七月出台了新规定，取消了熬年头、凭资历就能升官的陋习，改为要靠才能政绩方能得到提拔。[注]为此，隋炀帝在尚书省吏部设考功郎，负责内外官吏每年一度的考核，按优劣定等级。

第二招，高级勋官名称“去关陇化”。

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代表是八大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为了巩固“关中本位”，因此西魏、北周、隋初的高级勋官名称都借用“柱国、大将军”的名称，以示优崇，加以强化。这些高级勋官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上柱国（从一品）相当于郡王的品阶，柱国（正二品）相

当于尚书令的品阶，上大将军（从二品）相当于尚书左右仆射的品阶，大将军（正三品）相当于纳言、内史和六部尚书、九卿的品阶。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四月撤销了带有“柱国”、“大将军”字眼的高级勋官名称，而改用光禄大夫、左右光禄大夫等名称进行替代，[注]以抹掉“柱国”、“大将军”等名称带有的关陇贵族集团的色彩，实际上也是一种降格。

第三招，取消中低级爵位。

封爵不同于其他官位，是可以世袭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中最特权化也最腐败的一个角落。隋文帝时，天下初定，为了笼络人心，爵位设置了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伯、子、男九等爵位，不仅过于繁杂，而且授爵广泛，到了过多过滥的地步。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四月，裁并取消了六级爵位，只保留王、公、侯三等爵位。[注]九等爵位取消了六等，使有封爵的世袭官僚人数大为减少，而保留的爵位都比较高，除非皇家子弟，是很难受赐爵位的。比如北周、隋朝名将郭衍，他曾效命于北周和隋两个朝代，北周时官至上柱国，因襄助隋炀帝继位立下大功，隋炀帝当皇帝后很快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再后来，隋炀帝率众沿通济渠南下到扬州视察，就是命郭衍统领的左军护驾，后又因护驾有功改授光禄大夫，可以说是恩宠甚隆。但就是这个郭衍，到了大业三年四月后，他的封爵武山郡公也被“从例除”，也就是被取消了。[注]可见，这项取消旧封爵的改革是相当严格地执行了，这就打压了贵族集团，使一批原来的达官贵族子弟丧失了世袭爵位的特权。

第四招，前朝的官位、爵位不再保留。

由于西魏、北周、隋、唐这四个朝代，皇帝都同出于关陇贵族集团，所以对前朝的官僚大多留用，爵位品阶也都继续承认。如隋初，隋文帝就下过诏令“前代品爵，皆依旧不降”，因此百官、封爵往往

“历世勋贤”，就算政权更迭也门第不衰，“稳坐钓鱼台”。隋朝的开国功臣中，占相当大比例的都是勋官，勋官子孙通过门荫或世袭而获得高官的也非常多。如先后任礼部尚书的杨素、杨玄感父子，参加并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后来称帝的唐高祖李渊，发动江都政变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等，全部都是勋臣子孙。隋炀帝进行了改革，前朝的官位、爵位都不再被承认。[注]这样的改革，杜绝了一大批前朝官员子弟以门荫入仕之途。

第五招，保留的王、公、侯三等爵位，没立功勋不能承袭。

以往的爵位，不管子孙有没有立功，都可以世世代代承袭，立下功勋的，原封不动的承袭，没立下功勋的，也只是降格世袭。隋炀帝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只有子孙立下功勋，才能承袭爵位，否则封爵本人死后就予以收回。[注]并进一步甄别封爵，没有功勋的贵族，不能再得赐封，爵位封户由按出身门第封赐，逐渐变为按功劳封赐。

第六招，对军功只荣誉封赏不实际封官。

隋初，为了平定天下，需要大力奖励战功，往往不仅给有军功的人以勋官的荣誉，还授予职官实位。这样做的弊端很大，勋官是征战的功臣，却不一定是治国的循吏。事实上，立下军功的人，多数是一介武夫，根本不懂如何治理一个地方，让这样的人去做封疆大吏，管理一方百姓，能管好才怪。因此，大业八年九月，隋炀帝下诏力矫以官职赏功的积弊，规定对军功只进行荣誉封赏，而不授予文职官位。[注]

第七招，精兵简政，裁并州郡，裁汰冗员。

据岑仲勉研究，隋文帝开皇初年，全国有200个州郡，开皇九年平定南陈后增设61个州郡，开皇至仁寿年间新置57个州郡，共计318个州郡。隋文帝时期，共废16个州郡，也就是说，隋文帝把帝国交给隋炀

帝时共有302个州郡。而隋炀帝时期，新设置了16个州郡，省并了119个州郡，因此全国共有199个州郡。换句话说，隋炀帝时，州郡的数量较隋文帝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多，而且还有一些州郡是新开拓的疆土，如冲州、农州、荡州等州和且末、西海、鄯善等郡。通过省并州郡，裁减冗员的效果十分明显。据杜佑记载，隋朝官员有12 576人（京官2 581人，外官9 995人），唐朝有18 806人（京官2 621人，外官16 185人）。注以上隋朝的数据实际反映的是大业年间的情况，唐朝的数据是天宝初年的情况，当时的唐朝正处于鼎盛时期，隋官人数少于唐朝约三分之一，可见隋炀帝裁减冗员的力度之大。

第八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是正式施行科举制。

大业二年，隋炀帝增加了进士科，正式确定了科举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创设科举制，是隋炀帝的“一小步”，却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开始走向终结，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央政府中来，既为国家选拔了真正有用的人才，又让政府的代表性更广泛合法性更高；把出身门第高但不学无术的人挡在了官场外，提高了官员的整体文化素质；把人事权从地方豪强世族手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归到中央政府手里，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政局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优点，科举制度被历朝历代所沿用，一直到清末，影响深远。隋炀帝大业年间，考取进士的有房玄龄、杨纂等人，后来都成为名留千古的贤臣名相。

隋朝并非“被政绩工程拖垮的王朝”

以讹传讹必须澄清。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隋炀帝营造东都、开挖运河，过度使用民力，超出承受范围，激起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因此隋朝是“被政绩工程拖垮的王朝”。

这个说法，很有迷惑性，也很有市场，得到非常多人的认同。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别急着下结论，让我们跟随历史学家胡戟一起来算笔账，算完了，真相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先看营建东都洛阳。

历史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两百万人……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冬至城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车相望于道。”这里面提到，营造东都洛阳的时候，每个月征发役丁两百万人，其中有四五成都死掉了，从河南荥阳一直到河南孟县，运送尸体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尸殍遍野。

这个记载可信吗？严重不可信！

按每月上工200万人，如果以当时每丁每年20日役、征发18批役丁来计算，一年零两个月的工程，总役丁数为4 200万人次，如果死亡的役丁占40%~50%，人数达一两千万之多，如此骇人听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且，这也根本无法解释为何洛阳工程完成后三年，全国户口数还能达到新的巅峰值：890万户、4 600万人口，进入东汉以后又一个极盛期。

其实，东都洛阳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全部工程是有轻重缓急，并分步骤进行的。皇城西南著名的上阳宫、西苑最西边的合璧宫（在

今河南新安县滋涧乡西南）和宫城内集仙殿等许多宫殿，都是唐代陆续修建的；“自宫城南承福门分洛水东至偃师入洛”的东都漕渠，是大业二年四月开始开凿的；洛口仓是大业二年末筑造的；洛阳东城是大业九年建的；外郭城在隋代只修了一圈短桓矮墙。而且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中还强调“今所营构，务从节俭”。

再看开挖运河。

隋朝开运河，前后役使的人力也是可以计算分析的。

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大业元年三月辛亥下诏，至八月壬寅隋炀帝下江都时使用，施工期最多为171天。邗沟，发淮南民十余万，与通济渠同时完工。两者合计，用工约两亿个。

永济渠，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大业四年正月乙巳下诏，最迟在大业七年二月乙亥隋炀帝从江都乘龙舟北上涿郡时全线完工，满打满算实际工程量为通济渠的3倍，不超过6亿个工。

江南河，于大业六年动工，完工日期无明确记载，但它比其他工段要窄一些，按八百里计算，江南河用工相当于上述三段（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总和的四分之一，则不超过两亿个工。

也就是说，开挖运河合计总用工量约为10亿个工。

这个估算准确不准确？让我们再换个角度算笔账。

运河的横剖面按照上宽59米（两百尺或四十步），深度按照7米（两丈四尺），坡度按照1∶1计，倒梯形的截面积为364平方米，大运河总长度按2 000公里计，则总工程量为7.28亿土方。尽管因地形高低不平，工程总量应增加一个系数计算，但考虑到每一段都有相当部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和旧运河故道，总土方量可计为7亿土方。投工10亿个，按每个役丁每天挖运一方土计算（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就可以

挖运10亿土方。因此，投工10亿个，完全可以完成开挖运河的土方，还有两岸的相关附属工程任务。

在开挖运河的六七个年头里，全国人口按4 600万计算，全劳动力占五分之二，有1 840万役丁，六七年就总共拥有400亿个工，开挖运河投工10亿个，只占2.5%。

如果开挖运河的工程任务全部由沿运河的郡县承担，会是什么情况？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隋大业五年豫、兖、冀、徐、扬等州近640万户中，运河邻近郡县的户数近500万，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就算开挖运河全部由沿运河的郡县承担，投工也只占整个劳动力数量的5%左右，也是可以承受的。另外，大业二年、三年这两年，没有开挖运河，还有休整的时间。

由此看来，在经过开皇之治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在社会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失时机地开挖运河，并一举完成，较快实现全线通航，是一件可以做而且非常值得做的事情。而且《大业杂记》也记载说：“时天下丰乐，虽此差料，未足为苦。”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并没有因为开挖运河而感到天下疲累、民生凋敝。注

急功近利中功败垂成

隋朝既然不是被政绩工程拖垮的，那么是什么点燃了隋朝灭亡的导火索呢？

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疲累天下，引发了农民起义，给了既得利益集团可乘之机。

隋朝时的高句丽，统治着今天的朝鲜北部和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地区，沿着鸭绿江两岸分布。今天的吉林中部、辽宁东部，在当时被称为辽东，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中，后来高句丽趁中原内乱之际占据了辽东。隋文帝时，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击隋朝统治下的辽西。隋文帝派了30万大军与高句丽对决，但由于士兵不适应高寒气候，伤病严重，而且高句丽也“打退堂鼓”遣使谢罪，于是大战就没打起来。

隋炀帝即位后，分别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第一次远征导致国内形势严重不稳，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隋炀帝仍坚持第二次和第三次远征，虽然最后高句丽请降了，但大隋帝国也风雨飘摇、行将末路了。可以说，是远征高句丽点燃了隋朝灭亡的导火索。

首先，征讨高句丽引发了农民起义。

高句丽地处苦寒之地，远离中原，远徙征伐，十分不易。为了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先后征发人力数百万，征调物资更是难以计数，结果却是大量士兵、壮丁枉死，大量财富“打了水漂”，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大量群众的生活因此陷入困顿。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加上水旱灾荒，导致民不聊生，引发了隋末民变，农民起义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有一首农民起义的歌谣叫《无向辽东浪死歌》（意思是“别去辽东白白送死之歌”），歌谣是这样唱的：

我是山东章丘一个看透世事的强盗，

看我的红上衣和锦色背带裤多豪气，

我手擎长槊伸到半空中，片刀发出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

我上山当土匪就以獐鹿为食，下山为强盗就吃民众的牛羊！

如果官兵到了，我想也不想提刀就迎上，

假如不用到辽东去送死，就算砍掉我脑袋又怎么样？！注

可见，为了攻打高句丽，社会民生受到了多大的侵害，不少民众家破人亡，只能落草为寇，做起土匪、强盗的勾当。

其次，征讨高句丽给了既得利益集团可乘之机。

前文已经说过，隋炀帝的诸多改革严重侵犯了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利益，对此，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反扑。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弄得山东地区和河北地区民怨沸腾，引发了局部农民起义，这样难得的机会，早有不满的贵族集团当然不会错过。

第一个起兵反叛的贵族是礼部尚书杨玄感。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春天，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命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粮草。当时，山东地区、河北地区已发生了局部农民起义。杨玄感于是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起兵谋反。杨玄感起兵后，对隋统治集团造成了大分裂，贵族官僚子弟如观王杨雄子杨恭道、韩擒虎子韩世谔等四十余人都来军中，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也与他通谋。对于局部农民起义，隋炀帝不以为虑，深知不足为患，但当他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后，立刻大惊失色，因为杨玄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代表。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贵族集团成员各怀鬼胎，要么直接起兵，要么利用农民起义，让隋朝分崩离析、土崩瓦解。

于是，隋朝的国势急转直下，从繁盛迅速转向衰败，隋炀帝的改革也在一着不慎中功败垂成。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已在江都等待时机两年的隋炀帝见无力回天，极度挫败之中，只好下令修建丹阳宫（今南京），准备暂时偏安东南，再作打算。可是隋炀帝带领的禁卫军绝大多数是关中卫士，背井离乡多年，而且十分不习惯南方生活，都盼望早日北还。在北还无望的情况下，虎贲郎将元礼等人与隋炀帝身边的近臣直阁裴虔通勾结，推举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逼迫隋炀帝自缢，50岁的隋炀帝就此一命呜呼。

隋炀帝，怎么也算是一代枭雄，死后却无处容身，仅由萧皇后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来，右御卫将军陈棱重新为隋炀帝发丧，江南人士感念隋炀帝以往的善待之举，集资给他补办了个还算像样的葬礼。

小结

罪或在当代，功泽被千秋

公元604年，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陈叔宝，在被俘（公元589年，杨广率领隋军入建康，陈叔宝被俘）15年后在隋朝的东都洛阳病死，终年52岁。杨广大笔一挥，给陈后主定下了谥号“炀”字。

造化弄人，历史更会捉弄人，杨广万万不会想到，14年后的公元618年，被宇文化及逼缢之后，自己也会得到一个“炀”字作为谥号。自己的谥号，居然跟自己最瞧不起的人一样，隋炀帝必定死不瞑目。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作为亡国之君的隋炀帝是不能奢望还能有个好名声的，无论生前他做过什么。后人向来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隋炀帝，从《南部烟花录》到《隋炀帝艳史》，从《炀

帝开河记》到《海山记》、《迷楼记》等，隋炀帝的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由稗官野史一手包办的，被大大地丑化了。而唐朝统治者主导的隋朝正史也以苛刻的标准要求他，给他一个不公道的评价。当然了，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于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流传着隋炀帝的传说——隋炀帝是个最坏的皇帝，一个终日花天酒地、荒淫寻乐的无道昏君。

然而，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

比如，民间传说将隋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声色。实际上，隋炀帝在这一点上，比绝大多数帝王做得都要好，他的嫔妃并不是特别多，而且他的正妻萧皇后从未遭到冷落，始终被尊重，后宫一直安宁有序。

再比如，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后门阀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注

世界就这么残酷，历史就这么任性，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就会比白痴皇帝更臭名昭著。可叹隋炀帝：罪或在当代，功泽被千秋。

1. 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年版，序言。

2. 蒙曼：《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2年版，第98页。

3. 《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

4. 赵德利：《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年第4期。

5. 黄富源：《陈寅恪唐初关陇集团说新解》，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期。

6. 综合[1]蓝颖春：《均田制：为古代鼎盛期奠定雄厚“基石”》，载《地球》204年第6期；[2]荆佳佳：《杜佑经济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2年。

7. 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年版，第63页。

8. 蒙曼：《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2年版第55页。

9.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10.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

11. 综合[1]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2]《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饥，斗米百钱。由山东、江淮运谷至长安，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多请皇上再往洛阳。韦后家本杜陵（在长安），不乐东迁，乃使巫者彭君卿等劝说中宗：‘今岁不利东行。’中宗信妖妄，后复有言幸东都者，帝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

1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甲子，公元604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13.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14. 综合[1]侯明忠、韩隆福：《论隋朝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因及意义》，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2]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

15. 蒙曼：《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2年版第70~7页。

16. 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年版第92页。

17. 吴洪琳：《评隋炀帝官制改革》，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年第30卷第2期第8~24页。

18.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19.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20.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旧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左右光禄……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以为散职。”

21.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开皇中，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为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

22. 《隋书·郭衍传》：“（大业三年）初，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

23.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制魏、周官不得为荫。”

24.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自今以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

25.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丰都爰肇，儒服无预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参于吏职。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已，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

26. 吴洪琳：《评隋炀帝官制改革》，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年第30卷第2期，第8~24页。

27. 本节内容根据胡戟所著《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年版）的相关章节编写，见第78~79页和第95~96页。

28. 《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29. 胡戟：《评价隋炀帝，最好先去运河上走走》，载202年5月7日《北京日报》。

第七章

唐武宗改革：拨乱反正赢中兴局面



唐武宗像一个街头的绘画家，他把安史之乱后的历史涂鸦，变成了凡·高笔下宁静的绚烂星空。只可惜，他离开之后，不断有人来涂鸦。

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有哪些改革？

你肯定会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承袭隋朝的制度并兴利除弊加以改革完善：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地方官的素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民族关系上坚决抵抗外族骚扰，加强国内民族的友好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用人方面，重用贤才，虚心纳谏。雄才大略修得正果，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你想必也知道，唐玄宗李隆基在登基后，面对朝廷元气大伤、吏治混乱腐败的局面，励精图治，推行改革。一方面提拔贤能做宰相，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一方面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节省政府支出。唐玄宗开元年间，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迅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得到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

你或许也知道，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改革；唐宪宗李纯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作为效法的榜样，为力挽安史之乱后的颓势，也进行了不少改革，重振了中央威望，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兴气象。

但，你多半不会知道——唐武宗改革。

唐武宗李炎在位时，年号会昌，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式的改革，削弱了宦官势力，打击了藩镇割

据，狠刹了歪风邪气，实现了政令畅通，扩大了财税来源，改善了民生福祉，缓和了社会矛盾，创造了唐朝后期最为平稳安乐的一段时期，成为“灰暗晚唐”的一抹亮色，赢得了“会昌中兴”局面。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曾经感叹：“如果唐武宗不早逝，李德裕不被早贬，唐朝完全可以复兴！”[注]

晚唐皇帝不如亡国之君

话说唐宪宗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后，逐渐骄傲自满起来，自以为立下了不朽之功业，特别是到了晚年，骄奢暴虐，政事荒废，政治衰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用宦官，把神策军（禁军）交给宦官统领，为日后埋下了严重祸患。

公元818年，唐宪宗下诏征求方士，得到一个名叫柳泌的道士为他配制长生药。刑部侍郎韩愈上疏，直言进谏，唐宪宗勃然大怒，差点把韩愈处以极刑。幸亏有几位朝廷重臣的全力营救，才保住性命，但被贬到荒蛮的潮州去了。

公元819年，唐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性情变得狂暴残忍，动辄打骂、诛杀身边的人，侍臣们一个个心惊胆战。在这种情势下，宦官集团分为两派，吐突承璀一派准备立李恽为太子，而王守澄一派则拥护李恒为太子，两派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公元820年，正月庚子日深夜，王守澄等宦官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了唐宪宗，然后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皇上“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让李恒继位，处死了吐突承璀。

从此以后，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把持操纵。

唐宪宗之后，唐穆宗、唐敬宗都沉迷享乐、软弱无能、朝政腐败，宦官日益嚣张跋扈，皇帝却形同傀儡。

唐文宗即位后，勤于政事，有所作为，矫正穆宗、敬宗以来的奢侈腐败之风，但剪除宦官的努力失败了。

唐文宗一心想拨乱反正铲除宦官势力，便从下层分别提拔了李训、郑注为宰相和御史大夫，作为心腹。他采纳郑注等人的建议，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任命王守澄的部下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管一部分神策军，以削弱王守澄的军权。后来，又趁王守澄的失职，削夺了他的兵权，最后又赐他自尽。不久，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凤翔在长安北部，能最快接应京师。三人定下计划，由郑注在凤翔搬兵，利用宦官为王守澄送葬的机会，来个突然袭击，将宦官一锅端。可在这节骨眼上，李训却打起了小算盘，他乘郑注去凤翔搬兵之际，极力唆使唐文宗临时改变计划，抢先一步行动，以抢占功劳。

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宰相李训指使手下官员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有甘露。官员说完，李训就立刻带领文武百官向唐文宗道贺，称天降祥瑞。唐文宗故作惊讶，命李训率领百官去勘察，李训查勘核实后认为不是甘露。唐文宗再一次故作惊讶，命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前去重新勘察，由李训的亲信韩约带路。此时，左金吾大厅已经提前埋伏好了几百名亲兵，就等仇士良等人来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可惜这个韩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没到左金吾大厅，他就已经紧张得不成样子，让仇士良有了疑虑。到了左金吾大厅，一阵风吹动了门边的幕布，仇士良等人看见了伏兵，赶紧退身逃回，并将唐文宗掳走。喘过气来，仇士良就疯狂报复，指挥神策军屠杀了李训等朝官1000多人。郑注听闻变故后，率兵退回凤翔，也被监军所杀。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

事变之后，唐文宗就被宦官软禁了，完全成为一个傀儡，国家政事全由宦官说了算，宰相们沦为宦官的秘书，朝廷的官员们在血雨腥

风中苟延残喘。唐文宗对此一筹莫展，只能借酒消愁、寄情诗赋，紧跟着病倒了。

公元839年冬日的一天，唐文宗病情稍有好转。这一天，坐在思政殿，唐文宗召见翰林院值班学士周墀，和他一起喝酒，问道：“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些帝王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一类的帝王。”文宗说：“朕岂敢和尧、舜相比！我问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能赶上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大惊，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亡国之君，怎么比得上陛下的大圣大德。”唐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受制于各地强大的诸侯，而今朕受制于宦官家奴。就此而言，我实在还不如他们！”唐文宗说完，悲伤不已，泪下沾襟。周墀也拜伏在地，泪流不止。从此以后，唐文宗不再上朝。注第二年，唐文宗在无限的惆怅中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太和殿。

皇帝“连亡国之君都不如”，这便是晚唐的政局。

而唐武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推行改革的。

反宦官专权匡正朝局

其实，唐武宗能当上皇帝，也是宦官弄权操纵的结果。

本来，唐文宗能病重后，立了唐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死前又密旨托孤，托付宰相李珏和枢密使刘弘逸等辅助太子治国。但是仇士良、鱼弘志心怀鬼胎，相互勾结，以太子年幼多病为由，否决了太子继位。两人假传圣旨，将唐文宗的五弟颍王李瀍（后改名为李炎）推上了皇位，这就是唐武宗，年号会昌。注

仗着唐武宗是自己拥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俨然“太上皇”，对唐武宗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凡唐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

侍，皆诛杀贬谪。

唐武宗虽然是被宦官拥立才当上皇帝，但他也曾目睹宦官之害，深知宦官可以立自己做皇帝，也可以将自己废掉的道理，所以也一直想要削弱宦官的势力，可鉴于宦官掌控着神策军，知道直接削弱肯定是行不通的。好在唐武宗有勇有谋，刚毅果断，喜怒不行于色，虽然内心憎恨仇士良，但表面上对他是尊宠无比。

既然不能直接削弱宦官势力，那么就让宦官势力的对手变强大好了，对手变强大了，宦官势力自然就相对削弱了。

第一招，任用李德裕为相，加强宰相职权，削弱宦官势力。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古代中国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畅通，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都是在贤相的辅佐下实现的。

但安史之乱后，政务中枢体制逐渐解体，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形同虚设，相权渐遭削弱日益式微，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甘露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天下事都由宦官集团决定，宰相沦为宦官专权的附属品。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唐武宗即位不久就任命李德裕为宰相。稍后，李德裕向唐武宗上奏要事，最重要的两点都同加强宰相职权有关：其一，确确实实保障宰相应有的职权，与此同时，严格限制宰相的任期；其二，恢复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也就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诰命的中书舍人参与宰相领衔的常务会议，让皇帝与宰相的沟通顺畅起来，从而不被居心叵测之人挑拨离间。

这个建议非常符合唐武宗的意思，马上予以应允。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对任期加以限制的做法，既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行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又能抑制宦官权力扩张。

于是，唐武宗与李德裕联手，君臣相帮、相衬、相扶，成为晚唐君臣相知的绝唱，给朝政带来了新气象，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宦官势力确实被削弱了。

第二招，重用薛元赏，加强京兆尹力量，削弱宦官势力。

薛元赏这个人是个只讲律法不论其他的直臣、“愣头青”，在“甘露之变”后不久，也就是宦官与神策军气焰十分嚣张之时，都敢当众按律处死神策军将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京兆尹（京师行政长官）薛元赏前往宰相李石府上拜访。一进院门，薛元赏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喧哗。了解得知，原来是一个神策军将领在和宰相争吵。薛元赏做事也讲究策略，他没有直接去斥责那个无礼的神策军将领，而是假装批评宰相李石：宰相是朝廷的首辅，天子委以重任，抚四夷，调阴阳，安百姓，同人心，这些都是不能怠慢的事情。提拔贤良，贬黜不肖，将赏功臣，惩罚罪恶，这些都是宰相的职责。身负如此大任，宰相怎么能听任一个小小的神策军将领这么放肆。礼仪如果失去正常的秩序，朝廷的纲纪就会混乱。当宰相都会受到下属的呵斥，又怎么能指望你去整顿朝纲，更谈不上威震四方了。说完这些，就将这个神策军将领带走斩首了。注这可震惊了朝野上下。在当时，只有神策军杀朝官的份儿，还没听说有哪个朝官敢杀神策军的。但由于京兆尹要负责整个京师的行政治安，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治安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能对抗神策军，所以宦官们也拿他没辙。宦官们提起薛元赏，没有不害怕的。

唐武宗重用薛元赏，加强京兆尹力量，借用这个治安队伍，牵制神策军。

仇士良感觉出自己被唐武宗疏远，就琢磨着如何挤走李德裕，夺回自己的地位。正在仇士良处心积虑的时候，机会来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李德裕奉唐武宗之命起草赦书，削减神策军衣粮及马草料费用。仇士良知道后，立刻派人在神策军中散布流言，想以此鼓动神策军闹事，借机除掉李德裕。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闻讯后即刻进宫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听后马上明白了其中的蹊跷，当机立断，果断决策，遣中使到神策军去宣布御旨："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一切都是皇帝的安排，跟宰相毫不相干。"

由于应对及时、反应迅速，成功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唐武宗继续"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还将他提拔为观军容使，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剥夺兵权。仇士良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也明白了唐武宗对他的态度，于是以身体有疾为由，主动提出退居二线。唐武宗当然顺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仇士良在内侍监的位子上没呆多久，感觉大势已去，没有卷土重来的希望了，就干脆辞职退休了。退休不久，仇士良就亡故了。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由于受一个大案的牵连，仇士良家被搜查，结果一搜搜出了大麻烦——府中藏有几千件兵器，这可是谋逆的节奏。唐武宗于是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没收所有家产。由于仇士良在进宫做太监前已成亲并育有子女，其家眷全部流放边关，男者充军，女子充为营妓。[注]

从此，在唐武宗一朝，基本匡正了朝局，宦官不再像往常那般嚣张跋扈，不再威逼皇帝、胁迫大臣，皇帝和朝官能正常地履职办公，政令也基本畅通了。

反歪风纠正政风积弊

反宦官专权匡正朝局，是唐武宗拨乱反正改革的必要条件。从长远来看，则要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风这个根本着力。

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风，唐武宗首先进行了反歪风运动，拨乱反正，以纠正官场的歪风邪气。

承平日久，就容易安于逸乐。从唐玄宗后期开始，社会风气逐渐变得浮华逸乐起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行其道，特别是各种游宴（嬉游宴饮）活动风靡社会、席卷全国。

虽然安史之乱“惊破霓裳羽衣曲”，打断了全国上下的歌舞升平，使大唐帝国的游宴之风被迫沉寂了几十年。但从唐德宗后期开始，喘过气来的大唐帝国，游宴活动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而且朝廷对官方和民间的游宴活动实行宽容甚至鼓励的政策，所以游宴活动变本加厉，越发浮华奢靡起来。

中晚唐时，公卿士子的流行风尚就是携妓游宴。每逢好天气，每逢好日子，公卿大夫们就携妓狂游，终日饮酒作乐，完全不顾公干。如唐文宗时，从宰相位子上退下来改任河南留守的裴度就经常召集名士一同游宴。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在洛水边举行祭祀大典，提前一天去信给河南留守裴度。收到信后的第二天，裴度召集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15人，在船上大摆宴会。从早晨直到晚上，玩水的玩水，奏乐的奏乐，赋诗的赋诗，饮酒的饮酒，远远望去，就像神仙一般，观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注

在中晚唐当过集贤校书郎的丁公著，曾撰文批评中晚唐公卿大夫耽于游宴放纵无度的积弊：“以前的名士，良辰吉日设宴聚会，对酒当歌，谈诗论赋，清简质朴，雅致有序。从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风

气就变得浮华奢靡起来，锦衣玉食，喧哗闹腾。更有娼优妓女，夹杂其间，公卿大夫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沉湎其中乐此不疲。”[注]可见，中晚唐的游宴，歌妓不是在旁边载歌伴舞，而是坐在筵席当中，不仅歌舞娱人，还充当“三陪”，与公卿士子卿卿我我，甚至充当权力的“皮条客”。

更为荒唐的是，唐代官吏们还享有专门的宴会钱，刺激了不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靡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荒废了公务政事，影响特别恶劣，危害十分巨大。[注]

为整肃政风、改进作风、纠正官场的歪风邪气，唐武宗在全国开展反歪风运动，其重点就是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唐武宗专门下诏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刑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非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饯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注]归结起来就一句话，那就是禁止无节制的游宴。

诏书说的“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等耽误公务政事的现象，绝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司空见惯、见惯不怪。例如，唐文宗时，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王源中酷爱游宴，嗜酒如命，就多次荒废公务。有一次，唐文宗急召王源中入宫，但他喝醉了还没醒，没能去觐见，御史弹劾他，他也没有悔改之意。后来，唐文宗又召他入宫，他又喝醉了，又没能及时觐见。唐文宗十分恼火，以他有眼疾为由，把他外放了。[注]可见，游宴盛行让不少政府官员沉湎于此、不能自拔。试想：国家公职人员整日纸醉金迷，莺歌燕舞，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由此可见，唐武宗罢游宴是很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之举。

为了推动罢游宴反歪风，唐武宗自己做出表率，取缔了最高规格的游宴——进士曲江集宴。每年三月时分，朝廷在曲江为新进士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皇帝也会亲自出席。宴会那天，新科进士身穿盛装，带着仆人，骑着高头大马，甚至还带着名妓伴游，以显示自己的尊贵。游宴活动除了胡吃海喝、攀结权贵外，还会游览湖光山色，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唐武宗取消曲江集宴，就是考虑到上行下效，推动“禁止官员游宴”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除了罢游宴，唐武宗还对官员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严加约束和限制。中晚唐时，歪风邪气盛行，官员之家遇到婚丧嫁娶，就会大操大办，借机收受礼金，变相收受贿赂，大搞权钱交易，民众苦不堪言，怨气很大。会昌元年（公元840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文武百官及庶人婚丧嫁娶事宜，以防官员借婚丧嫁娶之机，大操大办，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腐化社会。唐武宗欣然应允，下诏严禁官宦之家大操大办婚丧嫁娶，更不得借机搞权钱交易。

唐武宗以严格限制官员游宴、禁止大操大办等为突破口，掀起反歪风运动，对于纠正官场的歪风邪气、改善官员的形象、提高政府效率都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也收到了实效。

反腐败斧正官场沉疴

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风，唐武宗在反歪风的同时，也着力反腐败，主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事后严厉惩治腐败；二是事前预防腐败。

事后惩治方面，唐武宗本着“治理乱世，须用重典”，用法较为严苛，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发现一个惩处一个，绝不包庇纵容。这可从唐武宗的几次赦令、诏令中看出端倪。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即位。按照旧例，新皇即位，都会大赦天下，唐武宗在大赦天下的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的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也就是说，唐武宗即位后的大赦天下，把贪赃枉法的官员视同十恶不赦的罪人，不予赦免。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诏严惩腐败：“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对待，文武官员如果收受赃物达到丝绢三十匹，就处以死刑。”可见，对惩治腐败，唐武宗绝不手软。没过多久，唐武宗进一步降低了对贪赃枉法官员处以死刑的标准，再次下敕令“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高标准、严要求地从重从严制定反腐政策，唐武宗的反腐决心可以明鉴。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唐武宗加尊号后再次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不赦、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免之限。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贪赃枉法依然不予宽宥，并说“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就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这显然是对会昌年间反腐政策的肯定和自誉。注

考诸史籍，不难发现，唐武宗时期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一把尺子量到底，一根杆子戳到底，始终没有放松，保持了反腐的连续性、稳定性、持续性。

事前防范方面，唐武宗针对吏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尽力消除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

第一招，官员薪酬重点向基层一线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中晚唐时，重视在京的官员而轻视外放的官员，所以官员多不愿到外地为官，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的地方，更是没人愿意去，结果就造成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的官吏严重冗余，而边远地区则空缺严重。官吏冗多的地方，僧多粥少，容易滋生腐败；缺官少吏的地方，缺少制衡，也容易产生腐败。这是个大问题，关系到官吏队伍的总体素质和整体质量，特别是边远地区，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直接关系到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

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不久，就下令调整各地官员的俸禄，重点向基层一线艰苦边远地区倾斜。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艰苦边远地区，官员的俸禄大量增加，以吸引官吏到艰苦边远地区补缺，并派观察判官专管这项工作，保证专款专用，按时足额发放。唐武宗的这项改革，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加强了官僚队伍的建设。

第二招，用养廉银、公务贷帮助官员摆脱经济上的困顿。

唐武宗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人不少都有债务，称之为“京债”，上任后才开始还债，债务压身以至于官吏贪赃。这样的情况，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真正解决的，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收到实效。

为解决官吏的“历史欠账”，唐武宗果断地增加了官吏的薪俸，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养廉银”，同时国家以较低的利息借钱给官吏去还债，以减轻官吏的债务压力。这两个改革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确实能促使官吏奉公守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通过改革，事后惩治腐败更加严厉，事前预防腐败更加有效，唐武宗时期，反腐从治标到治本逐步推进、步步深入。

反仕途太滥导正入仕门径

“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注]这是后世历史学家对唐朝后期弊政的精准把脉。

唐朝后期，仕途太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弊病；二是科举取士“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不仅选拔不到真正有用的人才，还让士子们失落失望、人心涣散。

先看门荫特权泛滥。

唐代享有荫子特权的，除皇室宗戚外，还有各级权贵。按照门荫法，一品职事官的子弟的散阶为正七品上，二品官的子弟为正七品下，自三品开始有正从之分，其子能得到的品阶递降一阶，从五品子从八品叙。不仅职事官，赠官、散官、勋官也按相应的规定荫子弟。虽然门荫只限于五品以上官员，但是对六品至九品官，也给予一定的照顾，他们的子弟可以“品子”身份服职役后获得做官资格。

对于大多数高官子弟来说，他们在取得散阶后，再充任三卫、千牛备身、殿中省进马、太庙及郊社斋郎等职，获得参选资格，然后逐步劳考升迁。此外，国子监下设的六学、门下省弘文馆、太子东宫崇文馆也多由高官子弟垄断荫补，二者虽不是职事官选，但由于“速于登第”，也是入仕的一条通途。

还有一种不依令文、旨在体现对臣下特殊恩宠的皇帝特授。例如，追荫前朝功臣子弟、表彰本朝忠臣而对其子弟恩赐，以及因战事等紧急情况的临时赐官等。这种皇帝惠赐臣下的恩荫实质上与门荫无异，其实也是门荫的一种特殊形式。

享受门荫特权的子弟，不必十年寒窗，就算是不学无术，也可以凭借祖上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他们之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英才，但较之纨绔子弟，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高官子弟除了在政治上享有做官特权外，还享有经济上的免课役权，法律上的议、请、减、赎的待遇，并且在奖酬功劳时也有一定的优先照顾。注

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弊病多多，“仕途太滥”只是政治方面的危害，在经济方面，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国家的税收就“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唐武宗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下令，“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茯家下并不在影庇限”，注严格限制官宦之家的门荫特权。

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严格执行用荫标准，政治上可以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经济上可以增加国家编户、扩大财税来源。唐武宗时期，在户籍上的可统计人口数量有显著增长，这与限制官宦的门荫特权有很大关系，因为很多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了。

再看科举取士浮薄。

一方面，进士科“大扩招”，质量严重下滑。这就像前几年的研究生大扩招一样，数量迅速增加，质量自然就下降了。而且当时干谒之风盛行，士子们参加考试前都削尖脑袋争做显贵的门生，科举取士充满各种猫腻，考试的内容也不注重联系实际，选拔不到有真才实学的人。

另一方面，读书人中举以前，往往要十年寒窗苦读，根本没有时间考察民情，与社会脱节，对基层陌生。可一旦中了进士，就会被授予正职，或者负责一个部门，或者成为一方父母官，执政过程中难免出现脱离实际不符合需要的情况。当然，责任并不都在进士们身上，

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没有门荫可庇，为了跻身仕途，除了长年埋头苦读，没有别的选择。不谙民情也好，脱离群众也罢，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社会造成的。

鉴于此，唐武宗对科举取士进行改革。

其一，严格进士复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唐武宗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每年的录取人数大大减少，而且只封顶、不保底，宁缺毋滥。

提高铨选质量，看来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注]就说明了此举的效果。例如，会昌四年，进入复试的有25人，其中5人被看好，但复试后只录取了一人；会昌五年，进入复试的有37人，但复试后只录取了7人。从严从实进行筛选，对提升官僚队伍的素质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对新科进士的实授，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唐武宗下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也就是说，新科进士一开始只能被授予协助性职务，而不能授予正职，等得到历练之后，再提拔到正职。

不仅如此，还对诸道奏授官也做了一定的限制。当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诸道奏授官过多过滥。一方面，奏授官消耗了大量的财富，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另一方面，奏授官都是门生故吏，“颇启幸门”，使恩非出于朝廷，容易催生地方集团势力，影响

朝廷威信，危害中央集权。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凝聚力。注

严格限制门荫特权、严肃科举取士用士，这都是增量改革，在这两项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唐武宗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听从宰相李德裕之言，进行了存量改革，即对冗官进行了裁减，裁掉冗官2 000多人。至此，唐武宗基本治理了仕途太滥，导正了入仕门径。

反寺院经济厘正财税来源

魏晋南北朝后，寺院僧侣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免税政策，从而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独特的封建地主经济形式——寺院经济。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寺院的封建经济，其来源除官方和民间的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寺院经济的两大支柱。史载，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经济部门中，邸店、店铺、碾、油坊、车坊的经营日益受重视，晚唐时较为富裕的寺院一般都有邸店多处。

众所周知，寺庙多一个信徒，封建国家就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而且，寺院的庄园占了很多土地，而且与世俗经济不同的是，寺院无须拆分田产，所以寺院的土地只增不减，有积无散，日日加多，不断扩张。

扩张中的寺院经济侵蚀着政府的财政收入。首先，唐时取得度牒者免赋役，唐中宗时，已发现高户多丁、黠商大贾的大量伪造度牒。安史之乱后，藩镇各置戒坛度僧，税钱充军费，寺院的伪度、私度，造成了避役者的增加和官府赋税收入的减少。因而，唐宪宗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收效甚微。

毫不夸张地说，寺院经济，因其经济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和外溢性，威胁到了封建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威胁到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注

针对这种情况，唐武宗进行改革，严厉打击寺院经济，厘正国家财税来源。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遣散了部分非正式僧尼，拆除了一些不正规的小寺院等，对一些发展僧尼的活动进行限制。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唐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唐武宗陆续下令，打击寺院经济：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遣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限留婢二人；继续拆除不正规的小寺院。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二月，唐武宗下令“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舍利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寺院经济的举措。唐武宗下令， 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5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另外，没有祠部度牒的，无论什么年纪都要还俗。根据唐武宗的旨意，这年秋天，裁并天下佛寺：全国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拆除；下州寺院全部拆除。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在打击佛教寺院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外来的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打击手段。

全国各地拆除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税户。

唐武宗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共拆除寺庙4 600余所，拆招提（民间私造的寺院）、兰若（较小的乡村寺庙）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清查出不是奴婢但依附寺院不在编户的人口50多万，发还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袄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3 000余人还俗。[注]

打击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契合了人民的愿望，当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刬之”。

通过打击寺院经济，国家的编户增加了近百万人，纳税的田地增加了数千万顷，大大扩充了国家的财税来源，也解放了劳动力和生产力。

在经济领域，唐武宗还规定政府官员不得经商，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中国古代进行抵押物品放款收息的商铺）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的赦文宣布：“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仅食用俸禄就好，不要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严禁有人既做官又做商人放高利贷，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御史台要察访监督，及时上奏。”这项改革，有利于民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反藩镇割据扶正中央集权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各节度使尾大不掉，朝廷政令难行。尤其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继任不由朝廷委派，而是自传子侄，或由部下悍将夺位，俨然如独立国家。这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等三个节度使的合称，指晚唐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即范阳（又称幽州或卢龙，今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长城附近一带）、成德（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区，今河北省中部）、魏博（后改称天雄，渤海湾至黄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其他节度使虽由朝廷任命，但也常常桀骜不驯。

这样的情势，让陈寅恪认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注)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又称泽潞节度使，管辖今天的山西长治到河北邢台）刘从谏病死，他的侄子刘稹向朝廷投书，要求接替节度使职务，就像河朔三镇的节度使那样子袭父职。

唐武宗与大臣们讨论此事时，多数大臣都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理由有二：一，刘氏父子控制泽潞地区20余年，根基深厚，已经逐渐具备了河朔藩镇的性质。另外，对于朝廷而言，刘从谏的罪名只在于他死前以其侄子刘稹为留后（代理节度使），侵犯了朝廷对节度使的任命权，但刘氏父侄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没有谋反的表现。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当时与回鹘的战争还未结束，唐朝中央无论在军力还是财力上都很吃紧，再发动对泽潞的战争，国力恐怕难以支撑。(注)

只有宰相李德裕持不同意见，坚决主张予以讨伐。他认为：“泽潞镇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三镇远离中央，乱象由来已久，人心难化，鞭长莫及，所以很久以来，朝廷都不计较，听之任之。但泽潞镇地处心腹，就在东都洛阳的北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而且历史上泽潞镇一向是听从中央指挥的，还曾经为朝廷出过力、尽过忠。”注他又进一步分析说：“刘从谏嚣张跋扈，对朝廷不恭顺，多次上表迫胁朝廷，如今死之前又擅自把兵权交给他的侄子刘稹。如果朝廷就这样听之任之的话，那么各个藩镇的节度使恐怕都会加以效仿，那真是要国将不国了！”注

唐武宗是倾向于征讨泽潞镇的，但比较担心国力不支、不能取胜。这时，李德裕胸有成竹地向唐武宗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给唐武宗吃了一颗定心丸：“刘稹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想凭仗河朔三镇，但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都不会来支持他，所以刘稹是注定失败的。……如果能争取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的支持，不阻挠中央军的话，平定泽潞那是手到擒来。”注唐武宗听后，信心倍增，于是决定对泽潞镇用兵。

后来，唐武宗又设法争取到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值得一提的是，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不是按惯例袭任的，而是由唐武宗调外将任命的）的支持，共同讨伐泽潞镇。唐武宗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泽潞，并约定在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发兵后，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往往有名无实，只是做做样子，虽然军饷由中央负担，但各藩镇往往想让别人两败俱伤后坐收渔利，所以常常找各种借口拖延，观望逗留，逡巡不前。二是监军干预军政严重，束缚了将帅的手脚，导致指挥不力。

为了防止重蹈覆辙，这次刚一发兵，李德裕即奏请唐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鄗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把丑话讲在前面，不给各藩镇节度使留任何逗留不前的借口。因此，各路兵马迅速进发，直接攻向叛镇的核心地区。紧接着，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严令监军不得干预军事，但仗打赢了，跟将帅一样记功获封赏。这样一来，将帅们得以大展拳脚，有效地指挥军队进行平叛。注

由于决策正确，指挥得当，唐武宗不到一年半就完全平定了泽潞之乱，把趋于分离的泽潞一镇重新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

唐武宗平泽潞之乱，是唐朝平定地方藩镇叛乱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朝中央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十分关键，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唐宣宗尽反会昌葬送改革

本来前景一片大好，会昌中兴确确实实地呈现出一派较为兴旺发达的景象，可是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因服食丹药暴毙而亡。唐宣宗继位后，“尽反会昌”，把前景一片大好的改革大业葬送殆尽。

史家历来对唐宣宗时期的“大中政治”评价较高，还有人称之为“大中之治”，甚至称唐宣宗为“小太宗”。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唐宣宗之所以会被部分史家称为“小太宗”，据说是由于他善于纳谏。有一次，唐宣宗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谏官纷纷上谏，谏得极为激烈，他于是取消了行程。无独有偶，唐太宗纳

谏，得了魏征；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征的五世孙魏谟。魏谟是唐宣宗读《贞观政要》后，思慕魏征，从而在魏征后裔中找出来的。魏谟入仕后，再现了魏征直言极谏之风，其他人进谏，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谏，唯独魏谟开门见山，无所忌讳。唐宣宗常叹："魏谟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善于纳谏，本来是不该因人而异的，而魏征的五世孙魏谟纳谏较之他人就特别有效，可见唐宣宗对魏谟的纳谏是特别加以关照的。为何特别关照魏谟的纳谏，恐怕还是因为他是名臣魏征的后代，这样想来，唐宣宗善于纳谏更可能是沽名钓誉而已。

其实，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就会发现，唐宣宗实际上只是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数废止，扼杀了唐朝最后一次改革自救的机会，也把唐王朝牵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

先看宦官势力。唐武宗加强宰相职权，充分信任宰相李德裕，重用薛元赏，加强京兆尹的力量，从而削弱了宦官势力，并从宦官手里收回了神策军的兵符。但唐宣宗一上台，就贬走了李德裕和当时唯一能让神策军为之忌惮的朝臣薛元赏，结果宦官很快就重新控制了神策军，兵符也回到了宦官手中。不仅如此，唐武宗时下令剥夺了宦官控制的祠部发放宗教度牒的权力，由泓胪寺管理，以打击宦官集团的经济实力，但唐宣宗即位后重新恢复祠部发放度牒的权力，并为仇士良及其家族"昭雪"。

再看官场风气。唐武宗为了纠正官场的歪风邪气，以"严格限制官员游宴，禁止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突破口，掀起反歪风运动，并取消了皇帝亲自参加的曲江集宴。唐宣宗一上台，立刻恢复了曲江集宴，后来又重新宽容和鼓励各种游宴活动，官场风气重新败坏，社会风气重新奢靡无度起来。

再看入仕门径。为了治理仕途太滥，唐武宗严格限制门荫特权、严肃科举取士用士，并裁掉了冗官2 000多人。但唐宣宗一上台，就对进士科“大扩招”，上台仅仅一年，官员就增加了383名，而他当了13年的皇帝，增加的官员数量之多可想而知。吏治方面，到了“乱则未乱，但侥幸者多，乱亦非难”的程度。

接着看寺院经济。为了厘正国家财税来源，唐武宗严厉打击寺院经济，但唐宣宗一上台就解除了对寺院经济的限制，还鼓励重建寺庙，以牺牲政府财税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及民众的支持，导致寺院经济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最后看藩镇治理。在藩镇问题上，河朔三镇是藩镇割据的源头，但河朔三镇联盟在会昌年间随着唐武宗调外将张仲武任卢龙节度使而大有改观。但唐宣宗时期，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没有一个是朝廷任命的。

小 结

一任一蓝图，规划成鬼话

唐武宗改革，在大好形势下却戛然而止，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难怪王夫之要感叹：“如果唐武宗不早逝，李德裕不被早贬，唐朝完全可以复兴！”

历史不能假设，事实没有如果，但教训一定要吸取：改革要“一张蓝图抓到底”，绝不能一任一张蓝图，否则改革规划就会变成“鬼话”，无法达成。

也就是说，推进改革，不只是短期任务，更是长远战略；非一日见效，需久久为功。

因为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难以一任完成，需要一届接着一届干、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在持续接力、连续发力中达成改革目标。

可惜唐宣宗“尽反会昌”，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数废止，扼杀了唐王朝最后一次改革自救的机会，也把唐王朝牵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事实上，唐宣宗时期，唐王朝就开始风雨飘摇了，东南部军乱不断：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

大中十一年，容州军乱；

大中十二年，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同一天，湖南军乱；一月不到，江西也发生军乱；隔了不到一个月，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年底，容管都虞侯来正谋叛；

大中十三年，武宁再次军乱；

……

虽然这些军乱规模都不大，也都被平定了，但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相当恶劣。此时的唐朝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随便有所震动，这座大楼就可能坍塌。由此可见，把唐宣宗称为“小太宗”实在极为不妥。

很多人都认为是唐宣宗的儿子唐懿宗败光了唐宣宗留下的基业，其实是误解。唐懿宗的确是个昏君，但唐宣宗留给他的局面并不是小康或小安，而是一个军队叛乱频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衙北司斗争激烈的烂摊子，再加上唐懿宗本身的昏庸，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唐朝也在唐宣宗死后几十年就走向了灭亡。

这警醒后人：别一任一张蓝图，而要一张蓝图抓到底。

1. 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

2.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乙亥，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3.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瀍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将兵诣十六宅，迎颍王至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思贤殿。瀍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辛卯，文宗始大敛。武宗即位。”

4.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

5. 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载《中国史研究》997年第期。

6. 《新唐书·循吏传·薛元赏》：“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尝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相府，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竞者。元赏问焉，曰：‘军中军将。’元赏排闼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军中一将而敢无礼如此？夫纲纪凌夷，犹望相公整顿，岂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趋而去，顾左右：‘可便擒来。’时仇士良用事，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

7. 《新唐书·仇士良传》：“帝（唐武宗）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卒，赠扬州大都督。……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

8. 洪迈：《容斋随笔·裴晋公禊事》：“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9.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

10. 马丽梅：《中晚唐社会游宴之风对晚唐词“艳”风的培育》，载《安徽文学》203年7月下半月刊。

11. 见《全唐文·卷七十六》。

12. 《册府元龟·卷九百十四》："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

13. 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载《中国史研究》997年第期。

14. 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载《中国史研究》997年第期。

15. 综合[1]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载《南开学报：哲社版》997年第期；[2]蒋爱花：《唐代中下层官员入仕之路研究——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载《前沿》202年第23期。

16. 见《全唐文·卷七十八》。

17. 见《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二·贡举五》。

18. 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载《中国史研究》997年第期。

19. 综合[1] 谢重光：《晋唐寺院的商业和借贷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第期；[2] 万李义：《浅析唐武宗毁佛的经济动因》，载《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期；[3]刘小平、马楠：《唐代均田制与寺院经济变迁的制度化分析——以"僧尼授田"为中心的考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寺院经济"词条。

20. 综合[1]方胜：《唐武宗会昌灭佛中寺院及僧尼留存情况》，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期；[2]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83年第期；[3]周奇：《唐代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以寺院土地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期；[4] 刘俊林：《中国寺院经济史话》，刘俊林新浪博客。

21. 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2. 李向菲：《唐武宗君臣讨伐泽潞原因新论》，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2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

2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2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

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

26. 田廷柱：《李德裕》，载《唐史论丛》990年。

第八章
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想当回外科医生，给病重的北宋动个手术，不幸的是，他患有晕血症，所以手术才刚刚开始，他就因为看见了血而临阵脱逃了。

公元1043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三年的一天，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军委副主席）富弼一起对报上来的监司名单一一进行审核。

原来，朝廷为了整顿吏治，要选派一批官员到各路去担任监司。“路”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称，相当于后来的省，“监司”（监察官，相当于后来的巡抚）便成了管辖一方的大员，不仅权力大，责任也十分重大，身系一方苍生的冷暖安危。

突然，范仲淹拿起大笔，勾掉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过了一会，又勾掉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原来，名单中的人，鱼龙混杂，有的是众所周知庸碌无能的“不才”者，有的曾贪赃枉法过，对这些庸吏贪官，范仲淹“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也就是毫不留情地提笔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撤换。

这时，同他一起负责核查名单的富弼，看见范仲淹勾去甚多，心有不忍，就对他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就轻易地去掉了一个人的乌纱帽，哪知这一来就要弄得人家一大家子哭鼻子呢。”

一向光明磊落的范仲淹反问富弼：“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思是说，罢黜一名滥竽充数、尸位素餐的官员只是他一家哭，总比让一个路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好吧？

富弼听罢此言，由衷钦佩，不再多言。[注]

世事难料，范仲淹恐怕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会是自己在岳阳楼上“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肖邦也弹不出范仲淹的忧伤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千古名句，影响了古往今来的多少读书人，同时也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切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先让我们回味一遍《岳阳楼记》的最后一段：“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好一个“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在忧什么、伤什么、虑什么？让我们抽丝剥茧，看看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问题：范仲淹为何会写《岳阳楼记》？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后来谪守邓州。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使范仲淹远离了中央朝廷，也就是“处江湖之远”，既无法为国家尽匡扶之志，也无法为人民尽康济之心，虽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却难免心情沉重、郁郁寡欢。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谪守岳州的挚友滕子京派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书信，请范仲淹为刚刚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随信附呈《洞庭晚秋图》，以及唐宋名人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歌赋等。注

也就是说，范仲淹是应挚友滕子京的请求写《岳阳楼记》的。

第二个问题：滕子京何许人也？跟范仲淹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故事？

看到老朋友滕子京的来信，范仲淹陷入了回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宋军在西北遭遇定川砦大败，范仲淹派军驰援泾州。当时的泾州知府滕子京，出色地动员泾州军民为宋军提供军需物资，为泾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大功。

第二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师任参知政事，推荐滕子京知庆州。没想到，不久就有人告发滕子京在泾州一役中滥用公用钱，甚至怀疑滕子京贪污公款。范仲淹很清楚，滕子京的公用钱，主要用于战争之后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的酒宴，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朝廷允许和鼓励的。除此之外，滕子京还用这部分钱馈赠给了一些试图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的游侠、游士，当时他们也是宋军西北前线的得力助手。

宋仁宗听说滕子京滥用公款，还有贪污嫌疑，就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又派太常博士燕度审理此案。经查，滕子京并没有贪污公款。宋仁宗了解真相之后，就没继续追查。

然而，抹黑滕子京只是为了“隔山打牛”，要打的正是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所以，以王拱辰为首的一批人岂会善罢甘休，竟然以罢朝威胁宋仁宗处理滕子京。宋仁宗不堪忍受臣僚之间无休止的争闹，为了息事宁人，就将滕子京免去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将其贬到岳州（今湖南岳阳）这个又穷又小的地方任郡守。这就是《岳阳楼记》开篇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注]

第三个问题：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目的是什么？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仅仅是记述岳阳楼的风物而已吗？显然不是，而是寄托了诸多情感、暗喻在文中。

在邓州漫长的日日夜夜，范仲淹认真思索了自己的从政经历，特别是认真梳理了庆历新政的前前后后，失望、怀疑、矛盾、悲愤……各种情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他的心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迫切需要一种寄托和宣泄。

接到滕子京的来信后，范仲淹惊喜于自己无意中获得了一个释放心中悲郁与诉求的契机，数十米岳阳楼可任由他挥洒，八百里洞庭湖可任由他遨游，还不会授人以柄。于是，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和坎坷，才会有《岳阳楼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才会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才会有《岳阳楼记》中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邦国兴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随，使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就像洞庭湖底的暗流，时时涌动，使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超越时代的强音！(注)

因此可以说，范仲淹忧的是滕子京的横遭牵连，伤的是自己宦海沉浮，虑的是改革前途渺茫，但归根结底还是改革。可以说，没有“庆历新政”，就不可能有荡气回肠、千古传唱的《岳阳楼记》。

如果要问，范仲淹为何能用短短三百余字，就写出了如此感人肺腑的“上忧邦国、下忧黎民”的华章？那是因为，“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范仲淹的忧伤”！

问题来了：范仲淹为何会被罢免参知政事、贬守僻乡？

被“朋党”帽子压垮的改革派

要问范仲淹为何会被罢免参知政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被戴上了“朋党”的帽子。而说起这顶“朋党”帽子，多多少少还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自个接过来戴上”的。

此话怎讲？谁都知道，作为臣子，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歇菜了。为何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还要自个接过来戴上？岂非咄咄怪事？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有个老臣叫夏竦，不仅政治主张上反对改革，而且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公仇私恨相叠加，对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痛恨至极。夏竦精于书法，还培养身边一个丫鬟也迷上了此道。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夏竦安排这个丫鬟模仿练习大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力挺改革。有一天，夏竦获得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心生一计，让丫鬟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这封信，篡改的内容暗含要发动政变把宋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给宋仁宗，宋仁宗看了这封信，虽然不太相信，可内心还是犯起了嘀咕。(注)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夏竦趁热打铁，和反对改革的官员一起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全力煽风点火。不仅如此，他还串通太监，在宋仁宗面前反复捕风捉影，耸人听闻地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一时间，朋党的流言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压力山大”。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宋仁宗对范仲淹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欧阳修却书生意气地写了一篇政论《朋党论》呈交宋仁宗，并在官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但分为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和君

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还提出，作为皇帝，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注

不多久，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故意试探：“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鉴于欧阳修的《朋党论》已经满朝传阅，没有退路的范仲淹只能继续力挺欧阳修，于是回答说：“臣在边关作战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注

这就等于向宋仁宗宣布，改革派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宋朝皇帝的家法和宋仁宗的底线进行挑战。宋朝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臣之间结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注

《朋党论》，观点创新雄辩有力，虽讲得通道理，却消不了皇帝的疑虑。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改革，对于庆历新政，等于是自寻死路。

果然，《朋党论》一出，反对改革的势力弹冠相庆（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朋党论》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本来对是否废止改革还在犹豫不决的宋仁宗，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这其实就是要搁置改革的前奏和序曲。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一过完春节，宋仁宗就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欧阳修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安徽滁州。不仅如此，还罢免了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

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改革的大名士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注)

真是书生意气害死人，不作就不会死呀！

要知道，戒除朋党是宋朝皇帝退无可退的底线！

也昭示，改革者要是缺乏“底线思维”是多么可怕！

问题又来了：保守派为何如此没节操地攻击改革派，连下三烂招数（篡改私人信件）都用上了？

改革动了士大夫最大的“奶酪”

范仲淹等改革派为何如此遭保守派的忌恨？

原因不复杂，因为范仲淹领衔的改革也就是庆历新政动了保守派的“奶酪”，而且是最大的那块。

动这块最大的“奶酪”的，是庆历新政中最主要的改革——吏治改革。范仲淹给宋仁宗的“条陈十事”中，前五事都是有关吏治改革的，这五事可归类为官员的选拔、升降、待遇三个方面。

官员的选拔方面。

一是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亲属荫补入仕的官阶与资格，即“抑侥幸”。宋代恩荫比唐后期还要泛滥，不但名目繁多，有圣节荫补、大礼（郊祀、明堂）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死事荫补等，而且恩荫补官的人数众多。据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不少于500人。而据统计，宋朝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约360人

（远远多于其他朝代），恩荫补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而且，恩荫补官者的素质大多数都极差。

二是改革科举制度，改变科举中存在的各种弊端，选拔能真正经世致用的官员，即“精贡举”。各州府军监皆立学，应举人必须在官学听读一定时日（州府学为三百日，太学为五百日），才能参加解试，以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科举、而不重视学校教育的局面；在考试内容方面，进士科先试策论，后试诗赋，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诗赋、不重视策论的局面；在考试方法方面，把只要求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学以致用。[注]

官员的升迁方面。

一是“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宋朝“恩养士大夫”，官员只要没捅过大篓子，资历到了就会按部就班的升迁，并不以政绩好坏为最重要标准，相当于官场“吃大锅饭”，所以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愿意作为。庆历新政对此进行了改革，文官三年一次按资历升迁的政策被废止了，提拔官员主要看以往的政绩，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而政绩差的、不称职的就遭到了淘汰。

二是“择长官”，即慎选地方长官。在宋朝，各路、州的长官是由中书省、枢密院选拔的，而各县的长官则是由各路、州长官选拔的，一级一级往下任命。宋仁宗时，州县两级官员中不称职的占了很大比例，影响了政府运行效能。于是，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到地方巡视检查政绩，干得好的进行奖励擢升，干得不好的予以罢免，选能干的补上，防止冗滥。

官员的待遇方面。

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予一定数量的职田，即“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多寡不均，有的多出很多，有的根本没有。范仲淹领衔改革，主持朝廷均衡官员的职田，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进行补发，多占的要退还，不足的要补齐，使官员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在此基础上，督责官员廉洁为政，严防贪赃枉法，对那些尸位素餐甚至违法犯罪的官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改革实施短短几个月间，政治便新风扑面：官僚机构开始精简，财政开支明显节约；恩荫受到重重限制，打破了“龙生龙，凤生凤”的怪圈；政绩考核和品德考评成为干部升迁的标准，往常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很难混下去了；科举取士，突出实用议论文，改文风成效明显；全国兴办学校蔚然成风。[注]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然而，任何改革都是利益与权力的重新调整，改革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击。吏治改革，究竟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多大奶酪？让我们管中窥豹一下。

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异乎寻常的多。据不完全统计，宋太祖时期共取士455人，宋太宗时期共取士6 097人，宋真宗时期共取士8 689人，宋仁宗时期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已取士8 235人。也就是说，北宋开国82年已经科举取士23 476人。[注]有学者研究指出，科举取士人数，宋朝是唐朝的5倍，是元朝的30倍，是明朝的4倍，是清朝的3.4倍，简直空前绝后。[注]更夸张的是，宋朝恩荫补官还远远超过科举取士人数，数量有多惊人，奶酪有多大，简直难以想象。

庆历新政，最重头的就是吏治改革，特别是裁汰冗官、限制恩荫、严格科举，可以说动了士大夫集团最大的奶酪，改革的压力和阻力之大，仅仅管中窥豹，就能可想而知。

听政的太后扳不倒地方的贪官

既然压力和阻力如此之大，范仲淹为何还要进行吏治改革呢？

原因不复杂。实在是因为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下，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其中，吏治腐败、行政低效是最严重的问题。

吏治腐败、行政低效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听政的太后扳不倒地方的贪官”事件中以点见面体味一番。

宋仁宗登基时年仅13岁，亲政前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掌控朝中大权。一天，刘太后问宰相王曾、吕夷简：“福州陈绛赃污狼藉，你们听说了吗？”宰相王曾回答：“听说了。”刘太后责问：“既已听闻，为何不查处他？”王曾回答：“地方上出了事，须本路监察官员举报，或者由御史和谏官提出意见，中书省才能处理。”这个回答，放到今天，就相当于说，地市官员贪赃枉法，只能由省里出面处理，中央不方便干涉。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宋朝的官场就这潜规则。刘太后不管他这一套，当即下旨：“速派有魄力、会办事的官员任福建路转运使，查办福州陈绛的贪赃一案。”

两位宰相奉旨而退，回到中书省，便任命侍御史王耿为福建路转运使。（转运使是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财赋及官员的举荐、察访。）

王耿担任转运使后的第二天，便前往福建上任。在上任途中，遇见一名福建路的军官拜于马首，说：“我是押送进贡荔枝进京的。”王耿向他询问福建路的交通、地理、气候等相关情况，军官都一一做了详细回答。

王耿逐渐对他有了好感，又向他秘密调查陈绛在福州的所作所为。军官哭着回答：“福州的百姓被陈绛害苦了，原以为永远见不到天日了，想不到蒙‘端公’（侍御史别称）垂问。”接着，他一口气检举了陈绛十几件事，都是骇人听闻的严重违法之事。王耿大喜，遂留此军官在转运使衙门。

这名军官留在转运使衙门期间，时常去跟王耿的儿子套近乎、结交情，还送了些只有朝廷才能用的玳瑁器皿。不久，福建路转运使王耿便将这位军官所讲的事向朝廷揭发。陈绛被押送京城，作为“钦犯”关进大牢。但审问后发现，王耿向朝廷揭发陈绛的十几件事竟然无一属实。

原来，那名军官是陈绛安插的卧底，故意编造那些事，以误导王耿。那名军官还向朝廷自首，坦白经常馈送臣子禁用的器皿给王耿儿子的事。这事汇报到刘太后那里，刘太后大怒，将王耿打入监狱，后又贬官淮南。㊟

陈绛不动声色，略施小计，没有跟王耿正面接触，就将这位钦差大臣拉下马来，反败为胜，怪不得宰相们一开始都不愿轻易动他。

福州陈绛一案，是由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下旨，由中书省两位宰相从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选派官员前往查处的，竟然扳不倒一名级别不高的地方官员。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表面上，问题在于：刘太后有决心，但不谙官场那一套；宰相王曾、吕夷简熟悉官场情况，但没有反贪决心；王耿有反贪决心，而无反贪智慧。

实质上，问题在于：钦差大臣被扳倒，因为自己也不干净，说明吏治普遍腐败；陈绛能事先安插卧底，必有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说

明是集体腐败；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拿一个地方贪官束手无策，说明“政令不出皇官城”。

试想：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连一个级别不高的地方贪官都惩治不了，这套行政体制的无能，究竟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地步?!

问题又来了：事情何以至此？

宋朝“三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朝行政体制的运行效率，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怎样发生的？事情何以至此？

“三冗”是罪魁祸首，即冗官、冗兵、冗费。

先看冗官。

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官数冗繁，绝对是历朝之冠。据史载统计，每10万人口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汉朝为13人，晋朝为42人，隋朝为27人，唐朝为35人，元朝为37人，宋朝则超过50人，是历代各朝中最多的。注

宋朝官数冗多，并不是管理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是“恩养士大夫”政策结出的恶果。除了正式设立的正官之外，政府还随时扩大内外官员（非正式官员）的数目。当时，不仅皇族宗室中目不识丁的幼官、襁褓之官不计其数，无事可干的闲官和正官之外等待补缺的冗员也多得惊人。到宋仁宗时，官吏冗员已是三员守一缺，约计一万余人。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稳，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

衰败。接替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是谁都不知道。[注]真是骇人听闻、尽毁三观！

由于机构林立，官多吏繁，政令互出，互相扯皮，办事效率十分低下。如州郡一级，知州与通判（副官）常相互争权，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公告文书没有知州和通判的共同签署，就不能生效施行，遇事往往议而不决，甚至决而难行，只有公文旅行塞责天下。

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年老官高者以资格标榜，年轻资历浅者因难以提升而怨声载道，结果朝野上下因循苟且，敷衍了事。比如，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北宋军队在好水川被西夏战败，6000余将士战死沙场。此事应通过急奏上报朝廷，但因大臣办事拖拖拉拉，过了十多天，皇帝还看不到奏章，急得宋仁宗捶胸顿足。[注]

再看冗兵。

公元1007年冬12月，殿前司军官高鸾陷入了深深的苦恼——自己明明是立了大功，却被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撤职查办。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月的一天，也不知怎的，汴梁城南的草料场突然失火。万分紧急之下，管辖草料场的步军司命令驻扎得最近的殿前司军官高鸾组织灭火。高鸾带领全体官兵奋力扑救，扑灭了大火，挽回了巨额损失。高鸾正等着领功受赏，不料等来的却是殿前司主官的一顿严厉斥责，责备高鸾擅自接受命令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因为他不归步军司统属。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是因为宋朝实行的特色军事政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宋太祖赵匡胤就是通过此招解除了开国功臣们的军权。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接着，宋太祖又在军队中设立监军，将领兵权和调兵权剥离，定期换防轮调，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而且为了让军方无法对抗皇室，故意安排才学资历浅者担任一些要职。

一方面，由于宋朝一直面临北方民族南侵的威胁，所以一直实行“养兵”之策。每逢荒年，朝廷便趁机将大批饥民招募为兵，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宋朝建立时，全国的军队不过22万人的规模，但到宋仁宗时已经超过125万人。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军官与士兵之间关系疏离，军官缺乏凝聚力，士兵缺乏团结力，整个军队缺乏战斗力。所以，宋朝的兵士虽多，但不精锐，在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对外战争中从未占到便宜，割地、赔款是家常便饭。[注]

再看冗费。

庞大的官僚机构，臃肿的军事机构，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出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局面。领取了薪水而又无事可干的闲散官员和军队官兵比比皆是。为了安抚军队笼络军心，朝廷在经济上给予军人优厚待遇。普通士兵的待遇就很可观，每月都有津贴，戍边还有特赏，行军有添点，隔三岔五地还有各种各样的补助和福利。军官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普通士兵拥有的这些之外，还有茶叶钱、酒钱、厨料钱、炭钱、盐钱、草料钱等等，就连随从、仆人的相关费用也都由政府埋单。因此，军费成为沉重负担，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近80%。[注]

军费和官俸，仅此两项就把帝国的财政掏空了。公元1042年以后，朝廷几乎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亏空额从最初的300万贯增加到公元1065年的1 570万贯，20年间增加了5倍。此外，还有每年都要向西夏和辽国“进贡”的“赔款”，还有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宫廷寺观等，使得本来就很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形成了“冗费”。[注]

冗官、冗兵、冗费，宋朝“三冗”问题之严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把宋朝的吏治和行政拖入了腐败和低效的深渊。

官商勾肩搭背洞开“政商旋转门”

“三冗”，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大宋帝国的背上，让大宋帝国步履蹒跚。但还有一个大帮凶不得不说，这就是官商“勾肩搭背”开启的“政商旋转门”。

先秦以来，官商勾结的现象绵延不绝，然而官商“勾肩搭背”泛滥成灾之普遍，影响之大，则首推宋朝。当时，上至皇亲国戚、朝廷大员，下至地方官吏、举人士子，整个官僚阶层几乎无人不涉足经商营利。

从《水浒传》中“快活林”的故事，就可以一窥官商在宋朝社会的无孔不入。

关于快活林，《水浒传》是这样描述的：“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作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显然，快活林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综合市场，经济辐射已达两省，所讲的“百十处大客店”是从事商业批发、贸易和物流业的，所讲的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是从事博彩业、金融服务业的，另外还有“妓女”补充加盟，一片繁荣“娼”盛的景象。

快活林最早的法人代表人叫施恩，是个官二代，他爹是管营，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这个家族企业，垄断了快活林的酒肉供应渠道，强买强卖给其他客商，企业的员工，则是利用犯人，用工成本极低。

后来，一个叫蒋门神的人强行收购了快活林。施恩不甘心，“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由此可见，蒋门神也只是一位给别人打工的职业经理人，他背后的真正投资人是张团练，团练是负责一方或一州的军事长官，比管营的官要大。

毫无疑问，快活林里的商家们，活得一定不快活。但谁也不敢抱怨这里酒的价钱太贵、肉的质量太次，尽管这里是市场，但没有市场机制，这里是官场的延伸，讲究权力大小。

再后来，武松出现了，搅动了利益格局。但武松醉打蒋门神，本质上是替一个官商去打另一个官商，实质上属于“黑吃黑”，天下官商一般黑。

快活林的可视版，就是《清明上河图》。在《清明上河图》中，处处可以找到“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的影子。《清明上河图》是临摹写实画法，比《水浒传》更能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注

要是你觉得文艺作品不足采信，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书的记载。史书的记载，印证了《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中“快活林”的无处不在，官商的无孔不入。

史载，宋朝时四川应举士子因为一路贩卖货物，“留滞关津”，导致不能按时抵京参加科举考试，朝廷竟然为此延期开考，此事可谓空前绝后，官僚阶层的营商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官商“勾肩搭背”无处不在，“政商旋转门”危害十分巨大。

首先，官吏营商与国争利，吞噬大量国家资源。官吏营商获取的暴利，大部分来自于对国家财富的掠夺，所用手段一是凭借权力偷税、逃税、漏税，二是直接利用权力挪用国库银两、国家物资作为营商资本，做无本万利的买卖。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真定知府边肃，就曾用国库钱做生意牟利。官吏营商，必然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造成国库亏空甚至财政危机。

其次，官吏营商与民争利，破坏社会经济发展正常秩序。宋代官吏以“权力”为后盾，从事的营商牟利活动，必然对正常商品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和破坏。不法官吏无论开邸店、放高利贷还是贩运物资，都与生产领域没有直接联系，主要在流通领域靠侵占、欺诈、强买强卖等各种手段贱买贵卖、攫取暴利，从而破坏了整个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与秩序。

再次，官吏营商加剧吏治腐败，戕害社会风气。官吏营商成本低、致富快，于是社会上下都想尽办法跻身官场，这也是官员数量暴涨、冗官倍增的一大诱因。一方面，官吏忙于营商，必然疏于政务，且往往歪曲政令为己所用，损害政府形象，妨碍行政效能。另一方面，官吏营商往往贪赃枉法，以权谋私。闲官候缺时，收入不足，便预先支借。正式上任后，不外乎两种途径“还债脱贫”，要么贪赃枉法，要么以权营商。而且，营商官吏为防被追究责任，往往互相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注

内忧外患下“出笼”庆历新政

冗官、冗兵、冗费，官商“勾肩搭背”，“政商旋转门”转个不停，两者配伍生下的“怪胎”就是外强中干的大宋帝国——表面上看富庶强盛，实际上不堪一击。

表面上看，11世纪的大宋帝国堪称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富强之邦。

国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东亚大陆气候最宜人、物产最丰饶的国家；人口超过1亿，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素质最高的人口；超过7亿亩的农田，每年可以生产超过6 000万吨的粮食和3 000万束草料，“苏湖熟，天下足”，每年的粮食等物资都有可观的富余；

每年茶叶的产量超过2.5万吨，绢帛产量超过1 000万匹，这些商品被源源不断地卖往世界各地，也为帝国带来了可观的财富；钢铁产量超过15万吨，这在当时的世界属于天文数字，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钢铁产量也只有13.2万吨；建造业也很发达，排水量超400吨的远洋帆船、高120米的塔、长达1 200米的大桥都已经在宋朝成为现实；国家财政也很可观，11世纪中期，大宋朝的年财政收入突破4 000万两白银（根据可比价格换算），而清朝最多时也只有4 858万两白银。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疆域和人口均只有清朝的四分之一左右。

矛盾的是，宋朝又是历史上少有的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朝代！在对外战争中，几乎从未捞到过好处，结局不是割地就是赔款。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宋辽缔结条约规定：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史称“澶渊之盟”。[注]后来到了宋仁宗时期，辽国又提出增加岁币，在“澶渊之盟”约定的基础上，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史称“重熙增币”。值得说明的是，在“重熙增币”中，宋朝是向辽国“纳”岁币，即岁币是宋方上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对这种充满侮辱性的要求，宋仁宗也委曲求全答应了。

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朝与西夏达成和约。和约规定：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 000两、绢23 000匹、茶1万斤。

不仅外患深重，内忧也不轻松。宋仁宗亲政后，小规模农民起义和小股兵变相继爆发，而且“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激烈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朝朝廷。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宋仁宗“遂欲更天

下弊事”，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实行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庆历新政，除了上文讲到过的吏治改革，还有以下几点：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要着眼长远着眼根本，把促进农业生产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切实落实奖励农耕、扶助农桑、兴修水利等政策。

减徭役，即减少农民的徭役负担。要求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以减少公家的徭役需求；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多个户口稀少的县邑合并为一个，以减少冗员，减轻百姓供养负担。另外，还有一些杂役，政府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如派州县闲散的士兵，就尽量不折腾农民，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命令。宋朝有一个弊端，就是“文山”，朝廷今天下发一个文件，明天下发一个文件，地方再用文件落实文件，结果文件成山，但政策却没有落实。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前必须反复论证，审定成熟后再颁发；而颁发后就不得再更改，而且要严格贯彻落实，否则予以严惩。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以往朝廷的有些惠民政策被地方截留，“中梗阻”严重，“最后一公里”不畅，让惠民政策落空。范仲淹提出，要派遣巡察使巡视各地，监督检查各种惠民政策是否贯彻落实到位，杜绝阻隔皇恩的现象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得到推行的改革措施，即修武备、整治军备。针对军费开支过大，范仲淹主张部分恢复府兵制，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让他们农忙时务农（每年三个季度），农闲时练兵（每年一个季度），寓兵于农，既可以节省给养之费，又可以充作京畿卫士，辅助正规军。这项改革措施，宋仁宗没有应允，也就没有推行。注

耳根子软的宋仁宗缺主心骨

内忧外患下出笼的庆历新政，为何仅仅过了两年就夭折了呢？

这得从宋仁宗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起。毕竟，改革能否持续、彻底地推行，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和决心。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具体事例看看宋仁宗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件事：宋仁宗吃到沙子却不声张。

宋仁宗有一次用膳，吃着吃着，突然嘎嘣一声吃到了一粒沙子，他赶紧吐出来。在旁边伺候的宫女吓坏了，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宋仁宗连忙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面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牙痛和难受，而是他人因此而可能遭遇的惩罚，确实是个"心地仁慈的人"，这么评价宋仁宗应该算中肯。

第二件事：宋仁宗忍着口渴回宫喝水。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地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宋仁宗回宫后，急忙对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就问宋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不但有人要被处罚，以后还会将准备水壶增为惯例。朕今天口渴只是偶然，实在没有必要将准备水壶变成惯例，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注]这件事说明，宋仁宗是个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

第三件事：宋仁宗爱批条子败坏规矩。

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九月，宰相杜衍向宋仁宗提议，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理由是武将兼任地方职务，是早先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是为了解决战争年代武将待遇较低的问题，二是出于边防事权统一的需要。如今是和平年代，武将兼任地方职务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现在能够兼任地方职务的武将，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纨绔子弟，而那些没有背景和门路的人，则享受不到这种优惠待遇，因此是不公平的。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也为了做到一视同仁，所以要免除武将所兼任的地方职务。宋仁宗完全同意杜衍的意见，当即指示：把这一建议作为正式规定下发执行，并通告全国。

然而，这一政令刚刚颁布三天，就被宋仁宗自己给破坏了。这天，一位担任重要军职并与宋仁宗关系极为亲近的外戚来到宫中，缠住宋仁宗，硬要宋仁宗答应让自己兼任某一地方的行政职务。宋仁宗拗不过面子，就点头同意了。很快，一张由宋仁宗亲笔书写的关于“任命某某某为防御使、四厢都虞侯、知南京”的“内批”就送到了宰相杜衍的面前。

看到这张“内批”条子，杜衍哭笑不得。第二天，杜衍把“内批”当面送还给了宋仁宗，并说：“皇上刚刚下旨，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现在怎么又从宫中批了这么一张条子下来？”宋仁宗感到很难为情，他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事情确实出于无可奈何。”一边又用讨好的口气对杜衍说：“爱卿就看在朕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勉强办理这一次吧。”[注]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宋仁宗是个耳根子软的主，容易动摇，难过人情关。

仁慈心软、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耳根子软、容易动摇、难过人情关……归结起来就是：缺主心骨，缺乏推行改革的战略定力、坚定决心、慷慨勇气。这些，正是施行改革的大忌。

因此，明朝大学问家王夫之评价宋仁宗“无定志”：亲政的30年中，两府大臣换了40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宰辅只要被人攻击就被撤换，大臣们相互指责就都予罢免，就算贤臣在位，也无法施展才干做出成绩。人事更替频繁，政策变动无序，朝令夕改，反反复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百官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注]

中国历史上的成功改革，无不由于国君与其所信任的主事大臣在思想上高度认同和信任，在政治目标上高度一致，在行政过程的配合上高度契合，既能够对所从事改革的意义和价值高度明确，又能在操作过程中坚定不移、百折不挠。而这些要素在庆历新政中却不存在。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有一定的好感和信任基础，但这种好感和信任的基础较为脆弱，危难之际不免相互倚重，但最终由敬而畏、貌合神离。[注]

其实，庆历新政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半途而废的伏笔。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领衔改革，只给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而没有任命他为宰相，说明宋仁宗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扭扭捏捏地“犹抱琵琶半遮面”。

庆历新政对王安石变法投石问路

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仅仅历经两年便半途夭折了，但并非无关紧要，其意义还是很重大的，特别是对20多年后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拖着臃肿疲态的身体前行，积贫积弱的局面更加深重，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更加严重，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宋神宗即位（公元1067年）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仍是一派繁荣，内部的深刻矛盾和问题更加刺痛着统治者。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

批农民丧失土地，加上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宋朝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唯存空簿”。因此，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于是，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随后又任命为宰相，主持旨在改变北宋建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自熙宁二年（公园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

先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是地主盘剥农民最厉害的时候，青苗法就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由政府给农民提供低息的贷粮、贷款，本利在夏秋随两税归还。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贷款负担，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募役法。以前，差役是按户轮流来的，农民要是在农忙时碰上服差役就惨了——地没人种，而且交钱雇人去也不行。募役法就是把差役改为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不管是官僚地主也好，或者普通人家也罢，只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就可免除差役，所以又被称为免役钱。募役法让农民从各种差役中解脱出来，专事农业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增加了政府收入。

方田均税法。当时土地问题突出：一是大量的耕地被隐瞒，国家流失大量税收；二是耕地的质量好坏差别很大，高产和低产相差甚至可达十倍，但缴的税却是一样的。方田均税法，一方面清丈全国耕地，查出了大量被隐瞒的耕地，政府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核实耕地及其所属，并将耕地按土质好坏分为五等，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田赋，有利于均衡农民负担。

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大多荒废，为了鼓励兴修水利，出台了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法鼓励当地住户按贫富差别等级高下出资，也鼓励州县政府积极贷款支持农田水利工程，以保障农田灌溉，促进农业生产，夯实经济基础，稳定政府收入。

市易法。以往，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导致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人心思稳，于是政府在重要都市设置“市易务”机构。该机构在货物滞销时进行收购储备，在供不应求时进行抛售，对市场物价进行对冲，以保持物价的稳定和保证商品的供应。

均输法。为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政府设立“发运使”一职，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按照全国主要商品生产区的分布情况和政府的实际需要，统一收购、统筹运输、合理调度，让商品少跑冤枉路，从而降低国家物流支出，也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

另外，还有军事方面的保甲法、裁兵法，教育方面的改革科举、整顿太学等改革措施。注

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六项举措；二是军事方面的改革，其措施有保甲法、裁兵法等；三是教育改革，主要措施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学校等。其中，财政经济改革是核心和重点。

跟庆历新政比，发现了什么显著差异吗？

没错，王安石变法几乎不涉及吏治改革。

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十项改革措施中有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的五项是吏治改革措施，另外还有重命令、推恩信等两项跟吏治改革也密切相关。结果，吏治改革动了士大夫最大的“奶酪”，遭遇强烈抵制，整个改革半途夭折。王安石变法吸取了庆历新政的教训，避开士大夫最大的“奶酪”，“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以减小改革的阻力。在改革内容上，庆历新政实质上是王安石变法的投石问路。

事实确实如此。王安石变法并不直接损害官僚贵族的政治利益，所以遇到的阻力较庆历新政明显小一些。变法的中心内容，实际上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财产分配，将大地主及贵族隐瞒的土地清查出来，以收取赋税的形式将其部分收入收归国家。应该说王安石变法的策略是正确的，在封建社会政体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而先进行经济改革相对来说阻力就小一些。注但也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回避了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让改革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况且，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难以真正长久成功。

另外，在君臣关系方面，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是比较坚定的，宋神宗对改革也是矢志不渝的，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改革。这也可算庆历新政对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投石问路。

小 结

守成之贤主，改革之懦夫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驾崩了。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就挤满了人，

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庞大的人群哭作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宋传到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注

从平民到敌人，都为之悲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也很好地注解了他的庙号“仁宗”二字。仁政，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

自称“十全老人”的清朝乾隆皇帝弘历，自视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承认，有三个帝王，却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大帝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个就是宋仁宗赵祯。注

由此可见，在封建时代，宋仁宗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明君了，因此被历史学家们誉为“守成贤主”。

但是，从推行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位“守成之贤主”，却乏善可陈。

要知道，改革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奶酪，不可能皆大欢喜。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越会遇见阻力、碰到困难；越是压力重重、挑战不断，越是要求改革者下得了决心、鼓得起勇气。在协调不同利益诉求、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中，改革者必须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试问：如果遇到风险就退缩、碰见难题就回避，还谈什么啃硬骨头涉险滩？如果符合局部利益就一哄而上、有损个人利益就挑三拣四，又怎能将改革向纵深推进？注

显然，宋仁宗不是一个合格的改革者，他“无定志”，缺主心骨，不仅仁慈心善耳根子软，而且清静无为怕麻烦，在“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心态下，不可能下得定决心、鼓得起勇气、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

一句话，宋仁宗是“守成之贤主”，也是“改革之懦夫”。

1. 潘春华：《范仲淹选官》，载《人力资源开发》203年第8期第05页。
2. 晏建怀：《〈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载《书屋》2008年第期。
3. 吴铮强：《范仲淹的忧虑（下）》，载《国学》2009年第0期。
4. 晏建怀：《〈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载《书屋》2008年第期。
5. 马立诚：《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载《领导文萃》2007年第7期。
6. 陈良：《庆历新政何以失败》，载《学习时报》204年3月7日。
7. 马立诚：《庆历新政是怎样失败的》，载《领导文萃》20年2月下半月刊。
8. 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载《博览群书》200年第0期。
9. 陈良：《庆历新政何以失败——兼谈北宋“朋党之争”》，在《学习月刊》204年第7期。
10. 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载《博览群书》200年第0期。
11. 齐夫：《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载《学习月刊》202年第4期上半月刊。
12. 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载《博览群书》200年第0期。
13. 马立诚：《庆历新政是怎样失败的》，载《领导文萃》20年2月下半月刊。
14. 王春南：《皇帝反贪为何输多赢少——强人反贪困局》，载《人民论坛》202年5月下半月刊。
15. 刘笃才、杨一凡：《论北宋的冗官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83年第5期。
16. 马立诚：《庆历新政是怎样失败的》，载《领导文萃》20年2月下半月刊。
17. 刘笃才、杨一凡：《论北宋的冗官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83年第5期。
18. 马玉臣、杨高凡：《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9. 林哲敏：《诌议宋朝的“三冗”问题》，载《科教文汇》2009年0月中旬刊。

20. 景北记：《北宋的致仕制度和冗官冗费》，载《求是学刊》984年第4期。

21. 周兴福：《〈水浒传〉经济思想简论》，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

22. 郎国华：《祸患无穷的宋代官吏营商》，载《领导之友》2006年第4期。

23. 王安石：《临川集·卷八十七·马正惠公知节神道碑》。

24. 陈启文：《北宋的一只乌鸦》，载《芙蓉》204年第4期。

25. 刘澍：《有菩萨心肠的宋仁宗》，载《文史博览》202年第7期。

26. 眭达明：《好“批条子”的宋仁宗》，载《决策》200年第7期。

27. 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十二》：“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28. 郑志强：《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年第6期。

29. 综合[1]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980年第3期；[2]葛金芳、金强：《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0期。

30. 综合[1]]熊光慈：《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0期；[2]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期；[3]米礼宾：《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范仲淹、王安石所面对的不同改革阻力及其影响》，载《文史博览（理论）》20年第6期；[4] 王瑞平：《试论北宋中期的社会改革及其历史启示》，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31. 颐祯：《偶像皇帝宋仁宗》，载《环球人物》2007年8月下半月刊。

32. 刘建武：《让乾隆皇帝佩服的宋仁宗》，载《文史天地》202年第3期。

33. 人民日报报评论员：《动真碰硬，顶得住压力》，载《人民日报》204年6月日。

第九章

明孝宗改革：抢在革命之前搞改良



历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你跑与不跑，时间就在那里，不紧不慢。明孝宗算是一名好选手，在他的这一棒中，他带领改革跑在了革命前面。

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的一天，明宪宗朱见深百无聊赖，召太监张敏给他梳理头发。对镜自照，发现头上已有不少白发，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来，于是长叹道：“朕老了，却还没有子嗣！”

张敏马上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道：“请万岁爷恕奴才死罪，奴才直言相告，万岁已有皇子，江山后继有人了！”

明宪宗大吃一惊，忙问道：“此话怎讲？朕怎么完全不知道？”

张敏又叩首道：“奴才一说出口，恐怕皇子和奴才都性命难保。万岁爷可千万替皇子做主，奴才虽死无憾！”

站在一旁的司礼掌印太监（明朝太监中的一号人物，大内总管，被称为内相）怀恩也跪下说道：“张敏所言皆是实情。皇子被养育在西内（皇宫西苑）密室，现已6岁了。因怕招惹祸患，故隐匿不敢报。”

明宪宗又惊又喜，立即派张敏去领皇子前来见面。

这个皇子哪来的呢？

原来，6年前的一天，明宪宗偶尔来到内府库藏，询问内府库藏有多少金银钱钞，管理内府库藏的纪氏口齿伶俐对答如流，使龙心大悦。明宪宗见她生得明眸皓齿、妩媚动人，便在纪氏住处临幸了她。过月，纪氏便有了身孕。

宠冠后宫的万贵妃知道这事后，命一宫女为纪氏堕胎。该宫女不忍皇帝子嗣又遭残害，回去禀报说，纪氏不过是生了鼓胀病。万贵妃仍不放心，将纪氏贬居冷宫。

几个月过去了，纪氏生下一个男孩。万贵妃得知后，又派太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张敏冒着杀头的危险，把皇子偷偷藏入密室，取些米汤、米粉之类的食物喂养。

由于张敏行事小心，一次次躲过了万贵妃的搜查。不久，废皇后吴氏知道了这件事，便把皇子接到自己居住的宫内，悉心照料，就这样，皇子安然活了下来。

……

话说不多时，张敏就带着皇子来了。明宪宗把孩子抱入怀中，放置膝上，仔细端详后说："这孩子长得真像我，确是我的儿子！"接着看到头顶因营养缺乏而生的斑秃，悲喜交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坎坷异常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明朝难得一遇的皇帝——明孝宗，他抢在革命前面推行改良，挽救明朝于危亡之际。即使在清朝编纂的多贬低明朝皇帝的《明史》中，明孝宗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独能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注]

终止"只知有厂卫，不知有朝廷"

明孝宗的父亲明宪宗时期，监察御史徐镛悲叹："今天下之人，只知有厂卫，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厂卫，

指的是东厂、西厂、锦衣卫；汪直，则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兼西厂提督。

可见，宦官干政之祸患，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多么严重。

其实，明宪宗之前只有东厂和锦衣卫，并没有西厂。明宪宗为了网络一帮人为自己刺探消息，专门设立了西厂，明宪宗身边的太监汪直是负责人。汪直为了升官发财，铁了心要“一将功成万骨枯”，拼命构置大案、要案，一旦怀疑某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宦之家，甚至朝廷命官，不经皇帝同意，立刻进行逮捕，直接严刑逼供，并力求把案件“闹大”，尽可能牵连更多的人。西厂办案速度之快、数量之多、用刑之酷、牵连之众，让一向以严酷闻名的东厂和锦衣卫也望尘莫及，小巫见大巫。想想看，连首辅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朝廷重臣，西厂都毫无顾忌，朝野上下，谁能不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呢？

其实，明朝初年，宦官干政是被严格禁止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初，鉴于历朝宦官之害，制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十一个大字，放在大内门口。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有一名太监指出公文中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可见，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问题，保持了非常高的警惕，防患于未然。他执政时期，没有发生宦官干政的事件。

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后，特别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明成祖朱棣为何一改朱元璋的政令，开始偏爱宦官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当燕王时，曾向南京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行贿，刺探建文帝以及身边大臣的言论行踪。他后来能当上皇帝，与宦官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分不开。因此，对这些宦官，他有一种政治上的认同

感。第二，由于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对外廷大臣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将军们十分不信任，于是委派宦官到各地监军，各地总兵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监军向他密报。㊟

朱元璋时期，由于对宦官警惕压制，宦官的数量很少。史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皇宫的宦官只有60多人。但从明成祖永乐一朝开始，宦官数额就开始大幅增加，到明宪宗时更是急剧膨胀，宦官的总数超过万人。

与庞大的宦官数目相对应的，是宦官机构的不断增设与扩充。明宪宗时，内廷中宦官机构已有了18个监局，各监局的负责人称为掌印，级别五品。领衔18个监局的，称为司礼监，司礼监的负责人即司礼掌印太监，属大内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称为内相。掌印太监之外，还有秉笔太监、提督太监、随堂太监等，共称十二监。

当时，明朝皇帝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将国家决策分为“票拟”和“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然后呈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朱笔（红色），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皇帝大都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

正因为宦官干政如此严重，才使宦官权倾天下。史载，有一次，太监汪直受明宪宗派遣，到北方巡边。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汇报，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按礼制，官员只能对皇家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

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曲意逢迎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注

明孝宗执政后，吸取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不仅不许太监代为批红，还对宦官严加管束进行限制。于是，厂卫不敢再张狂肆虐、妄生事端，而是小心谨慎、奉守本职，明孝宗时期的几任厂卫指挥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从而终止了“只知有厂卫，不知有朝廷”的乱象。这是明朝中后期所罕见的景象。

终结“纸糊阁老”和“泥塑尚书”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是明孝宗的父亲明宪宗时期的乱象怪状。

内阁的三位首辅万安、刘珝、刘吉，白吃饭不干活，上不能匡主，下不能益民，被时人讥讽为“纸糊三阁老”；至于下面的六部尚书，吏部尹旻、户部殷谦、兵部张鹏、刑部张蓥、礼部周洪谟、工部刘昭，大多也是每日坐在衙门里喝喝茶聊聊天，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被人们戏谑为“泥塑六尚书”。

怎么个尸位素餐法？请让我们以“纸糊三阁老”之一的万安为例。

万安又被称为“万岁阁老”，这个外号是这么来的：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的一天，疏于朝政的明宪宗因为天上出了彗星，“天变可畏”，所以召见内阁大学士面议政事。当时的内阁，由大学士彭时、商辂和刚入阁不久的万安三人组成。彭时、商辂两人向皇帝提出，京官的俸薪本来并不高，不能再进行削减了，明宪宗同意了。接着，彭时、商辂正准备再面奏第二件事，突发情况来了——万安跪下

来，边叩头边高呼万岁。按明朝礼制，大臣叩头呼“万岁”，表示奏事完毕，准备告退。万安的举动，把彭时、商辂一下子弄懵了，也只得跟着叩头高呼万岁，然后退出。一次好不容易才有的议政会议，被万安这一声故意的“万岁”给搅黄了，从此明宪宗不再召见大臣议政。

这还不算是最离谱的。明孝宗即位不久，在宫里看到一本万安给明宪宗的奏疏，奏疏的内容与国事毫无关系，而是不堪入目的房中术。明孝宗大怒，派太监怀恩向万安问罪：“作为内阁大学士，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这样的事，换成别人早就羞愧万分、辞职谢罪了。可万安却一点羞愧也没有，连辞职的场面话都不说一句。“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这是当时的人对万安的评价。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其他成员，大多也是类似的货色。试想，内阁、六部的长官都是些这样的人，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

明孝宗即位不久，汲取之前的教训，很快就在人事安排上来了一次大“新陈代谢”：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罢官，将祸乱朝政的太监梁芳等下狱，将奸佞小人侍郎李孜省等流放。一时文武百官相庆，朝野上下称快。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这也是他被后世史家所称赞的地方。

在“破旧”的基础上，明孝宗还致力于“立新”。总的来说，明孝宗时期，内阁和六部都能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职能，是明朝少有的政治清明、政通人和的时期。

先看明孝宗时期内阁的构成及其特点。

明孝宗时期，内阁构成有两个特点。一是内阁人数大体维持在三人的数额。在人员变化过程中，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为四人内阁。三人

内阁的结构，在促成内阁成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的关系上起着特殊的稳定作用。二是内阁成员相对稳定和任期较长，不像其他时期内阁成员走马换灯似的变个不停。明孝宗时期，内阁成员的组成和任期都比较稳定，这有利于阁员们治政意识和方略的一贯性，并在较长的时期内收到实效，而不至于朝令夕改，让下属无所适从。三是内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明孝宗时期，担任过内阁成员的，除了刘吉外，徐溥、刘健、丘浚、李东阳、谢迁五人都是品德才能备受推崇的贤臣名相，被称为“大明最强内阁”。特别是在任最长的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刘健为人执着、耿直，李东阳心思缜密，谢迁不激不偏，三人在政事上能共襄赞助，时谚所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颇有唐太宗时“房谋杜断”的景象。

再看明孝宗时期部院公卿格局与其政绩。

纵观明孝宗在位时期，部院长官大约有24人，同明代其他时期相比，这些部院的长官同样表现出人员稳定、任期较长的特点，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史家所称赞的名臣。如吏部尚书王恕，刚正清廉，始终如一，所引荐耿裕、何乔新、彭韶、李敏、周经、倪岳、张悦、戴珊、刘大夏、章懋等，皆一时名臣。王恕尊重那些在野未仕的贤人，尽可能地为朝廷选拔人才，明孝宗时期，朝廷有许多正派官员，各司其职、很有条理，国家能够繁荣昌盛，王恕居功至伟。[注]王恕与兵部尚书马文升、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共称“弘治三君子”，《明史》称赞他们三人：“王恕高风亮节，马文升精通政务，刘大夏可堪大任，三人都有经国之才，又有君子之气，各项工作未雨绸缪，各种忠言悉数进上，为人光明磊落，行事刚正规矩，有古代名臣的气节和担当。他们作为几朝功臣，德高望重，朝野敬佩，名重远方。”[注]

综合来讲，明孝宗时期，人事格局稳重有方。从体制层面看，三人内阁及部、院分司要职的制衡互补格局有利于平衡和稳定局势；从人事情形看，君臣具有共同的治政意识与追求，彼此又以其不同的个

性及为政风尚形成互补协作的局面；当时朝廷要职任用得人，君臣之间、内阁成员及诸卿之间形成较为协调的关系。

由此，明孝宗时期，一改明宪宗成化以来朝臣纷争、朝政混乱的局面，确立了朝政稳定清明的格局。(注)

清理官场的绿色通道“传奉官”

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十七日，也就是明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

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以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而按照明朝的制度，大官的任命是要经过廷推的，小官的任命是要由吏部铨选的。

由于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是个纯技工机构，品级又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所以，姚旺的传升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关注。

但一年多后的一次传升，朝官们就不得不注意了。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八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教、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与姚旺传升不同，李景华、陈教、任杰三人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皇帝近身侍臣，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如由吏部铨选，或者经由朝廷推选，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明规则也好，潜规则也罢，统统都束缚不了明宪宗的手脚。或是为了任人唯亲，或是为了讨万贵妃欢心，或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明宪宗为了确保某些人“上位”，把一切程序都忽略，把一切条件都归零（资格、出身、学历、能力等等一概不论），让宦官直接传旨，直接任命，可谓“不拘一格降官才”。从此，和尚道士也好，江湖术士也罢，甚至优伶工匠，纷纷通过官场“绿色通道”飞黄腾达，这些人就被称之为“传奉官”。注

从此，传奉官就一发不可收拾，日益肆虐泛滥起来，吏部尚书尹旻等人竟“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

传奉官的泛滥，引发朝野普遍不满。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痛斥传奉官的危害：自从有了传奉官以后，“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在政府中见惯不怪，从没张过弓、从没骑过马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在军队中也司空见惯，如此骇人听闻却又处处可见，有这样的政治吗？可惜明宪宗是油盐不进。

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正月初一日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星变”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明宪宗不得已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指向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

经各有关部门统计，时任传奉官总数近3 700人。对这些传奉官，明宪宗表示将采纳各部门提出的方案进行裁汰、处置。结果，处置到一半，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康永韶“进言”说，陕西等处近来发生灾荒，“星变”已在灾民身上得到应验，不必再为此担忧。明宪宗一听，很快就把之前罢黜的传奉官重新起用，降职的大多复原职，减俸的大都复原俸，而且变本加厉地传升了一批新的传奉官，传奉升授的

势头甚至比“星变”前更为迅猛。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见于记载的传升有43例、650人，超过“星变”前的任何一年。[注]

这种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甚至宦官的意愿，肆意践踏组织任免程序，置朝纪国法于不顾的做法，害处有三：

第一，官爵由“天下公器”沦落为“皇帝私物”。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来说，官爵是“天下公器”，可传奉官让官爵沦落为“皇帝私物”，无须经由任何组织任免程序，从而破坏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均衡。

第二，政府人员的素质急剧下滑，政府效能极大降低。传奉官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要么通过结交宦官，要么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一官半职。这些人不仅素质普遍不高，而且相当部分的人属于奸佞小人，他们大大降低了官场的品位和品行。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一大批僧道、工匠、画工、优伶充斥其间，政府的认同性和运行效能都大大降低。

第三，后宫太监干政增多。传奉官不经过吏部复核，直接由宫中旨意传授，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宠妃及太监就上下其手，借皇帝之名，卖官鬻爵。比如太监梁芳，勾结万贵妃，假传圣旨授官竟高达千人之多。[注]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明宪宗去世，明孝宗继位。明孝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清理官场的这个绿色通道，据吏、礼、兵三部统计，当时传奉官的数量超过4 700人，全部被裁汰。[注]过了几年，明孝宗也开始通过内旨授官，但主要传升技术匠官、内廷侍官，朝廷正官还是按规矩，该由吏部铨选的由吏部铨选，该经由廷推的经由廷推。

借两京御史案过滤言路噪音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君权，取消了丞相制，为了加强对百官的控制，除了设立监察御史外，更在六部各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些御史和给事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官，主要职责是批评监督政府，号称言路，是皇帝控制百官的重要工具。

起初，言官对监督政府、纠正时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间长了，弊端慢慢也显现出来了，不少言官渐渐走歪了道、唱歪了调、念歪了经。越往后来，这种现象越明显。除了少数言官能秉公论证，多数言官成了“政闹”（类似如今医院里的“医闹”），要么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凭着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要么被利益集团圈养，不问是非、无论对错，而是立山头、分圈子、站队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朝廷被言官们闹得朝无宁日、政无定论。

明孝宗即位后，广开言路，政闹们闹得更凶了。

政闹里有个代表人物叫汤鼐。在骂人这项基本工作中，他长久以来贯彻一个原则：是非不分，逮谁骂谁。像万安、刘吉这样的小人他骂过，像徐溥、刘健这样的贤臣照样骂，为出风头，甚至还无理取闹。有一次，明孝宗开经筵（国事论坛），天热得很，明孝宗身体不适，头昏脑涨的，吏部尚书王恕就很体贴地说：“皇上要不歇会儿？”汤鼐立马站出来说：“不行，皇上要克服困难，倒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

明孝宗意识到，言官虽好，也不能放纵，于是琢磨着找机会整顿言路、规范言行，遏制朋党势力。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的两京御

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注

弘治二年初，四川受灾，朝廷派人前去赈灾，一切顺利。同年二月，中书舍人吉人却上书，认为之前派去赈灾的官员不称职，应该再派得力的官员前去赈灾，并推荐了一干人等，还特别强调御史汤鼐是最适合带队的。这份上书，皇帝没有采纳。过了几天，有人弹劾御史汤鼐、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兵部主事李文祥、寿州知州刘概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党”。私立朋党罪名很大，但查证很难，于是明孝宗趁机敲打，初判：主犯刘概，妖言惑众，处斩刑；主犯汤鼎，犯受贿罪，流放；从犯邹智、吉人，一律革职。后来，经吏部尚书王恕争取，改判结果如下：主犯刘概，免死流放；从犯汤鼎，充军；其他人等，减轻处罚。其实，明孝宗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谁的命，开始的严厉判决，是为了让言官们知道厉害，后来的改判，又是为了给他们希望，接受王恕的意见，则是告诉文武官员：正确的建议，皇上是能听进去的。

上面讲的是北京的御史案，下面还有南京的御史案。

弘治二年秋，明孝宗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奏章：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弹劾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户科给事中方向非法侵占国家禁地。从来都是言官弹劾太监，这次是太监弹劾言官，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而之前，南京监察御史姜绾弹劾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侵占民田。弘治三年二月，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取证后，事情弄清楚了：蒋琮侵占民田、腐蚀拉拢干部确有其事，但是姜绾对他的其他指控是不符合实情的。同时，蒋琮对姜绾的指控也不符合实际。至于卢锦和方向侵占禁地的事，经查实证据确凿。

这是一份让双方都心服口服的调查结果。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明孝宗做出了一个偏袒的处理结论：言官姜绾、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俊等10人被逮捕到京，然后统统降

职到地方上当判官；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撤职，户科给事中方向降职。而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仅进行内部批评教育。至于那片农田，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注)

就两京御史案，《明史》认为此事导致弘治朝“言路渐稀”。这一评价貌似正确，其实有失偏颇。这次事件后，言官的口水确实少了，但对不法官员还是照样弹劾，正确的意见明孝宗依旧采纳，前提是要讲证据，不能乱喷胡闹。“言路渐稀”没错，但确切地说是少了谩骂，至于检举揭发腐败，提“合理化建议”，不该少的一点儿也没少。

这正是明孝宗的目的：言官的骂声，已经过于泛滥，这个时候，有必要有所限制，才能保证整个权力体系的平衡有序和改革的进行。

其实，言官被重罚、太监被轻责并不是两京御史案的结局，真正的结局是：被贬的言官们做出成绩后纷纷得到了重用，而被轻责的太监们后来纷纷被重罚。(注)

改革财税堵住损耗“无底洞”

明朝的财税制度，到明孝宗时，日益运转不灵。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发达，东南地区更是空前繁盛和富庶；但另一方面，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国库越来越空虚，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穷。

如此悖论，是为何故？主要是财税方面的三大严重问题导致的。

第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当时，地主豪强争相圈地，他们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想方设法偷税漏税。与此同时，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能按时交税的普通农户的数量大大减少，政府的税源大为减少。

第二，明初，朱元璋对税收政策做了一条很“人性化”的规定：拖欠田赋的地区，如果确有无法征收的原因，到第二年可以考虑减免。这条规定本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实际操作中却被地方官和豪绅用来“挖国家墙角”。每到收税时节，老百姓的税照样交，收完了以后给中央打报告说闹灾了，上下打点，弄个免税或减税指标回来。已经收上来的税，就被地方官吏和豪绅们中饱私囊了。

第三，南粮北运的损耗越来越大。迁都北京后，朝廷的用粮主要靠南方调运，南方的税粮要通过京杭大运河送到北京。路途遥远，运费开支庞大，被称为损耗，也由老百姓负担。也就是说，农民不但要交应交的税粮，还要另交损耗。税粮押运过程中，由于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克扣，损耗越来越大。越到后来，损耗越离谱，直至成为填不满的“无底洞”。

老百姓越来越穷，财政越来越困顿，而“挖国家墙角”的地方官吏和豪绅却越来越财大气粗。针对这些积弊，明孝宗采纳礼部侍郎邱浚的建议，进行财税改革。

首先，遏制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一方面，明孝宗下旨清查土地，严查土地兼并，将官吏豪绅巧取豪夺的土地发还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将没收的各类贪官污吏和犯罪分子的土地分发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另一方面，继续开放湖广、四川一带的无人区少人区，招募无地少地的农民前去耕种，并给予合法身份，从而缓解地域结构性土地问题。这两个政策双管齐下，几年下来，土地矛盾大大缓和。

接着，解决严重的赋税拖欠问题。

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的勾结由来已久，偷梁换柱的经验熟练老到，上下其手常常做得滴水不漏毫无破绽。如果还沿用以前的政策，

只是加大监察力度，必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于是，明孝宗决定调整制度：规定每年八月上旬，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做出预算，九月上旬做出纳税手册，九月中旬填写通知单，十一月初开始征粮，十二月必须征完。这就堵住了谎报拖欠的借口——征税事先订好计划，事后想赖也赖不掉，老百姓交税都有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地方官不能再额外勒索，也不能再欺上瞒下、上下其手。同时还补充规定：凡是有上报灾情的，一律都由都察院派专人核实，谎报的一律严惩。如此一来，赋税拖欠问题基本得到治理，老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而朝廷的税收也能及时到位。

下一步，堵住南粮北运损耗的漏洞。

在这方面，明孝宗主要从两方面着力：

统一损耗。明孝宗下令，严禁豪绅介入税粮征收和运输工作，并制定统一的“损耗价目表”，防止征税官“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减少纳税人的损耗。比如，应天府税粮的损耗为每石二斗五升，丹阳府税粮的损耗为每石二斗二升……统一后的损耗，相比之前大为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折纳银钱。如果农户的税粮交得不够，不足的部分就折算成银钱补上。关于银钱与粮食之间的换算比率问题，明孝宗时期也制定了统一的价目表，普通地区是每石粮食折七钱银子，有灾情的地区每石粮食折四钱银子，当时在中国北方粮食的市场价格是每石一两银子。比较下来，这样的价目表还算是比较公允的。由于银钱的损耗明显要小于粮食的损耗，押运保管的成本也大为降低，所以老百姓的损耗大大减少，政府的税收也能按时足额的到位。另外，农民变交粮为交银，可朝廷还是要吃粮食的，于是就演变成朝廷买粮，如此一来，粮食贸易就繁荣起来了，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此外，为了解决税粮贪占克扣问题，明孝宗对监察体系进行了改革：每年税粮征收期间，由按察使和布政使共同督促完成，一旦出问题要负连带责任。税粮必须按照规定时间送达规定地点，应押送税粮的数目和实际押送到的税粮数目要进行严格核对……注

明孝宗的苦心没有白费，改革渐收实效，几番整顿下来，贪官污吏们，眼见着白花花的税银从眼前过，却是干着急没办法，而国家收入开始增加，人民负担有所减轻，大明王朝的国库，逐渐充实了起来。

打响明朝商人翻身解放第一枪

中国古代向来是重农抑商的，这在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为了巩固小农经济，朱元璋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征收重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穿衣服都严格限制，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等等。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往的抑商政策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明孝宗顺应形势，减免了商税，取消了许多限制条令，对一些经济政策进行了改革，打响了明朝商人翻身解放的第一枪，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属盐政改革。

粮、盐，这两样东西，每个人都离不开。明初，是这么个形势：边关缺粮，边防重镇的粮食供给常常捉襟见肘、供不应求，但政府又没有钱买粮食和运送粮食，需要借助民间商人的力量把粮食贩运到边关交给政府。政府有盐，盐的生产都垄断在政府手里，商人们都盯着成本低、市场广、利润多的食盐生意。

因势利导，于是明朝政府就实行“开中法”：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重镇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就给商人一张凭条也就是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政府盐场领取食盐，然后把食盐贩运到指定地区进行销售。虽然来回折腾，但毕竟贩卖食盐利润大，还是有很多商人投身于此。还有一些商人，为了减少折腾，干脆就在边疆开荒种地，秋收后向政府交粮换取盐引，然后再贩卖食盐。这样一来，既把粮食运送到了边关，又开发了边疆，还繁荣了经济，可谓一举多得。

可渐渐地大家就发现：一举多得越来越式微，而弊端却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商人拿着盐引却换取不到盐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原来，官盐的产量是很稳定的，很少有波动，但边关对粮食的需求却起伏很大，难以有效对接。总的趋势是，政府往往以边防为重，从边关政府开出来的盐引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官盐的产量，商人就算拿着盐引也换取不到食盐，盐引渐渐成了政府打的“白条”。手中的盐引积压得多了，商人也就不再积极向边关运送粮食了，边关的粮食储备又慢慢缺乏保障了。

另一方面，许多达官显贵看中了倒卖食盐的高利润，于是利用各种关系获取盐引，许多盐引都是凭空开出来的。这些达官显贵不仅能获取盐引，还能优先换取到食盐，在市场上贩卖，无本万利。官商勾结普遍存在，一起挖国家的墙脚，导致国家食盐白白流失，该收的钱越收越少，全被贪官奸商占取了。

明孝宗即位以后，曾派户部侍郎李嗣清理盐政，法办了一批腐败分子，并制定了严格的凭条审核制度，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归根到底，这还是制度造成的问题。

于是，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明宪宗采纳户部尚书叶淇的办法，改革盐政：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

卖。从交粮食到交钱，看似只是简单地变了一个字眼，实际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从此以后，只要有钱，就可以从政府那里换回盐来贩卖，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种粮运粮的折腾，渠道大大缩短，手续大大简化，成本大大降低，商人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新政一出，广大商人欢呼雀跃，争相向政府送钱换盐，商人们找到了合法的发财渠道，国家募集了大量资金。国家有了钱，不愁边关买不到粮食。

盐政改革，是明中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改革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打开了一片无限宽阔的天地。

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地域性商人集团，即商帮。其中，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的迅速发展，与明孝宗时期的盐政改革关系密切。在盐业贸易中发家致富的商人们，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朝时期，明朝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被彻底打破，商贾集中的长江中下游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活跃带，资本主义萌芽也在这里孕育而生。

兴修水利实现“大灾无大难”

成化二十三年，河南水灾；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淮北水灾，苏松河水灾……

明孝宗遭遇了中国水患特别严重的时期，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三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水灾的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要解决问题，只有兴修水利。于是，明孝宗任用白昂、刘大夏、徐贯三人治理水患，先后主持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的

水利工程，在古代中国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大灾无大难”和“大灾无大乱”。注

先看白昂治黄河，造福河南地区。

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春，白昂开始治理黄河。白昂把中牟段的河水从荥泽阳桥引入了淮河；疏浚宿州的汴河故道，使汴水流入泗水；疏浚睢水，使其从归德饮马池流经符离桥到达宿迁，进入泗河；同时开凿了十几条月河用来排泄洪水，减缓水势；最后堵住了36个决口。这样一来，河水流入了汴水，汴水又流入了睢水，睢水流入了泗水，泗水最终流入了淮河，汇入大海。接着，又在鱼台、德州、吴桥修复了古代遗留下来的大堤；又从东平以北到兴济开凿了12条小河，流入山东境内的大清河以及黄河故道。经治理，河南地区水患大减。

再看刘大夏治黄河，造福淮北地区。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在淮北地区。刘大夏日夜奔波在千里河岸上，摸清了水患的前因后果，认识到单单治理下游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是应该上流、下流双管齐下，同时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于是，他带人在上游进行了一系列的疏浚，在下游进行了一系列的筑堤工程：疏浚仪封黄陵岗以南的贾鲁河故道40余里，使河水从曹县流向徐州方向，以此来分散水势；疏浚孙家渡口，另开新河70余里，将河水导向南部的中牟、颍川，由两地向东流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地区的河段，使河水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两支，一支流入宿迁小河，一支流向涡河，最后都汇入淮河……经过治理，淮北地区水患大减。

接着看徐贯治理苏松河，造福苏杭地区。

弘治五年，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可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于是，明孝

宗派徐贯治理苏松河。徐贯巡视调查后发现，苏松河淤积不只是天灾，更有人祸——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达官显贵的庄田林立，使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庄田建筑等进行强拆，接着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河道全线畅通。在此基础上，徐贯开挖数条运河，将苏松河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还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治理，苏杭地区水患大减。

在治理水患的同时，明孝宗还努力减免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弘治元年至十七年（公元1488~1504年），“减免数额在700万石以下的，只有一年；减免700万石到800万石的有5年；减免800万石到900万石的有10年；减免900万石以上的有两年”。明孝宗时期所减免赋税的数额，比明朝其他任何时期都多。除了减免赋税以外，明孝宗还在各地大力推行“存粮备荒”制度，规定“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卫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灾荒时用来赈灾。(注)另外，治理水患也招抚了大量灾民，相当于以工代赈。

中国古代，大灾往往会导致大难、大乱。也就是说，在天灾这个导火索下，原本暗潜的矛盾一下子被激化激发、点燃引爆，造成局部流民起义甚至是大规模的叛乱暴动，轻则大伤国家元气，重则革掉国家政权的命。

明孝宗在位18年中，黄河共发生大小水灾54次，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除了水灾，还有旱灾、蝗灾等。可以说，明孝宗时期，是明朝天灾特别高发的时期，却是流民相对较少的时期，也是叛乱起义的次数最少和规模最小的时期之一。

为何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明孝宗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毫不夸张地说，明孝宗抢在革命之前推行改良，避免了一场社会大动荡。难怪《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会感叹："如果没有明孝宗，大明公司这笔买卖估计也就一百多年就关门了。"

知耻而后勇勤政现中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孝宗施政也有不足之处。

经过头几年的励精图治，取得一些明显的成绩后，明孝宗有点自满、有点怠政了。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起，明孝宗"视朝渐晏"。[注]特别是由于童年多灾多难，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明孝宗体弱多病，所以他希望通过养生炼丹之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因此，一些奸佞之辈乘机兴风作浪，宦官李广就是典型代表。

李广是明孝宗时的太监，因为能作符录法术和祈祷祭祀，因此深得明孝宗的宠信。李广于是按照成化年间的旧例，假借诏旨授予传奉官，很多人争着向他交送贿赂。李广又擅自夺占京畿的民田，涉足贩盐得利以万万计，他建造巨大的府邸，引玉泉山水，围绕于府邸前后。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等人先后上奏章弹劾，明孝宗并没有查处。所幸的是，李广只是倚仗权势一味敛财，于朝政并无大的影响。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李广怂恿明孝宗在万岁山上修建毓秀亭。亭子建成后，小公主夭折，不久太皇太后清宁宫又发生火灾。占卜的人说是李广建毓秀亭犯了岁忌，太皇太后恼怒地说道："今天是李广如何如何，明天也是李广如何如何，果然招来祸事了。"李广听闻后，畏罪自杀。

李广死后，明孝宗怀疑李广藏有异书，派人到他家中去找，结果得到了一本登记官员行贿的簿子。上面有多名文武大臣的名字，写着馈送黄白米各多少的数字。明孝宗不明就里，惊异问道：“李广能吃多少东西，怎么接受这么多米？”大臣解释说：“这不过是隐语罢了。黄米指的是黄金，白米指的是白银。”明孝宗这才恍然大悟。

李广事件让明孝宗幡然醒悟，他知耻而后勇，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勤政时期。明孝宗不断反思之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励精图治。注

明孝宗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墙壁上，熟看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注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逐渐荒废了的晚朝制度和午间咨询。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地救火，明孝宗一夜没合眼，因此没去上朝，他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下，虽然弘治朝天灾特别严重，但国家从总体方面来说，依然呈现出一幅繁荣的景象。

从赋税收入情况看，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赋税收入锐减至2 600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2 500万石至2 600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在常年减免税都超700万石的情况下，税收却增至2 700万石以上，成为明朝中叶岁入的高峰。

与赋税相伴的是人户的增加。人口数由弘治元年的50 207 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的60 105 835口。不仅如此，弘治年间的户口也在不断增加，从弘治元年至弘治八年，户口由9 113 630户增至10 100 279户，到了弘治十七年更是达到了10 508 935户。注

从这些数据来看，弘治时期确实出现了国富民安的局面，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均较为稳定富庶的时期。与此同时，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弘治中兴，成色十足。

明武宗好逸乐让改革灰飞烟灭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明孝宗偶感风寒，由于太医误诊，一直体弱多病的明孝宗竟然就一命呜呼了，年仅36岁。

明孝宗弥留之际，任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为顾命大臣，留下遗言“传位给太子朱厚照”，并嘱托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位爱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

明孝宗去世后，15岁的朱厚照即位，也就是明武宗，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次年改年号为正德。

“好逸乐”，多么精准的定性，真是知子莫如父！“好逸乐”的明武宗，很快就让明孝宗的改革灰飞烟灭。

沉迷玩乐。明武宗身边的随侍太监中，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个太监号称“八虎”，刘瑾为首。在刘瑾的诱导下，明武宗玩得越来越离谱。

先是在宫里开店铺。明武宗身为皇帝，却对市井生活十分向往，特别希望自己是位富商。刘瑾于是就怂恿明武宗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开了很多店铺，明武宗扮作富商，太监宫女们扮作掌柜、伙计、丫鬟，明武宗“扫货”扫得不亦乐乎。

接着在宫里开妓院。明武宗荒淫放纵，对宫外的妓院很是向往，刘瑾于是就撺掇明武宗在宫中开了个妓院。宫女们被要求扮作妓女，明武宗挨家挨户进去听曲、嬉戏、淫乐，把皇宫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毫无体统。

这可急坏了各位正直的大臣们。前面也说了，弘治时期政治清明，所以明孝宗留给明武宗的大臣班子，是非常刚正廉洁的。于是，这些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

明武宗当时刚即位不久，从未见到过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就有些招架不住，想舍弃“八虎”与群臣握手言和。工于心计的刘瑾看出了端倪，千钧一发之际，组织太监们在明武宗面前号啕大哭，撼天动地，让明武宗改变了主意。第二天上朝，明武宗不仅没有惩治“八虎”，反而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包括顾命大臣在内的内阁成员谢迁、刘健等纷纷被迫告老还乡，大臣们碰了一鼻子灰。

从此，朝政更加暗无天日。

宦官专权。“八虎”在战胜了群臣之后，气焰更加嚣张，擅权跋扈，无以复加。刘瑾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权倾朝野。他想着各种法让人向他送礼进贡，行动迟缓的，轻则被皇帝冷落降职，重则被逼迫致死。朝廷之中，虽然人人都恨他，却又人人都怕他，只好忍气吞声。时人称他为“立皇帝”，称明武宗为“坐皇帝”。刘健、谢迁等顾命大臣，都被他迫害致死。

朝政荒废。明孝宗时，要求尚寝宫、文书房的侍从，经常提醒皇帝要勤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明武宗嫌这些内官的提醒太烦人，于是就废除了，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早朝、经筵、日讲，没几天统统都歇菜了。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明武宗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大臣无计可施只得放弃。

沉湎豹房。为了进一步诱导控制皇帝，刘瑾又特意营建了豹房，里面的玩乐设施应有尽有，歌姬艺妓数不胜数，玩乐方式超乎想象，明武宗玩得忘乎所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开始，明武宗离开紫禁城，住进豹房。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凌晨，宫中因元宵节放烟花，不慎走火，一把火把乾清宫烧没了。乾清宫可是皇宫三殿之首，是皇帝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明武宗居然对随从戏谑说："好大一棚烟火啊。"

……

明武宗完全置祖训家法于不顾，视国事朝政为儿戏，致使朝政紊乱，国事衰败，只是没到亡国的境地而已。于是，明孝宗改革的努力和成果，在明武宗手里被毁得干干净净。

小　结

抢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

历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每逢历史转折时期，就会上演改革与革命的赛跑。明孝宗弘治时期，显然也是这样一个时期。

弘治初年，明孝宗接手的，不仅是一个朝政紊乱的"乱棋局"，还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官场腐败政府无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民生恶化流民剧增，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城城欲摧"。

此情此景，忧患涌上明孝宗心头，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革故鼎新，那么社会大动荡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以明孝宗为首的弘治君臣，针对明朝中叶以来的弊政，不失时机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明朝出现了少有的吏治比较澄明、经济比较繁荣、国防比较强盛、人民比较安乐的时期，中兴气象次第呈现。弘治时期，内部没有大动乱，外部没有大威胁，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贤臣名士层出叠现，君臣相睦和衷共济。

也就是说，明孝宗抢在革命前进行改良，带领改革跑赢了革命。而这，无论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对国家，还是文明，都属万幸。

但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变革，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进步。改革是一个病去如抽丝、循序渐进的艰辛过程，解决问题不可能药到病除，更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改革就像接力赛，必须接续奋斗，每一棒都很关键，只有久久为功，用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推进完成。

可惜，明孝宗的改革接力棒没人接续，改革戛然而止！

可叹，明孝宗的改革事业竟所托非人，成果灰飞烟灭！

1. 张廷玉：《明史·孝宗本纪》，中华书局974年版。

2. 熊召政：《宦官是政治的毒瘤》，载《领导文萃》2007年第3期。

3. 综合[1]熊召政：《宦官是政治的毒瘤》，载《美文》2005年第8期；[2]《明史·汪直传》：“（成化）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唯河南巡抚秦纮与直抗礼，而密奏直巡边扰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4.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王恕）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

5. 《明史·王恕马文升等传赞》：“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

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历事累朝，享有眉寿，朝野属望，名重远方。”

6. 翟爱玲：《“弘治中兴”中的朝廷人事格局》，载《中州学刊》203年第3期。

7. 李伟明：《“斜封官”与“传奉官”》，载《杂文月刊（原创版）》2008年第8期。

8. 综合[1]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期；[2]王迪：《成化时期的“传奉官”》，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年第7期。

9. 王斌：《明代弘治朝“两京言官之狱”研究》，载《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年。

10. 《明史·佞幸传》：“宪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尽汰传奉官。”

11. 商传：《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期。

12. 王斌：《明代弘治朝“两京言官之狱”研究》，载《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年。

13. 张嵚：《被遗忘的盛世》，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14. 张嵚：《被遗忘的盛世》，九州出版社，2009年。

15. 综合[1]王团伟：《论明代开中盐法的转变——以叶淇盐法改革为例》，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年第期；[2]王雄：《从纳粟中盐到纳银中盐——明朝开中盐法的衍变》，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6. 综合[1]刘旭东：《明代弘治时期治水研究》，载《长沙大学学报》203年第7期；[2]龚文如：《明代弘治年间河南水灾探析》，载《安徽文学》2008年第9期“历史回廊”栏目。

17. 沈鹏：《明孝宗与“弘治中兴”》，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年第4期。

18. 陈时龙：《守成令主——朱祐樘小传》，载《紫禁城》2009年第8期。

19. 唐博：《弘治皇帝回忆录》，载《地图》2009年第6期。

20. 《明史·本纪第十五 》：“三月乙丑，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华殿壁。”

21. 沈鹏：《明孝宗与“弘治中兴”》，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年第4期。

结 语
不做“装醒”的人，叫醒“装睡”的人

周厉王改革、秦献公改革、汉宣帝改革、王莽改革、汉明帝改革、隋炀帝改革、唐武宗改革、宋仁宗改革、明孝宗改革……

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历史时空之旅，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上大的改革中“沉没的改革”的打捞。（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只打捞了大的改革即全面改革，而不包括某一领域的或局部的改革。）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改革是怎样沉没在历史长河中的？

改革是怎样沉没的？

“沉没的改革”是怎样沉没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这句话，在这里仍然适用——

“沉没的改革”沉没的方式各不相同：

有的是被“污名化”

如周厉王改革。明明是把当时流失的“国土资源税”重新“颗粒归仓”，却被污名化为贪得无厌实行“专利”；明明是要打破高级贵族的世袭垄断，却被污名化为亲小人远贤臣；明明是要打击尾大不掉

的诸侯割据势力，却被污名化为穷兵黩武动摇国基；明明是要强化法治，却被污名化为推行暴政；明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家，却被污名化为西周的“周扒皮”；明明是贵族发动政变放逐了周厉王，却被粉饰为平民百姓揭竿而起推翻了周厉王。

有的是被“雪藏化”

如秦献公改革。秦献公推行系统改革，让秦国转弱为强，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后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认定，是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强大，实现超级逆袭，不仅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帮助秦献公实现秦国逆袭的是墨家，而后来帮秦始皇实现统一六国的是法家，墨家后来越来越被边缘化，以至于完全销声匿迹，而秦献公改革也渐渐被雪藏了。

有的是被“边际化”

如汉宣帝改革。汉宣帝通过改革，让汉朝出现了比汉武帝时期更为繁荣强盛的景象，但后人仍多认为汉武帝时期才是最强盛的时期，以至于漠视汉宣帝改革。为何？边际收益递减使然。就像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喜悦，是后来的蛋糕和玩具所无法比拟的，就算后来的蛋糕更甜、玩具更炫，也无济于事。汉武帝改革造就的盛世，不仅是汉朝的第一个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它使汉宣帝改革被边际化。

有的是被“失焦化”

如王莽改革。王莽推行的是一场全面改革，而且是向汉武帝致敬的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大刀阔斧，试图把脱轨的历史列车拖回原本的轨道，但在阴谋论和空想论中失焦了。要么被当作一场篡位的阴谋，要么被当作一场空想的试验，作为一场改

革的原本面目却被模糊了。另外，王莽由一介书生平步青云成为“开国之君”又跌落沦为“亡国之君”的传奇经历，更加让他主导的改革失焦模糊。

有的是被“阴影化”

如汉明帝改革。汉明帝改革意义重大，对官员很严切，对百姓很宽柔，“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用改革还给历史一个昌明治世，让光武帝的开国奠基之业得以延续，让先天不足的东汉王朝得以长存。但汉明帝和他的改革总是不被重视，被遮在光武帝巨大光环的“阴影”下。光武帝作为东汉开国之君，注定让东汉其他皇帝无法与之比肩，汉明帝作为光武帝的儿子，紧随光武帝之后，被遮在这个巨大光环的“阴影”下而无法闪耀自己的光芒。

有的是被“符号化”

如隋炀帝改革。隋炀帝进行了众多改革，影响后世千余年，为中国从豪强世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后门阀社会转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开凿的大运河功利千秋。但在旧史家和文学家的通力合作下，隋炀帝的面目被大大丑化，符号化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一个终日花天酒地、荒淫寻乐、暴虐无道的“末代昏君”，成为中国历史上被泼脏水最多的皇帝。

有的是被“抹杀化”

比如唐武宗改革。唐武宗针对唐朝晚期的弊端进行了大力改革，创造了唐朝后期最为平稳安乐的一段时期，呈现出中兴气象，成为“灰暗晚唐”的一抹亮色，但后世的人却往往看不到这抹亮色。原来，唐武宗主政六年便英年早逝，后继者唐宣宗“尽反会昌”，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数废止，把前景一片大好的改革大业葬送殆尽，扼

杀了唐朝最后一次改革自救的机会，也把唐朝牵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

有的是被“忌讳化”

比如宋仁宗改革。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推行的改革即庆历新政虽有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提及，却仍然沉没了。原来，宋仁宗改革被严重的“忌讳化”了：由于庆历新政仅仅进行了两年就突然夭折了，说起来像个笑话。但由于宋仁宗是旧史家认定的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是到当时为止庙号唯一冠以“仁”字的君主，而“仁政”是儒家主导的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理想。“为尊者讳”，庆历新政自然是少讲为好。

有的是被“熨平化”

比如明孝宗改革。明孝宗抢在革命之前推行改良，在明朝天灾最为高发的时期，开创了流民相对较少、叛乱起义最少的治世，成功避免了一场大动荡，但明孝宗改革却还是沉没了。原来，明孝宗改革被“熨平化”了——历史是有周期的，谈论历史时往往说一个大的时期，比如明孝宗时期往往被纳入“成化至正德年间”这样一个大时期。明孝宗时期处于成化与正德之间，虽然昌明中兴，但在黑暗的成化时期和荒唐的正德时期的前后夹击下，被 “熨平”埋没了。

了解了改革的各种沉没方式，问题又来了：这些“沉没的改革”为什么会沉没？

改革为什么会沉没？

“沉没的改革”为什么会沉没？

其实，“沉没的改革”之所以会沉没，跟他的沉没方式一样，各不相同，但在沉没的背后都有同一个身影——既得利益集团。

周厉王改革被“污名化”，沉没的背后是诸侯国国君高级贵族集团等；

秦献公改革被“雪藏化”，沉没的背后是信奉法家思想的利益集团等；

汉宣帝改革被“边际化”，沉没的背后是鼓吹儒家思想的贵族集团等；

王莽改革被“失焦化”，沉没的背后是蚕食帝国的官僚世族集团等；

汉明帝改革被“阴影化”，沉没的背后是盼着中央式微的豪强集团等；

隋炀帝改革被“符号化”，沉没的背后是把持朝政的关陇贵族集团等；

唐武宗改革被“抹杀化”，沉没的背后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利益集团等；

宋仁宗改革被“忌讳化”，沉没的背后是庞大冗杂的文官利益集团等；

明孝宗改革被“熨平化”，沉没的背后是官商勾搭的腐败官僚集团等。

形象地说，改革之所以沉没，是既得利益集团给这些改革绑上了沉重的石头，然后投掷进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此看来，改革沉没其实

是“被沉没”。

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上述提及的“沉没的改革”，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失败了的改革，“被沉没”比较好理解；成功了的改革，为何还会“被沉没”？

这里就有必要谈谈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其实，衡量一个改革是否成功，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这个改革在当时当地是否得到了推行，是否促进了国富民安；

第二个维度，这个改革是否给后世以经验或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沉没的改革”都是失败的改革，就算其中有一些改革在当时当地取得了相当成功，但从更高要求上讲却是失败的。毕竟人类文明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分享，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改革，既然没有得到传承和分享，不能给后世参考和借鉴，那么就很难配得上“成功”二字。

回到上面的问题——当时已经成功的改革，为何仍会“被沉没”？

原因显然不止一个，但其中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改革仅仅在战略上有优势，而反改革天然地在战术上占优势”。

从空间维度讲，改革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做出极大的努力，进行系统的统筹，还要科学地推进，方能“病去如抽丝”般渐渐见成效，而毁掉改革成果却是“病来如山倒”般轻而易举；

从时间维度讲，改革需要下定极大的决心，具备超凡的毅力，数寒暑如一日，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水滴石穿”，而葬送改革

成果却易如反掌。

上面提到的这些“沉没的改革”，其中就算有一些在当时当地取得了相当成功，但在不久的后来，都在“病来如山倒”中失败沦陷了。

这警醒改革者，改革如果不能改变利益集团格局，不能重构社会结构，那么，所取得的成效都是暂时的，所收获的功效都是脆弱的，最终逃不脱失败的结局、沉没的命运。

直白地说就是，就算改革暂时打破了利益藩篱，冲破了利益盖板，调整了利益分配，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合理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逆转，那么改革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过不了多久，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变本加厉地反扑，形势反而会愈加糟糕，局势反而会更加恶化。

举个例子，汉明帝改革“在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但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东汉先天不足的社会结构——土地主要集中在豪强地主手中，自耕农的比例过低，门阀世族垄断仕途。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汉明帝全力改革，对官员很严切，对百姓很宽柔，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富民安，但终究不可持续。事实证明，汉明帝之后，东汉的皇帝们就逐渐顶不住豪强世族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了，东汉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沉沦下去。

而反观唐朝，之所以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治世盛世，就是因为唐初的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推行均田制后，自耕农的比例大大提高，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唐帝国坚实的根基；虽然贵族集团也存在，但所占有的财富（特别是土地）的比重较小，居于从属地位。加上科举制的大力推行，中央朝廷与自耕农联盟形成的合理利益集团，在和门阀贵族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助于财富的合理分配、阶层的有序流动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改革虽然是由问题倒逼产生，但改革的目标，不仅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优化重组问题所反映的背后的社会结构。

知古鉴今，问题又来了：当前的改革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当前的改革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当前的改革要警惕哪些风险？

非常非常小，但毕竟还是存在的。不必讳疾忌医，最大的风险是意识不到风险，意识到风险，风险就降低了一半。居安思危，我们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严重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充分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从而让改革推进得更顺利一些。

被“污名化”的风险，仍然存在

比如，虽然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起势，各项举措动真的、碰硬的、来实的，财税改革、户籍改革、考试改革等甚至气势夺人，但仍有一种论调认为“改革是装模作样、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虽然反腐败成效震撼人心一片叫好，“拍蝇”零容忍，“打虎”无禁区，但仍有一种论调认为这“像美剧《纸牌屋》演的，不过是党内的政治斗争”；再比如公车改革，目的和效果都是大幅节省公车支出（据测算一年节省约千亿），但仍有一种论调认为“公车改革是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

被“边际化”的风险，仍然存在

如今，改革低垂的果实早已摘完，要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不可能像30多年前那样皆大欢喜。今天的改革，其付出和收益的投入产出比，肯定要比30多年前低，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

律使然。比如医疗改革，医、患、药三方的要求都不能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满意；异地高考，当地和外地户籍居民的权利都要兼顾，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便宜占尽。还有不少官员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引发“公务员将招不到优秀人才”的担忧……

被“失焦化”的风险，仍然存在

虽然“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干扰因素也很多，特别是从国际环境来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南海某些国家不断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战略定力，把握不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有可能让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些干扰因素中“失焦”。

被“阴影化”的风险，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30多年，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换个角度说，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环，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自己不形成巨大的光环，那么就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光环下被“阴影化”。其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规划好，如果蓝图如期实现，那么将形成巨大的光环，足以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光环相媲美，甚至能超越之前的成就也不一定。但蓝图毕竟还只是蓝图，既然还有待实现，就存在各种风险。

被“符号化”的风险，仍然存在

改革中的利益再分配，会给某些利益群体带来必然的阵痛。比如，改革要化解过剩产能，而过剩产能又是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柱，甚

至“看家产业”，一旦淘汰，短期内将直接影响GDP、财政收入、就业等，带来不小的阵痛。改革的阵痛，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于是，就有人给改革加上“折腾”的标签，说“高考改革就是瞎折腾”、“收入分配改革就是穷折腾”、“公车改革就是乱折腾”……

对上述风险必须警惕，居安思危，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

其实，上述风险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集团的身影。

不要成为“装醒”的人

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改革就是要打倒既得利益者吗？

没这么简单，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既然叫既得利益者，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是既得利益者打倒对手。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并非百害而无一利，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其实，既得利益者也有其合理利益，超出合理利益的额外的特殊利益，才是需要被改革的。

而且，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成为改革者的。第一，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利益支配的，历史上很多改革就是由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人倡导并推动的；第二，观念的力量很强大，许多伟大的改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当前的中国，观念的变革不仅迅速，而且巨大；第三，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博弈，为改革带来了机遇和空间；第四，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既得利益者虽然不情愿改革，但更不情愿被革命，这迫使清醒的既得利益者积极推动改革。

因此，改革更多的是一种调整、优化、重组，让既得利益者逐渐让渡额外的特殊利益，从而调整利益格局、重组社会结构。

但是，既得利益者绝不是“省油的灯”和“温顺的羔羊”，当然不会主动乖乖地让渡额外的特殊利益，所以过程通常是渐进的。面对改革，既得利益者往往“装醒”。

在凝集改革共识阶段，既得利益者会“装醒”。

要么充耳不闻改革呼声，冰镇改革热点，让改革呼声偃旗息鼓；要么全力炮轰改革诉求，搅浑改革舆论，让改革诉求不了了之。

比如，城市出租车管理制度，是明显需要改革的，讨论多年却依然“无解”。一方面，众多城市的面积和人口都大幅甚至急剧增加了，但出租车数量长期不增加，打车难成为通病，拒载、宰客等现象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群体一天忙到晚，挣的钱大部分交“份子钱”了，收入不高，没有保障，难免有怨气。市民和出租车司机“双输”的背后，是出租车公司靠垄断获取暴利，长期靠高额的“份子钱”坐收渔利、一本万利。吊诡的是，每当某地试图改革不合理的出租车管理制度时，就会出现“上班高峰期，成百上千台出租车集体不拉活，堵在主干道”的事件，背后的利益驱动可想而知。还有一些改革问题也类似，讨论来讨论去，却始终笼罩在“无解”的悲观情绪中。

在落实改革措施阶段，不少既得利益者也会“装醒”。

比如，某些公务员嘴上支持公车改革，但实施方案一来，就抱怨“车补太少”，甚至声称“以后不出差了”；一些干部说起简政放权头头是道，可真到了“割自己的肉”之时，却明放暗不放、放虚不放实；还有的干部，平时痛责不正之风，但一受八项规定等制度约束，

又慨叹“为官不易”、“管得太严”……总之就是，“一改到自己就改不下去”。

再比如，在行政审批“瘦身”广被点赞的同时，被称为“二当家”的审批中介却困扰着人们。中介“二当家”，凭着“依附”关系握住“隐形审批权”，人为制造“关卡”，垄断经营，服务用时长，收费不合理，被讥讽为“戴着市场的帽子，拿着政府的鞭子”。不少人感叹，“有些中介甚至比政府还牛气”，在不少地方，中介环节竟然占去了总审批时间的三分之二，甚至还多。

……

既得利益者“装醒”并不可怕，改革正是要让“装醒”的既得利益者真正清醒过来，不再阳奉阴违，而是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真正支持改革。

可怕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装醒”的人，对改革叶公好龙。每个个体，无论是不是既得利益者，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可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阻碍改革——就算舍弃的只是很小的一块“奶酪”，而得到的将是更大的一块“蛋糕”。

改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首先不要责问他人是不是在“装醒”，而且要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装醒”的人！

必须叫醒“装睡”的人

不成为一个装醒的人，只是减少改革的阻力；而更为关键的，为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只能依靠广大民众。

可让很多改革者时常感到沮丧的是：本该对改革充满热情的改革受益者，即广大民众，许多人却往往“装睡”——或者遇见问题绕着走，或者碰到矛盾躲着走，或者看见困难低头走。

如此吊诡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下三大效应使然。

效应一：“损失厌恶”效应

有经济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手里拿着一枚硬币，在街头随机拦下一个路人，问他愿不愿意参加抛硬币的游戏。如果硬币是正面，他将获得10美元；如果是反面，他将输掉10美元。结果，拒绝参加游戏的路人超过九成。这说明，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失去10美元的恐惧感，超过了可能得到10美元的满足感。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损失厌恶”。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假如某人意外获得1美元，他增加的满足感为1；反之，让他口袋里已有的钱意外损失1美元，给他带来的心理损失将高达2.5。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财富，如果没到手中时，人们可能愿意用一分的努力来赚取；而如果这财富已经在自己手中，人们可能愿意用2.5倍的努力来保住它。这就是“损失厌恶”带来的效应(注)。

“损失厌恶”效应投射到改革中，就变成普通民众只愿意用一分的努力来支持改革，而既得利益者愿意用2.5倍的努力来反对改革，于是就形成了“普通民众支持改革的热情远不及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的热情”的情形。

效应二：“分散集聚”效应

对普通民众而言，改革的收益存在“分散”效应。也就是说，再大的一块奶酪，只要除以庞大的普通民众这个分母，每个民众所能得到的改革收益就显得并不那么诱人了。当改革力度过小，利益调整过

少，改革收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显得可有可无，推动改革的动力就大大降低了。

对既得利益者而言，改革的损失却存在“集聚”效应。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者是集中占有财富和资源的群体，改革要切割出去的奶酪，就算不是特别大，但摊到既得利益这个数量较小的群体上，每个个体要承担的部分就相对比较大，反对改革就显得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十分必要。

“分散集聚”效应投射到改革中，就形成了“普通民众拥护改革的动力远不及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的动力”的情景。

效应三：“加法乘法”效应

“损失厌恶”和“分散集聚”效应的综合作用，就会产生效应简单相加的“加法效应”，甚至效应加倍放大的“乘法效应”。从而变成普通民众只愿意用一分的努力来支持改革，而既得利益者愿意用十倍甚至更多的努力来反对改革。

“损失厌恶”、“分散集聚”、“加法乘法”三大效应，像三只“拦路虎”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中，销蚀着普通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和动力，让他们“装睡”，从而贻误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和对社会结构进行重构的时机。

因此，必须叫醒“装睡”的人。

“四个全面”引领复兴之路

如何阻止“装醒”的人？如何叫醒“装睡”的人？

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还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的“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注

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两年多来，“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舞台上的奢华”、“会所中的歪风”等各种歪风邪气明显得到了遏制。据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5年3月，全国共查处违规问题82 693起，处理党员干部109 047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5 456人。

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群众路线，动

真的、碰硬的、来实的，完全能够超越“损失厌恶”、“分散集聚”、“加法乘法”三大效应，稳扎稳打，推动改革全面深化。

事实也给了我们信心。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形成了上下联动、主动作为、蹄疾步稳、狠抓落实的局面，呈现出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清醒是改革者的“通行证”。需要警惕——站在新起点上，人们最担心的是不良作风反弹；必须正视——“一阵风”的忧虑、“抓小事”的异议、“走着瞧”的心态都还客观存在；必须直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的改革在历史上都曾反复上演。如果问题反弹、卷土重来，麻烦就大了，就会“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了，改革前景就堪忧了。

为此，必须践行“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也必须做到“走群众路线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不做“装醒”的人，叫醒“装睡”的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凝聚13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下，中国充满活力的制度文明与治理转型，必将成为21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你我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1. 田俊荣：《“奶酪”坚硬怎么动？》，载《人民日报》204年3月24日第7版。
2. 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人民日报205年2月25日。

后 记

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自己一记温柔的棒喝

常说，世界很残酷，它不仅吝啬地不给你想要的，还强塞给你不想要的。

其实，其残酷在于，它貌似慷慨给你所有想要的，实则夺走真正宝贵的。

中国历史上运气最好的君主、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生前想必是极为心满意足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

实际统治时间最长。乾隆在位60年，还当了4年太上皇，实际掌权64年。相比之下，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在位61年，但剔除从8岁登基到14岁亲政的时间，实际掌权时间约55年。

君主之中寿命最长。从夏禹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为止，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将近500人，只有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乾隆活过了80岁，乾隆寿命最长，享年89岁，而且一直掌控实权。

统治政绩最为光鲜。他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的时期，比之前的最高点高出了近三倍；横向比，从总量上看，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社会财富最多的国家。

皇家气度最为彰显。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带着上万人的庞大队伍，威仪之严，排场之大，前所未有；建成的圆明园，面积5 200余亩，150余景，集天下胜景于一园，有“万园之园”之称。

……

然而，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乾隆万万不会想到，他自己洋洋得意的文治武功，不过是“雄伟的废墟”，他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正是后世诟病他的“罪证”。

正是在他掌权的60多年间，错过了历史性的、跨时代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由领先沦为落后，被西方赶超；

正是在他执政的60多年间，清王朝注定了即将倾颓的下场，中国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惨淡一页。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掠夺，另一个纵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格兰。”再接下来的故事，更加让中国人不堪回首。

这一切，都源于乾隆和统治集团的“迷失”——迷失在子虚乌有的天朝上国的迷梦里，迷失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的假象中，迷失在阿谀奉承的专制主义的黑暗里。

世界确实很残酷，它慷慨地给予了乾隆几乎所有现实的荣光，满足了乾隆所有迷失的梦想，但暗地里却夺走了乾隆最为宝贵的财富，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乾隆终其一生，其实一直处于“我有迷魂招不得”的状态里不能自拔，没人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他一记温柔的棒喝，让他幡然醒悟，就像“雄鸡一声天下白”那样。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像乾隆那样“迷失”，无论你是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手舞足蹈地聊梦想，还是在四面高墙的地方捶胸顿足地找救赎。

这个世界的残酷，不仅在于“它不给你想要的并强塞给你不想要的”而形成的错位，也不仅在于梦想照不进现实的孤苦，更在于满地的六便士很容易就晃花了你的眼，晃晕了你的头，让你迷失在无尽的迷梦中，忘记了——只需微微抬起头，就能看见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披在你身上。

所以请记得，偶尔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迷失的自己一记温柔的棒喝，让自己抬头看见月光。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周厉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北京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姜若木：《周朝那些新鲜事儿》，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刘宴斌：《风雨大周朝》，刘宴斌博客。

江月：《周朝其实很有趣儿》，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年版。

第二章 秦献公改革：秦国超级逆袭真起点

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

张金光：《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马平安：《强秦密码：帝国路上的八张面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昊天牧云：《秦朝那些事儿》，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三章 汉宣帝改革：正本清源成就最鼎盛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谌旭彬：《汉朝：被掩盖的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钱军：《西汉故事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王立群：《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羽田亨、耿世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四章 王莽改革：在模仿中走进死胡同

孟祥才：《细说王莽》，中华书局2006年版。

周桂钿：《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朱永嘉：《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著名改革》，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

葛剑雄：《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专题：《重读王莽》，凤凰网历史频道。

第五章 汉明帝改革：官不聊生中让民安生

颜晨华：《细说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张鹤泉：《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惜秋：《东汉风云人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锐圆：《这样读资治通鉴之帝国落日：从汉明帝到汉献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兰台：《重读中兴之主：汉明帝刘庄》，凤凰网历史频道。

第六章 隋炀帝改革：急于求成中功败垂成

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蒙曼：《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说隋炀帝：传说的暴君与湮没的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刘善龄：《细说隋炀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刘健明：《隋代政治与对外政策》，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七章 唐武宗改革：拨乱反正赢中兴局面

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王德忠：《唐武宗唐宣宗皇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司马光、柏杨：《资治通鉴（第八辑）：晚唐暮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林伟洲：《晚唐财税与政局演变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陈力舟：《读破三春：别样晚唐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八章 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庆历新政

梁志宾：《汴梁如梦正繁华：宋仁宗那朝那人那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黄燕生：《宋帝列传：宋仁宗宋英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中华书局2005年版。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苏升乾：《清明上河读宋朝》，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2007年版。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陈文德：《北宋帝国危机生存》，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田志光：《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九章 明孝宗改革：抢在革命之前搞改良

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贾葆蘅：《弘治皇帝》，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高阳：《明朝的皇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嵚：《被遗忘的盛世》，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王春瑜：《他们活在明朝》，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谭平：《宋朝与明朝治官的对比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韩田鹿：《三言二拍看明朝》，中华书局2011年版。

樊树志：《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